



# 国际生活

俄罗斯对外政策、外交和国家安全





## 项目领导人

阿尔曼·奥加涅祥

“国际生活”杂志总编

## 责任编辑

叶甫根尼娅·皮亚德舍娃

“国际生活”杂志责任秘书，历史学博士

## 摄影图片

伊丽娜·兹纳特诺娃

“国际生活”杂志出版编辑

中文版

中文翻译

© ООО «Прогресс ИД»

总经理：萨尔基斯·奥加尼扬

编辑部主任：玛加丽塔·塔尔韦尔多娃

翻译：伊丽娜·科斯特罗米季诺娃、李裕泰

电脑操作：阿列克谢·乌瓦洛夫

排版：安东·佳特洛夫

编辑部地址：邮政编码105004，莫斯科，高罗霍夫斯基小巷14号

电话：+7(499)-205-3781；传真：+7(499)205-37-71

E-mail:info@interaffairs.ru

© «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2014

## 外交

-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国际利益才是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力  
5
- 
- 根纳季·加季洛夫**  
在联合国大会第59次会议的“场地”上  
13
- 
- 弗拉基米尔·奇若夫**  
俄罗斯与欧盟——20年后  
19

## 地缘政治

- 格奥尔吉·托洛赖**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北朝鲜因素和俄罗斯在亚洲地位的加强  
27
- 
- 塔伊尔·曼苏罗夫**  
欧亚经济共同体从一体化合作到欧亚经济联盟  
39
- 
- 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  
谈俄罗斯任上合组织主席期间的某些政治任务  
55

## 乌克兰向量

- 尤里·布拉托夫**  
俄-乌关系：同舟共济还是分道扬镳  
65
- 
-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国际关系新范例  
77
- 
- 阿列克谢·莫伊谢耶夫**  
谈乌克兰问题的某些法律立场  
83
- 
- 斯列奇科·朱基奇博士**  
“乌克兰计划”的破产  
91

## 我们周围的世界

- 康斯坦丁·科萨乔夫**  
俄罗斯和协助国际发展 95
- 
- 尤里·沙弗兰尼科**  
俄罗斯能源：时代的挑战 101
- 
- 安德烈·科里莫夫**  
金砖国家：不再仅举行峰会而已 107
- 
- 德米特里·达尼洛夫**  
北约：转向过去 115
- 

## 安全

- 安德烈·克鲁特斯基赫**  
**阿纳托利·斯特列尔佐夫**  
国际法和国际信息安全保障问题 125
- 
- 叶卡捷琳娜·维索茨卡娅**  
**丹尼尔·莫金**  
**伊利亚·罗加乔夫**  
遵守人权或保障安全：何为更重要？美国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的经验 135
- 

## 主编一栏

- 阿尔曼·奥加涅祥**  
永别了，德国？ 145
- 

## 图书专栏

- 鲍里斯·皮亚德舍夫**  
《国际法》经典之作 147
-

## 杂志理事会

谢尔盖·拉夫罗夫  
俄罗斯外交部长

亚历山大·阿夫杰耶夫  
特命全权大使

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安德烈·杰尼索夫  
特命全权大使、经济学副博士

阿列克谢·普什科夫  
俄罗斯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历史学副博士

亚历山大·扎索霍夫  
政治学博士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伊戈尔·伊万诺夫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席、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历史学博士

米哈伊尔·谢斯拉文斯基  
俄罗斯出版和大众传媒署署长

康斯坦丁·科萨乔夫  
俄罗斯联邦合作署署长、  
法学副博士

弗拉基米尔·季托夫  
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弗拉基米尔·卢金  
俄罗斯人权全权代表、  
历史学博士、教授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政治学博士

米哈伊尔·马尔格洛夫  
俄罗斯总统非洲国家合作  
特别代表

阿列克谢·费多托夫  
特命全权大使、法学副博士

谢尔盖·马列耶夫  
俄罗斯外交部总经理

弗拉基米尔·奇若夫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

阿列克谢·梅什科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维塔利·丘尔金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历史学副博士

亚历山大·帕诺夫  
政治学博士

尤里·沙夫拉尼克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家联盟  
理事会主席、“世界政治与资源”基  
金会主席

盖奥尔吉·彼得罗夫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副会长

亚历山大·雅科文科  
特命全权大使、法学博士

杂志主编  
阿尔曼·奥加涅祥

# 国家利益才是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力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俄联邦外交部副部长

SRyabkov@mid.ru



**A. 奥加涅祥？《国际生活》杂志主编：**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什么马航“波音”的“黑匣子”送往似同美国行政那样在调查空难事故前就先指控民兵和俄罗斯有罪的国家政府——英国？

**C. 里亚博科夫：**我们不准备对每一事件从政治上来进行剖析。我们对那些专家能从事这项工作不抱有偏见。对我们来说，我国的专家被纳入相关调查组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我们希望的是树立真相。目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存在欺诈或有人操纵的现象。俄罗斯对树立真相的关心不亚于其他人，甚至可能比别人更关心。因此，我们希望与英国人、荷兰人和一开始就此课题进行具体对话的马来西亚一方的合作能将调查进行到底。

独特的经验，对特异性的了解，并遗憾的是，专家对自民航存在的年代发生的空难调查进程中积累的巨大知识，能使其专长地、针对性和不加以政治化地进行工作。顺带一句，正是这个原因，俄罗斯曾坚持将一些相关条款纳入为这项工作创建法律基础的安理会第2100<sub>5</sub>决议。

**A. 奥加涅祥：**曾说过派遣荷兰、澳大利亚警察前往守卫坠机现场，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此建议暗含了潜台词。其是否会将整个冲突国际化？乌克兰一方可保障不了外国警察的安全。

**C. 里亚博科夫：**提倡向坠机现场派遣守卫人员，是空难中不幸罹难公民国家的政府。这些国家政府与基辅签署了相关协议。我们也曾为使这项工作能在大家接受的框架下进行做有具体、积极和有目的性讨论的准备。但实际上，问题的症结在于：波罗申科及现基

辅政权在保障停火，而且更主要的是在与民兵和顿涅茨克及卢甘斯克领导人开始进行建设性对话做有准备。因此，许多该做的和在不去做就不能保障恢复局势安宁的事不被实施。我们不仅没看到基辅做出应有的反应，也没看到支持基辅现政权继续对峙，继续进行所谓的反恐行动国家首都做出的应有反应。

这是乌克兰东南部，整个乌克兰的大悲剧，这是该地区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我们对局势的所有细节有清晰的了解。乌克兰当局必须彻底重审自己的态度。

**A. 奥加涅祥：**尽管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存在分歧，但都坚持一个重要的原则条件——停火休战。是否能视美国确实持有这种立场？

**C. 里亚博科夫：**遗憾的是，华盛顿的行为往往与我们通过关闭的外交渠道得知的和美国政府以公开评论形式做的保证和发出的信号迥然不同。其言行不一的现象——令人发指。我们与美国今天的关系没有比美国人口头上予以协助局势正常化的保证，但实际上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具有支持基辅的新形式，而这种形式又不外被基辅视为是纵容其继续执行陷入僵局的方针，作为批准其武力镇压乌克兰东南部抗议行动的支持，这种口是心非现象更令人担忧的事。保证当然重要，我们也不是不考虑这一点，但随之美国给予的保证，应有具体的建设性步骤。目前什么也没有，却有恰恰相反的事。

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由欧安组织在俄罗斯-乌克兰的《古科沃》和《顿涅茨克》边境口岸进行监测的倡议，是最新例子之一。美国口头上说也希望如此，但实际上又在两周多时间内阻止通过欧安组织常驻委员会的决定。就华盛顿示范的良好祝愿及意愿与其在乌克兰危机上采取的实际行动这种天地之别的例子列不尽。

**A. 奥加涅祥：**保罗·沃尔福威茨曾说过，美国的主要目标——预防前苏联境内新对手的再现。这种思想是地区新防御战略的关键。美国人应防范拥有足够资源建立世界大国的敌对国家在地区上居上风地位的任何可能性。

您是否认为历届美国政府都在后苏联空间采用沃尔佛维茨的学说？



**C. 里亚博科夫：**沃尔福威茨先生属于“新保守主义”派系。这是共和党保守派中的右翼。美国阻止在后苏联空间进行一体化的一贯性政策，确实给人印象深刻。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常数，不取决于政府的换届。

我想谈谈稍偏题的事。我们近几年来经常引用“美国政策中的双重标准”一词。在对乌克兰及其周边发生的一切进行的分析使我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在此方向的政策更根本就不存在“双重标准”，其唯一的标准——以任何手段不让后苏联空间团结起来，打扰在此广阔地区各地与俄罗斯精神上、历史上、个人联系上保持紧密联系的生活，阻碍他们兑现自己的夙愿；将另一种行为方式强加于他人，攻击异己政治和意识形态政府的标准。地缘政治上，按这些或那些地区领导人的优先取向进行瓜分——这就是上述得到华盛顿支持的那种唯一标准，其不取决于沃尔福威茨先生在执权，还是从右翼立场对另一届政府进行的批评。

华盛顿还经常发生以下的事，在讨论弥补医疗保险或处方支付的预算拨款额度时两党进行博弈，但他们从不会提出本国的对外政策方针是否适用于具体地区的问题。美国政治特权坚信，美国——“善的渊源”，谁不懂得这一点就犯大错。

可以不止休地谈论有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命运和国家主权学说遭破坏的问题。现在成了独有美国享有完全的主权。其它国家要么自己限制本国的主权，要么接受美国的条件与其进行合作，否则的话，这些国家就会出现出问题。对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世界的的能力进行基本限制，这是悲剧。谢谢沃尔福威茨先生直言不讳。我们也将襟怀坦白，直言不讳。

**A. 奥加涅祥：**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紧张到何种程度？

**C. 里亚博科夫：**我们现在面临全线收缩合作规模，这也是根据美国做出的决定进行收缩。从《主动示范》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曾触及过对华盛顿起思想情绪影响的任何问题。我们采取和做的一切——仅是回应措施和不能接受美国步骤的反应。但双方传统形式的合作、对话，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进程被冻结。真不愿去想这些合作将会被完全废除的事。但在现今事态背景下恢复的前景极其暗淡。

我们在与美国的关系极其发展上，与其进行的对话，一贯非出自为美国而进行的立场。我们就自己的利益一贯采取经反复斟酌的措施，这是正常的，因为只有国家利益才能成为对外政策的推动力。如果美国认为没有必要与我们合作，或他们在俄罗斯方向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迁就”我们，那么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不知在能预见的未来是否会有美国现政府承认这一错误的一刻到来。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意味一切将会原地止步。当然，我无法预见——采用美国的术语——新的“重启”，因为，华盛顿在反俄罗斯的言辞中一心要“惩罚”我们的问题上越走越远。所有这一切很难再向后倒退。我再强调，我们将继续执行保持对话，以便能使我们的伙伴心平气和地聆听我们对所有问题的观点，为致力保存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一切，并继续我们认为对美国来说也并非无关紧要的课题进行工作的路线。

**A. 奥加涅祥：**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您也积极参与过作为“重启”功绩之一——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工作。此条约是否会受腐蚀的侵袭？

**C. 里亚博科夫：**依我看，应当根据这份或那份文件履行的有效性，而更主要的，根据是否能抵抗外部影响来做判断，而不是根据某种权宜之计和与监控武器领域无关的日常进程来进行判断。此文件一开始似乎对双方都有利，其经过利益平衡的核实，其中未有任何毫无理由的让步。就条约的签署及往后批准阶段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其数量之多是无与伦比。既然如此，也就没理由对用于加强美国与俄罗斯安全和有助于维持战略稳定的实用工具提出疑问。

就美国有些人在反俄欲狂的情况下企图示范自己对俄罗斯的立场，首先在地区问题上的厌恶，这是另一个问题。他们企图对总统行政、立法委员施加影响。我们只能为他们在自己的对外政策学说上除了制裁别无其它进展感到遗憾。只要发生不合其心意的事，回答也只有一个——制裁。

**A. 奥加涅祥：**美国立法委员最近提交讨论的建议之一——将乌克兰提升到享有军事技术援助的特权伙伴地位，与基辅进行更积极的军事合作。您能如何评论这一切？

**C. 里亚博科夫：**问题倒不在于以何种武器，或以多少武器来壮大基辅政权。问题在于不进行政治对话，不进行宪改，该地区不会取得稳定和安宁。不如将现在用于为乌克兰提供“非北约特权伙伴”地位进行炒作的精力用于和平目的，用于开导基辅和启动乌克兰内部的政治进程。

我想指出，我们被指控向民兵提供重型武器的同时，继续受到对我国进行的前所未有的诬蔑运动。但就此问题又仍然拿不出证据。您可知道，美国人和北约老说他们掌握了情报资料，就是因为是“情报”所以不能泄露，看，说这种话多方便。

我们能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仅是诬蔑和攻击而已。俄罗斯外交部已多次就美国在自己的外交政策上越来越经常启用诬蔑和谎言发表过声明。

**A. 奥加涅祥：**根据您参与的外交历程的经验，您认为北约、美国是否能对乌克兰的冲突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

**C. 里亚博科夫：**我想，一些就是不用语言来表达，但无意识地，在梦幻中都存在这种诱惑力的人，得赶紧服用镇静剂或找医生。因为这种立场的危害性和灾难性，对任何正常的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A. 奥加涅祥：**美国宣布的制裁对俄罗斯的危害有多严重？我们能听到从“要命”到“蚊叮”的各种评估。

**C. 里亚博科夫：**说是“要命”，当然没道理。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为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体现于俄罗斯经济营运商正常活动经费的提高。我们能看到他们在借我国国防工业综合体功能的特殊性，对在解决保障我国国防能力领域的一定任务上制造困难的尝试。这办不成。再说，我想在此指出，在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实施制裁的批复文件下签字的同一只手又起草与俄罗斯人继续就进一步裁军进行积极工作的批文，真是“咄咄怪事”。依他们的看法，俄罗斯的行为不符合他们为用于乌克兰阐明的“生活之道”。所以得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但就在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上，尽管存在制裁也似乎必须继续按原定制度进行。这可行不通。这里就由我们采取回应措施。

“要命”——说不上。但说似乎“蚊叮”，也不是。这是一件严肃的事。问题还在于，想要倒退，取消此一切，这对西方、美国、欧盟和其它国家来说将十分困难。很明显，本想以对俄罗斯的制裁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国家，不仅达不到，反之，将失去在他们抱有极大兴趣的问题上进行有效工作的机遇。因为存在报应。

**A. 奥加涅祥：**前不久“金融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伊朗与俄罗斯为自己提出改革现有世界制度的任务“显示了修正主义”。您对这种说法又将如何加以评论？

**C. 里亚博科夫：**对报纸刊登的文章，哪怕是像对如此受尊重的“金融时报”的文章加以评论，非外交部门正式代表的规矩。但我就“修正主义”一词想说两句。谁都可以谈，就怕轮不上我们的英国同事，老练的英国专栏家谈修正主义。我们俄罗斯想为正常的，应有的国际生活，为正常、公正地，无须对每一步，包括与尊重的“金融时报”报社驻地国首都进行“核对”的从事国际事务寻找稳固的平台。

**A. 奥加涅祥：**还在两、三年前就有有关金砖国家——世界上既成事实的一种国家集团的说法。今天的金砖国家是什么？

**C. 里亚博科夫：**金砖国家——今天依旧是五个正在逐步扩大政治、经济和其它应用方面工作议程国家的非正式联合体。我们在金融方面已有重要的合作经验，我甚至不提银行与外汇储备库的建立（这可是新建的）。近几年，在定期举行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会议前，我们都进行立场上的协调，此外，在“20国集团”内部也同样进行合作。我们在涉及到社会任何日常生活的领域——从科学到农业方面，进行越来越多的具体合作。

是的，确实希望能有更多的实际效果，取得更大回报的效果。但如果从时间的跨度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05年提出建立金砖国家的思想，2009年举行了首届峰会。下届峰会将于2015年在乌法举行），在与其它国际机构建立时间相比背景下，这只是短短的历史阶段。但在这段时间内做了许多事。

政治议程在不断扩大。例如，福塔莱萨宣言就叙利亚、阿富汗、伊朗问题奠定了严肃的纲领和重要的预告。这是我们与金砖国家伙伴就许多尖锐问题共同工作的基础。深信，金砖国家——

仍然为非正式联合体（我们不谈建立某种硬构架或是组织）——的团结进程将继续进行。

**A. 奥加涅祥：**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基金的必要性与哪些问题相关？不是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吗？

**C. 里亚博科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改革，再说，其参数已在“20国集团”形式下予以协调。我们曾在此范围进行工作，现在也还继续工作并认为，其以优越形式反映了包括经济、国际舞台上当代力量的对比。改革的决定未能履行，首先是有美国政府不予以履行，美国封锁了就改革基金组织配额问题协调一致的方案。一系列国家对基金组织做出的决定未有应有的影响力，这种局面越来越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实际份量和承担的责任，其中首先是金砖国家。因此，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基金——针对面临的这种局面寻找答案的方式。更确切地说，也就是仅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开发银行关系上存在隔阂的我们这些国家，打造某种能使我们无阻地执行任务和从事金融稳定工作，为重大项目融资进行活动的工具。

我不想使读者得出金砖国家的工具与许多国家数十年来行使的工具是相对立的结论。这里不存在竞争因素。

首先，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累的资金与金砖国家方面将会应用的，不可相比。其次，截然不同的任务。金砖国家的工具——不是经济实力向某外部投影手段的反映，这是为解决具体任务的附加杠杆，尽管也不受金砖国家本身地域的限制。但这里有一个细节问题，这牵涉到金砖国家需趋减与布雷顿森林机构“挂钩的”的活动。

同样，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支付系统，这一点我敢肯定。现在还不知道过段时间，如维萨或万事达集团领导层，从他们的俄罗斯方位政策视角来说会发生什么。但我们也不能老受华盛顿政治家强加于本国和国际商界的那种蓄意的、无根无据的，就其实质而言岂有此理决定威胁的摆布。

**A. 奥加涅祥：**金砖国家是否存在指导思想或某种超级想法？

**C. 里亚博科夫：**不存在意识形态，其也不可能。但我们都致力于多极世界，我们坚信必须加强国际法，认为，应当对国际进程

进行调整，通过寻找利益平衡、妥协以及对话途径来解决问题。这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三点。金砖国家不存在隐蔽的议程。该联合体今后将怎样？其将会演进性地发展。我们不为此鞭策加速，不强行。我们认为，在提出问题和阐明计划的同时，应当将精力集中于实践工作，何况多年来，这些实践具备了具体性并要求专家予以关注。也就是说，其将双轨运行——逐步提高等候及任务的杠杆以及逐步以我们已商定的具体内容来加以充实。

**A. 奥加涅祥：**我们能看到与中国进行的积极合作。那么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关系又怎样呢？

**C. 里亚博科夫：**当然希望能看到更多具体的结果。这些结果是有，这不能被低估。不能都以签署的协议或交易量来衡量，尽管现阶段上此领域的数字极可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对一系列拉美国家的访问，与聚集在巴西的大多数南美国家领导人举行“外展”形式活动本身，成了为与这些国家每一国推进双边关系的良好机遇。

我们并非像我们西方伙伴出自典型的地缘政治标准构建我们在拉美（非洲亦是）的政策。这不是“零和博弈”。我们不认为，如果我们以加速与某地的关系发展或与一系列国家在不同领域争取突破性的协议（也有这种现象）就会为谁带来损失或危害。我们认为，这是国家间相互吸引的正常现象，尽管地理上相距遥遥，但都致力享有新伙伴。今后也将会如此。我们呼吁那些对俄罗斯政策有疑虑的人，能从无偏见的立场对待俄罗斯在拉美和非洲就推进自己的利益，对这种利益的保护和我们建立新伙伴的现象。



## 在联合国大会第69次会议的“场地”上

### 根纳季·加季洛夫

俄罗斯副外长

gmgatilov@mid.ru

**“国际生活”：**您怎样评价联合国大会第69次会议“外长周”主要结果？

**根纳季·加季洛夫：**联合国大会的每一次会议都是划时代事件，它不仅总结上一个政治年的结果，评价现阶段国际关系现状，而且确定未来前进方向。关于联合国是反映全球政治、经济、人权、集体安全方面进程镜子的说法完全正确。

在这种意义上这次会议汇集了渗透世界政治的全部复杂、矛盾问题。可以说，一般辩论的主要结果是绝大部分国家认识到，在克服全球危机事业上除了基于遵循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协调行动别无选择。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正是依据这一点，他强调指出了联合国在今天条件下需要解决空前复杂多样的问题。

很明显，对美国总统B.奥巴马在会上讲话中表现的由美国控制世界，损害其多矢量性的企图，许多人表示不信任和反感。他们对安全、经济发展和价值基础方面的挑战有自己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发言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谈到了联合国克服贫困、失业和发展不平衡，改善进入世界市场途径，保障较容易得到的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生态问题。正因为这样，智利总统巴切莱特说，联合国是不可取代的论坛，尽管其工作不是都能取得所期望的成果。

谈到这些，我想特别强调指出：这些问题在辩论过程中没有被忘却，在地区尖锐危机的讨论时也没有被忽视。



**“国际生活”：**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大概曾经企图锐化乌克兰危机，甚至把它说成是主要威胁？

**根纳季·加季洛夫：**恰好和预测，首先是西方媒体的预测相反，会上乌克兰问题的讨论没有像某些人期望的那样具有鲜明的反俄罗斯色彩。只有美国B.奥巴马把“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和埃博拉病毒爆发与恐怖主义一起称为主要威胁之一。但这只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而且只有相对不多的国家-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一些欧盟国家的附和。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表示了中立。绝大部分国家主张政治调解乌克兰局势，可以感觉到，他们开始重新思考美国反俄罗斯的强硬方针。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主张联合努力向实际的，而不是臆想的挑战作斗争。首先指的是共同高效对付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搞好地区危机调解的集体工作，解决持续经济发展、食品安全和卫生等上面已提到过的问题。结果，把乌克兰事件变为核心问题的企图落了空。何况在明斯克进程范围内启动了冲突各方的直接对话，开辟了停止乌克兰暴力的实际前景。不愿看到这些的人是在追求与乌克兰国内稳定毫无共同之处的地缘政治目的。

**“国际生活”：**会上反恐怖主义任务课题居何等位置，包括在B.奥巴马宣布的广泛国际联盟背景下？

**根纳季·加季洛夫：**反恐怖主义斗争在会上是主要问题之一。毫无例外地所有人都谈到了集体对付这种可怕现象。举行了由B.奥巴马主持的联合国安理会重要会议，其中一致通过了关于外国恐怖分子-武装分子的第2178项决议。我们积极参加了起草的文件重点是在反恐怖主义事业中遵照联合国宪章，搞好积极国际合作，规定了各国向外国恐怖分子-武装分子斗争的补充义务。

谴责极端主义和宗教之间暴力，呼吁所有外国恐怖武装分子放下武器，停止参加武装冲突。规定启动联合国各个反恐怖主义结构履行安理会决议，顺便提提，它们已在进行相应的有益工作。由于决议按联合国宪章VII条通过，拒绝履行其要求将导致对“违者”的严重后果。决议成了在反恐怖主义斗争方面继续集体行动的重要步



骤。此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加强对伊拉克和黎巴嫩恐怖分子们制裁的2170项决议。总之，这证明在存在共同政治意志情况下，安理会能够通过基于联合国宪章的有力决议。

至于国际联盟的建立，C. B. 拉夫罗夫说：我们早已经常并且一贯地向恐怖主义作斗争，不取决于某种创建联盟的响亮声明。

俄罗斯在大规模供应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国家武器和军事技术，支持他们反恐怖主义的努力。

现在许多人侈谈联盟和对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伊斯兰国阵地的空袭。但应该说-甚至西方专家们都承认-没有和叙利亚的协调，美国为首的联盟还不能夸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从八月8日到九月底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领土进行了4千多次空袭，但伊斯兰国人不仅坚守着阵地，而且继续在一些方向进攻，包括向伊拉克首都。此外还出现空袭质量问题，炸弹或者落在被抛弃的军事基地上，或者落在学校里。伊斯兰国的机动部队轻易地避免大损失，往往混入居民之中。

还出现反伊斯兰国空袭的人文问题，联合国相应组织已指出了这一点。

**“国际生活”：**这就是说，仅武力不足以根除恐怖主义威胁？

**根纳季·加季洛夫：**完全对。这是根本问题。为了实际防止和根除恐怖主义，必须遵循我们在联合国阐明的如下准则。

第一，不能接受“双重标准”，某些国家有划分“好的”和“坏的”恐怖分子的诱惑，企呼利用恐怖运动来解决狭隘的政治问题，例如，更换政权，我们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看到这种纵容的例子。

对此，阿根廷总统K. 费尔南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话是清楚的备注。她指出西方曾把许多恐怖武装分子看作是争取自由斗士并加以支持，首先是在近东。

第二，反恐怖主义斗争应遵循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这要求反极端运动的军事行动只能在相应国家请求或在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决议基础上进行。这些范围之外的一切都非法，是单方面行动。我们很容易从不久之前的历史看到它们的后果。

让我们回想一下，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打击、巴格达政权的更换和袭击黎巴嫩行动对国际系统的稳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一年前曾企图对叙利亚重复行动，只是由于积极的外交努力，首先是俄罗斯的努力才防止了它的发生。

反恐怖主义的高效斗争要求地区所有国家积极参加。难于设想，没有伊朗、叙利亚、诸如阿盟、非盟等对地区特点和微妙问题最为敏感的地区组织的参加能在这方面取得什么成就。当时如果我们的伙伴们认真听取了非洲联盟对利比亚的态度，大概可以避免全地区的悲剧。北约违反安理会决议对该国的打击实际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崩溃。

我们的一个交谈者在联合国大会“场地”说得对：军事行动不是反恐怖主义斗争的万能办法。需要强有力的“反恐解药”。正因为这样，我们建议制订综合立场，它应包括财政、行政、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恐怖组成部分，并且严格尊重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国际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地区冲突的调解应该居重要地位。

**根纳季·加季洛夫：**这是战略任务。我们建议全面讨论近东和北非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召开联合国主持的，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阿盟、非洲联盟等感兴趣各方代表参加的大型会议。在它的范围内可以讨论早已存在的地区冲突问题，包括几十年未能调解，成为恐怖分子滋生土壤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

遗憾的是，尽管加沙事件后果严重，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会上对近东调解的呼声不很高。但是，认为尽快推动巴以冲突彻底调解已不再属于国际议事日程，那是不对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国际努力，启动内容充实的和平进程，否则地区不仅对当地居民，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人们都仍是不安定区域。从我们和巴勒斯坦人的交谈可以做出结论，为了使安理会通过确定停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占领日期的“向联合国进军”思想并没有从议事日程中取消。

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国际工作应该从对付冲突和恐怖现象转向集中注意警告和预防。为此反恐怖方面的努力应该增加搞好政治进程的集体活动，在它的范围内敌对各方将可以通过广泛的民族对话解决所有出现的问题。

**“国际生活”：**叙利亚仍是国际议事日程的尖锐问题。这个问题也在会上讨论了吗？

**根纳季·加季洛夫：**当然，而且一致认为叙利亚危机除政治调解之外别无选择。B.奥巴马在讲话中声明了这一点。应该从言论转向行动。为此建立了政治框架：通过日内瓦联合公报为调解平台，举行了关于叙利亚的蒙特勒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了两次谈判并议定了总的议事日程。后来这个进程中断了，因为叙利亚政府要求特别注意讨论反恐怖问题和为此联合政府与反对派的问题。然而，过去的半年表明，提出的问题是完全适合的。

如果我们真想在停止叙利亚暴力方面取得突破，就应该返回日内瓦进程，而不是为了推翻叙利亚政权而武装反对派。

我们正是持这种立场在纽约和联合国叙利亚特使C.杰·米斯图拉进行了会晤。他为探索启动日内瓦对话在大马士革和地区玩家进行了接触。

顺便提提，在会议“场地上”举行了关于叙利亚危机人文方面的部长会晤。与会者主要注意到了搞好政治调解进程，离开它所有改善人文局势的努力都枉然。一个代表指出：没有政治稳定所有财政投入都将“沉入井底”。一针见血。

**“国际生活”：**埃博拉也是会议讨论的对象？

**根纳季·加季洛夫：**举行了专门的高级会晤，我们在其过程中主张联合努力向西非洲卫生方面的这一严重危机作斗争。我们成了联合国关于埃博拉决议的起草者之一。俄罗斯医生们积极联合国际努力，勇敢地在几内亚共和国工作。搞好了他们和国际这方面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我们为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提供医疗设施、医护人员的保护装备。俄罗斯在研制预防和治疗此病毒感染者的药品。为此目的投入了300万美元。

**“国际生活”：**通常这些日子里在纽约举行有关世界政治不同问题的系列活动。您能谈谈较重要的活动吗？

**根纳季·加季洛夫：**在这种意义上会议内容充实的。举行了集体安全条约国家部长会议和金砖国家会议，与会者重申了我们国家主

张在国际关系上遵守国际法，就世界尖锐问题进行协调的共同立场。举行了关于黎巴嫩、也门、索马里、中非共和国、马里和其他问题的特别会议。例如，我除了上述活动还参加了“亚洲合作对话”部长会晤。这是30多个国家参加的关于亚洲国家一体化的有前途的国际论坛。

我参加了关于土著人民的会议、联合国大会关于实行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计划的特别会议，俄罗斯有关部门代表也参加了它。更不用说和外国伙伴的许多双边接触。

这次会议“场地上”众多的活动再次表明各国联合工作的意愿。实践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最尖锐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

### “国际生活”：辩论之后有何感觉？

**根纳季·加季洛夫：**在许多双边接触-我们外长超过50个-过程中，在多方活动中，在我国代表团团长于联合国大会讲坛的讲话中，我们坦率地阐明了对国际关系复杂形势以及克服存在问题途径的评价。以具体例子着重指出单边行动模式、不考虑民族和文化特点把发展系统强加强给别国的做法行不通，最后通牒、优势和霸权政策不能接受，详细阐述了俄罗斯对已成为全欧结构失调后果的乌克兰内部危机的立场。例如，外长提出了通过联合国大会关于不准干涉内政、不承认国家政变为改换政权方法的宣言。

我们提出了旨在搞好基于统一的议事日程的真正建设性合作立场作为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即将到来的今天，坚持这种立场特别重要，这个世界组织正是按二战的结果建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俄罗斯与欧盟——20年后

弗拉基米尔·奇若夫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

20年前，1994年5月24日在希腊克里拉岛又名科孚岛上，签署了俄罗斯-欧盟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一年后，1997年12月1日协定生效并截止今天继续有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世纪交替上，此突破性的协定为在各领域全面发展俄罗斯-欧盟对话奠定了法律基础。协定为构建紧密的经济关系，包括未来组建自由贸易区建立了分支极广构架的合作，设置了俄罗斯-欧盟政治对话的框架。



在过去的这20年里，俄罗斯与欧盟举行了32次峰会，5次俄罗斯政府-欧洲委员会形式的会晤。建有部长级水平上的合作——最初是以合作委员会的形式，稍晚，根据双方达成的一致，改为更灵活的形式——伙伴关系常设理事会。

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促使了俄罗斯-欧盟经济合作的主要工具之一的创建——13个现行部门间对话（已建立的投资、国家订购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的‘横向’对话除外）。在两个方向上，即，企业发展和业务环境以及统一的海事政策，正在进行将对话制度化的工作。独立于其它存在的是俄罗斯-欧盟科技合作——结构上，其与对话形式相似，但其构架以2000年单独的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为基石。顺便说一句，该协定前不久又被延续5年。动植物检疫领域的合作，尽管在非正式对话框架下进行也取得积极发展。

我不仅曾作为见证人，但也是为努力落实包含于发展行业协定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条款，以及在2005年莫斯科峰会上通过的有关建立俄罗斯-欧盟共同空间“路线图”的直接参与者。

看来，在过去的20年里做了不少事。今天，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欧盟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49.4%。俄罗斯则是欧盟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其占欧盟贸易总额的9.5%。2013年，俄罗斯与欧盟的贸易额达到空前的3263亿欧元，换句话说，一昼夜相当于10亿欧元。合作伙伴协议签署20年来，双方的贸易额增加将近10倍。不能低估俄罗斯作为向欧盟国家提供能源的领先供应商的作用。俄罗斯在油气方面能满足欧盟三分之一的需求，煤炭和石油产品则将近四分之一。欧盟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找不到能保障提供他们所需量的伙伴。

双方在业务、旅游、文化和科院间的合作在不断扩大。2013年690万俄罗斯公民跨越了申根国家空间。2012年生效的俄罗斯-波兰有关边境之间居民来往的协议，为发展人际接触做出重要贡献。

俄罗斯-欧盟在打击跨国挑战与威胁上的合作在平行发展。参与“亚特兰塔行动”的俄罗斯海军与欧盟成员国国家海军，在亚丁湾海盗危险区进行联合执勤。双方继续为寻找以谈判途径解决伊朗、中东、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问题和其它地区的危机和冲突进行工作。俄罗斯紧急状态部航空组与欧洲专业机构协调在欧洲国家进行抗洪、抗森林火灾的工作。

说明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现象的事实数不胜数。没有俄罗斯的欧洲大陆和将扎根于欧洲文明的俄罗斯与欧洲分离，都是不可思议。尽管多世纪来就俄罗斯的欧洲归属，我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在进行辩论，毫无疑问，欧洲大陆人民被千丝万缕“无形影”的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多世纪的历史遗产和共同价值观的丝带编织在一起。更甚的是，作为全球重要玩家，俄罗斯和欧盟被赋有为在靠近我们边界的空间维持国际和地区安全、和平，繁荣昌盛与稳定做出贡献的使命。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今天爆发的危机，不仅是对20年来俄罗斯-欧盟形成的多层次系统合作的牢固性进行的考验，但也是整个欧大西洋空间的“关键时刻”。

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说实话，远离了1994年协定作者构思的伙伴关系与合作的精神。俄罗斯-欧盟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前言中写道，双方将遵循“旨在促使地区繁荣和稳定，鼓励前苏联国家间。。。地区合作进程。”此外，2005年就外部安全共同空间签署的“路线图”，俄罗斯-欧盟承认他们参与的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对加强安全与稳定起的重要作用。就在同一文件中，双方承担了“为建立没有分界线的统一欧洲做出有效贡献”的义务，并为此目的“积极推进。。。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互利进程”。

尽管如此，承担的这些义务并没有妨碍欧盟领导2013年11月在维尔纽斯举行的“东方伙伴关系”峰会前夕，将乌克兰置于在俄罗斯与欧盟间做出人为地缘政治选择的地步。为此目的，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采取经济压力，有时干脆就露骨地干涉国家内政。当基辅做出只不过是暂时与欧盟停签联系国协定的决定时，欧盟实际上也就站到乌克兰的“街头”反对派一方，并以此在颇大程度上决定了由主要靠激进派撑腰的势力发动国内二月武装夺权事件。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西方伙伴他们对基辅当局令人发指的违反人权和民主原则，对激进分子及其行列中为敖德萨大屠杀事件鼓掌的露骨的新纳粹分子的迁就，对发生的事件睁一眼闭一眼的那种虚伪态度。这里不由自主地会想到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和著名的耶稣会的教义“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

在乌克兰事件背景下，俄罗斯-欧盟的关系确实需要做批判性的反思，也就很明显。我们承认：本想将我们这块合作厚料嵌入平等与互利性靠拢的长远框架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思失灵。乌克兰事件的试金石显示，我们的欧盟伙伴自一开始对这种构思就有错误的理解。认为，似乎俄罗斯——因没有其它文明上的选择——早晚将会归入欧盟政策的航道，因此，完全可以蔑视俄罗斯的利益，包括其在后苏联空间的利益。在背后对我们的态度，类似对疏忽的

“考生”态度，必须以千方百计的刁难形式使其跟上欧盟的准则、标准和价值观。我们把话说明白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套式性模式，无论是今天、明天，还是几十年后都不管用。

试问：我们与欧盟关系上的危机真就如此地突如其来的吗？

说开了，也不是。早在乌克兰危机前，欧盟在对俄罗斯的态度上就出现这种令人不安的漂移。我只举几个例子。2009年，在两位核心人士——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和瑞典外长比尔特的努力下，“东方伙伴关系”的构想问世。我们自一开始心里就很明白，欧盟的此项目与俄罗斯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发展毫不相关，其面对的是其他对象。尽管如此，俄罗斯表示其不作为此项倡议对象的情况下，还是衷心地向我们的战略伙伴表示能在“东方伙伴关系”框架下，对能使俄罗斯也感到有兴趣的具体项目予以考虑。但事情又怎样呢？就这些年来，未曾提出过任何项目，从而也就证实了我们对此方案的实际方位曾抱有的最坏的预测兑现。

回忆以下事件，也不是多余的。就在同一年的2009年，欧盟作为对能源领域采取完善反垄断调节的例行步骤上，推出“第三能源一揽子计划”。据后来了解，“第三能源政策”这种有追溯力的条款完全违背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有关不恶化双方开办公司及其活动条件，以及俄罗斯与欧盟国家间一系列双边协议的第34条款。在发起和随之由欧盟委员会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的同时，欧盟在能源领域采取的步骤，必然为在欧洲的俄罗斯投资方累积问题。而且，这还是在俄罗斯就乌克兰制造的烦恼事件条件下——2005年、2009年和今年——没有一次使人对俄罗斯在履行对欧盟消费者供气合同义务上有过不负责任态度的指责。

证实欧盟对俄罗斯-欧洲伙伴关系与合作的一维感知，还表现在落实2010年有关（由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推出的）组建俄罗斯-欧盟对外政策与安全委员会的梅泽贝尔格思科备忘录问题上开始采取的公开缠绕行为。如果这样一个能做出联合对外政策决定的机制被及时应用于双边合作建筑的话，就有可能避开乌克兰危机更为痛苦的



后果。这是对我们的欧盟伙伴在构筑符合俄罗斯-欧盟经贸合作迅猛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上层建筑未有准备的回应。

欧盟为了想办法将调节乌克兰内政的危机让给由海外盟友来操纵的那幅匆忙样，也是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后者的利益和动机并非与欧盟的等同。华盛顿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何种盘算，极为清楚——启动制裁的飞轮，将欧盟卷入其必将遭经济损失的“孤立”俄罗斯的进程，在“同邻”空间制造乱局，同时，为阿富汗战史后闲着不知再干些什么的北约送上一口“新鲜空气”。但欧盟一些为了履行“盟友义务”甘心牺牲初露经济复兴曙光的国家的动机，则令人莫名其妙。难道我们孜孜以求地，甚至被视为是政治“保险网”拼接的这块贸易-投资合作的面料是为了在关键时刻因一时的政治需要当为牺牲品吗？在分析目前事件进程中布鲁塞尔在对外政策上显示的无自立能力，就产生有关欧盟在原则上是否有能力成为俄罗斯或在多极世界中其他任何一国珍贵的战略伙伴问题。

但另一方面，对俄罗斯-欧盟现在对话中的“宣泄”，也该指出其好的一面：看来，其能使我们欧盟对不愿或未能应用于双方关系的那些元素的作用进行再思。具有代表性的是，欧盟在通过“制裁”决定时，首先对准“下刀”的就是这些元素。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早已成熟的有关俄罗斯与欧盟公民相互往来的免签制度问题。就俄罗斯与欧盟间保留签证制度是不合时代的事这一类话，我们听了有几十年，甚至是从欧盟领导人的口中听说的。还在2003年，当时的欧盟理事会主席普罗迪曾表示，“为俄罗斯公民取消签证将会在五年内成为现实”。同一年，俄罗斯与欧盟领导人在圣彼得堡的周年峰会上，将取消签证的目的作为双方关系的长期前景。

俄罗斯早就做有与欧盟执行免签制度的准备。对我们来说，任何拖延执行免签制度的论据，都失去其逻辑性。因为涉及的不是取消边检的问题，而只是为建筑一个真正的统一的欧洲，消除签证障碍在人际交流，经济联系上带来的精神和财政上的负担。但此进程则原地止步，而且也还不是因为乌克兰的危机问题，实际上其早就出现，尽管形式上签证课题的对话被冻结与乌克兰事件“相挂钩”。

为证实这一点，我以2005年对简化签证协定进行修正的工作为例。协定基本上都已协调一致。更新的文件显著扩大了享有简化手续获签证的范围的人，包括公民社会代表、记者、学者、运动员，合法居住在俄罗斯和欧盟两地公民的亲属。但批准更新协定的决定，在欧盟需要的甚至不是一致性的赞同，而是法定多数。这个多数两年来怎么地也凑不上。我们的一些伙伴就是利用这一点对简化签证手续提出越来越多“担保”的保留条件，企图借俄罗斯-欧盟关系的其它领域来解决问题，发挥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们甚至企图指控我们似乎一些确实需要简化签证手续的人成了某些“特权官员”利益的牺牲品。实质上，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学会信任自己的伙伴，在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结局问题上表现建设性态度。

就欧盟今天单方面决定冻结的有关签署俄罗斯-欧盟新基础协议谈判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庆祝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签署20周年之际，我们也坦率承认，协定中有许多条款已过时，不再反映经贸发展和政治联系的水平 and 深度。这20年来，俄罗斯和欧盟都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了欧亚一体化制度以及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欧盟改革条约。就因为这些原因，双方领导人做出决定联合拟定具有法律约束的新协定。

这些谈判一开始就负有艰难曲折的命运。俄罗斯积极推进被视为能决定我们合作发展方位，未来的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方式的框架性，战略性文件的新基础协议。

我们的伙伴又怎样呢？首先，其内部在授权谈判问题上，整整一年半未能达成一致，随后，两次搁置有关新基础协议的对话——一忽儿因为2008年发生的南高加索危机，一忽儿又因为俄罗斯的入世问题未解决。最后，当我国经过17年的马拉松，在做出重大妥协后终于被列入世贸组织行列后，欧盟曾试图利用新基础协议谈判从我们这里在经贸领域获得附加的让步——就是在世贸组织进行讨价还价时未能取得的让步。鉴于此，又得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伙伴视什么更为重要——拟定长期的，甚至可能是今后几十年的牢固的法律规范基础，还是短期的经济盈利？

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是欧盟对独联体空间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的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持有的谨慎态度。当然，在欧盟的某些人就恢复在当年曾作为我们统一国家组成部分的一些国家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运输联系能感到不满意。但这是客观现实，其不得被接受——就像俄罗斯接受欧盟经过几轮扩大的和里斯本改革结果进行的内部转型。归根结底，在组织欧亚一体化结构上，我们以生活，以多半也仿效欧盟本身一体化经验，但考虑到其中正负两面的经验为出发点。

鉴于此，不能不援引具有象征性的例子。当年，苏联绝不承认欧洲经济共同体，从而也不接受西欧境内深刻的一体化进程，甚至禁止苏联外交机构人员进入欧盟委员会大楼。为解决双方关系上必然会有的一些问题，工作人员就在街头上边喝咖啡边解决问题。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怪可笑的，但这绝不是笑话。不过记住这种事是有好处的，因为现在出现以下问题，欧盟领导人坚持拒绝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以及欧亚经济委员会进行的全面接触是否也在重蹈覆辙的问题。我们深信，国际关系的逻辑，或起码的健全思维早晚会做出合适的安排，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的经贸合作协定的前景也将一片看好。

乌克兰危机显示，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以及一些其它联合文件中，俄罗斯-欧盟关系的宣言式目标和我们欧洲伙伴接受俄罗斯的现实之间存在显著的失调。在全球化，边界开放和信息革命的条件下，他们显示了几乎比在东-西两大对抗阵营年代对俄罗斯行为动机更大的不理解性。根据我们的观察来判断，许多人真诚地认为，克里米亚人做出回归俄罗斯的自愿选择是“并吞”，而莫斯科在乌克兰事务上的路线说明某种其旨在重建苏联的“帝国野心”的复兴。遗憾的是，类似的神话被欧盟周边陷入歇斯底里反俄运动的媒体重复再版。这种对彼此各方臆造的、漫画式想象，就算是能简略某人的“世界图景”，但其不能使我们步步走近基于相互信任架构的统一的欧洲。

俄罗斯与欧盟是否能克服“供应方——消费方”这种简易的关系模式并过渡到新的，更高一级的合作水平，这就走着瞧吧。其将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相互抛弃陈规旧律和立志寻求相互能接受的合作参数，包括在“同邻”地区进行的基于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和统一外部安全空间“路线图”原则的合作。

我再重复一遍，在远期的未来，我深信没有能取代俄罗斯-欧盟伙伴关系的其它形式。今天企图将对撞的人，对欧洲空间两大玩家在能源、贸易投资、技术工艺和知识潜力配合下的前景有很好的理解。他们意识到真正形成自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一个独立的大陆“核心”对自己的全球计划将带来的危险。此“核心”除了一系列其它方面，其起着连接欧亚经济与政治实力中心的作用。

在此回忆普京总统今年5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讲的话很适宜。他重申，欧洲是我们传统的、重要的经-贸伙伴。我们真挚地希望今后也还将保持这种关系。普京总统呼吁欧盟，欧洲国家“始终如一地推进俄罗斯-欧盟伙伴关系与合作的新基础性协定的签署”。

我们期待头脑清醒，意识到自己在维持和加强由我们先辈好不容易地为大陆争取到的和平负有责任的力量在欧盟会居上风。当然，为此，必须终止将国家分为“老师”和“学徒”这种被习以为常的划分，放弃有害的制裁逻辑和带有冷战阴影的“零和游戏”的技艺。应当将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和遵循利益平衡基于我们的合作。我们应当相互以在国际关系上完全适用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伤害”原则为主导思想。如果欧盟表示其原意基于这种原则工作，那么，追溯20周年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或能是凝聚多世纪有关欧洲统一夙愿兑现的起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北朝鲜因素和俄罗斯在亚洲地位的加强

---

## 格奥尔吉·托洛赖

教授、经济学博士

rusmirasaf@yandex.ru

---



---

##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科学院院士、政治学博士

tork@mgimo.ru

---

### 朝鲜问题对俄罗斯的意义何在？

最近几年俄罗斯在许多冲突地区的主动和进攻性的外交政策成为国际生活重要因素。在某些炽热的局势（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就。与此同时，俄罗斯周边有其它问题地区。其中最老和按其潜力最为危险的是朝鲜半岛。

对专家社会和广大民众，俄罗斯远东这个“软肋”仍是意外情势的根源。几十年来，至今法律上，甚至实际上尚未结束的“热”战在转向滞流式对抗，半岛南北两个不可调和敌人在其相互关系上和内部生活中都发生戏剧性事变。

去年民主朝鲜的年轻领袖金正恩企图以其对南韩和美国核打击的威胁、火箭发射以及核试验来恫吓世界。后来却突然换了“外交笑

脸”，美国和南韩对此持怀疑态度，它们仍希望此政权崩溃，不愿承认其合法性。去年年底民主朝鲜的事件-对国内起“第二把手”作用的自己姑父和随后对其亲戚与拥护者的公开镇压，导致了人们对政权稳定的担心，然而这很快消散了。2014年初的标志是北方呼吁南方对话，可是美国参加的大规模南方军事演习又使局势转向紧张。今年二月，中断七年后于板门店举行的高级会晤并没有成为转向对话的标志。这里自然出现早已存在的问题。能对这个和俄罗斯接境的地区抱什么期望，这里的局势能否稳定，符合俄罗斯经济和政治任务的事态良好发展可能性有多大？俄罗斯可以和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我们认为，朝鲜半岛在实现俄罗斯“向东转”政策，即达到俄罗斯在活跃发展的亚太地区牢固地位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对于俄罗斯，转向亚太地区即转向东北亚，而朝鲜是东北亚的“关键”。然而，俄罗斯从沙俄时代以来在对待朝鲜方面一直没有足够的资金、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利用自己的潜力。应该知道，这里需要俄罗斯，它对两个都想把它“拉”向自己的国家的作用很重要。卷入了拆开“朝鲜结”的大国-美国、中国和日本也不能忽视它（尽管有时企图这样）。

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卷入了对它的安全和对俄罗斯问题较多的远东地区的经济增长都重要（从加强国家统一观点看来也重要）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解决。朝鲜问题有国际的规模-俄罗斯官方人士与各大国和国际组织人士的所有会晤都涉及到它。对于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在朝鲜的积极性意味着我国希望参与加强地区的安全与发展。

我们在朝鲜的积极方向应该如何呢？我们的立场不得不有双重性。一方面我们希望保持受到了北朝鲜挑战的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制度。如果民主朝鲜有更大的透明度和经济进步，我们都将受益，否则谈不上东北亚地区的互利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反对施压甚至推翻北朝鲜政权。半岛的稳定符合我们

的切身利益。保持现状显然有助于远东的繁荣、亚洲经济合作的发展和防止美中关系的激化。

1990年代不简单的经验表明，没有和北朝鲜的正常关系和经常的接触，俄罗斯对朝鲜政策将“悬浮”，脱离多方的调解进程。这不奇怪，因为平壤仍是朝鲜局势调解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许俄罗斯对和北朝鲜的协作比后者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最近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我们在朝鲜半岛地位的巩固及其建设性参加问题解决的程度正是取决于俄罗斯和民主朝鲜的关系及其水平。

可是不能把它看作是对平壤的不顾其行为的“姑息”，朝鲜的主要盟国-中国往往受到这种指责。有些人也指责俄罗斯“宽容”平壤好战的行动，包括称之为怀念苏联过去。情况远非如此。俄罗斯既不赞同民主朝鲜国内秩序（尽管我们按不干涉内政原则不打算进行“劝说”），也不同意其对外的挑衅行为。俄罗斯态度客观公正，从保护国际关系所有主体利益的必要性出发。自然，这不是支持北方与南方对抗或者对民主朝鲜和南韩保持“同等距离”（有时南韩有这种看法）。和两个朝鲜关系本身就有其价值，而且南韩成了俄罗斯在亚洲较有前途的经济伙伴。不过，和它协作的空间客观上受到它与美国同盟关系的限制，而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的问题相当多。

因此，朝鲜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分析证明：不管西方媒体怎样写（往往是对民主朝鲜的心理战），该国政权在可展望的未来还不很可能被“外面”更换或被内部局势的爆发推翻。只能从实际出发，必需在相当长历史时间内与平壤协作。北朝鲜的真正情况如何呢？

## 北朝鲜的实际和两难

2011年十二月多年领袖金正日逝世之后是相当戏剧性时期。金正恩甚至不是和反对派，而是和出现反对派的可能性进行中世纪式的

残酷斗争。去年夏天似乎可有己见的元帅李永昊被解职只是开端。2013年底已清楚，金正恩为了绝对政权不惜采取严酷措施。对希望扮演“摄政王”角色的张崇泽（按南韩资料，他的确企图限制这位年轻人的政权）的镇压符合真人秀的所有规则。对张崇泽及其亲戚的处决，对其拥护者的镇压成为对所有敢于怀疑“领袖指示”及其路线者的严厉警告。这个亲戚和他的父亲的亲近已不能阻止小金的行动，他以前对父亲的功劳现在成了他的罪过。

现在金正恩的重点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他表现“新风格”（米老鼠在舞台上亮相等到盛大欢迎美国古怪篮球运动员D 罗德曼的活动），对人们的近乎民粹主义的亲近。可是实际上他不仅为了自保，而且为了证实自己最大限度地加强现有政治制度基础。他从统治开始就采取严厉措施：对越境者和走私者关闭边界，镇压不服从者（首先是军人），对地方实行监察，呼吁加强反“敌对意识形态”斗争，惩罚对南韩和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感兴趣者。

这样，金正恩领导的战略问题暂时还不清楚。年轻的领袖用不小代价换来的“自由的手”去对“主体社会主义”基础进行早已成熟的改革还是继续保持其停滞和低效的系统呢？很明显，由于邻近存在较富强并得到世界社会支持的南韩的地缘政治条件，北朝鲜领导不可能容许自己进行威胁其政权安全的试验。

不过，在设定目标的预测水平上出现了新的元素，尽管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新伎俩而已。金正恩许诺国民不再需要“勒紧裤腰带”。宣布了“并进”方针，同时加强核力量和促进经济发展。尽管口号有其双重意义，它毕竟比“军事共产主义”的“先军”，即根本不谈经济的方针有一定的进步。它在高喊“国家强盛”、“无限繁荣”、“富强大国”，建设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大国”口号。不过，暂时只有示范性计划（例如高山滑雪疗养所和水上公园），提高上层和接近它的“中等阶级”的生活水平。然而，在总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前出现“穷国的富人”是许多国家走过的道路。。。



实际上民主朝鲜的上层是在寻找“新的民族思想”以帮助达到取代禁欲主义与平均主义（上层对自己并非如此）意识形态与“围城”心理的新的“社会公约”。民主朝鲜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公开声明“依据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主义遗产的主体思想实际上并非马列主义思想，而是完全不同的XXI世纪革命思想”。显然，更改的意识形态可基于对越来越具宗教性（如孔子学说）的金日成主义“创造性诠释”。而宗教的教条可以有不同解释。。。

经济上可能有实际改革么？2012年曾有许多迹象表明民主朝鲜在讨论实行基于2012年六月28日指令的有限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中包括农村的“家庭承包”，和国家7：3分成。工业方面推行提高工资和工厂管理自主性的“新管理系统”。可是和以前一样，由于军事政治局势激化和资金短缺、党内干部的抵制，改革凋谢了，尽管形式上它并没有取消。重复了老情况-民主朝鲜领导已经不是首次放宽或拉紧经济监督的“缰绳”，而且每一次都对措施没来得及带来肯定成绩而惊奇。

可是这并非意味着“经济冻结”会永远持续下去。诚然，对被控贱价出卖资源（据报道，中国人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一倍半的价格向中国出卖无烟煤）、沉迷资本主义，与“某个大国勾结”的“张崇泽小集团”所使用的词汇，证明金并不愿意公开“走中国道路”。但是在他的新年讲话中把经济放在第一位表明他理解国家的迫切问题。看来平壤已认识到走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解决不了它们。

民主朝鲜国民经济早已多系统。半瘫痪的国营部门（超级国防生产综合部门的除外）和准市场“灰色”部门（外贸部门-主要和中国联系、私营贸易服务部门、交通、物流甚至财政部门）和属于行政、地区、党机关、特工机关、军事机关的经济主体的“贸易”部门并存。据报道，它们的营业额可以和国家预算相比。

自由经济区值得特别注意：民主朝鲜早已进行这种试验，但不很成功。原因是法律不透明、存在随意改变游戏规则的风险（此种例

子很多），总体的不良投资环境。2013年朝鲜劳动党三月中央全会通过了建立旅游和自由经济区的决议，五月份又通地了规定在各省建立14个自由经济区的决议。

消灭张崇泽派的事件表明实际形成了“寡头”模式，上层的各个集团利用行政资源发展自己控制的整个部门经济。据某些资料，“张崇泽案件”正是与其不愿意“分享”诸如煤炭、金属和海产资源出口的财政来源有关。

值得承认的是，只是在除了外国投资，无可融资的情况下，改革才能顺利。今天民主朝鲜的最大投资者是中国-它的扩张甚至被称为对民主朝鲜的“经济殖民”。如果民主朝鲜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并和南韩搞好合作，后者能在对北方经济的投资与现代化方面居领先地位。

### 民主朝鲜政治孤立的原因果

问：怎样达到那怕是部分摆脱北朝鲜孤立并改善金正恩和西方与南韩的关系呢？而这是改善该国经济状况的完全必要的条件。

暂时局势发展仍是“恶性循环”。美国政治阶层不能同意平壤那样放纵的极权主义，南韩也不愿承认民主朝鲜是平等伙伴并幻想尽快统一。此外，美国希望在接近中国边界的敏感地区保持“可控的紧张”，利用它作为抑制中国和保持自己军事存在的因素。中国也未必很高兴民主朝鲜和美国关系迅速转暖并增大美国在自己边界地区的影响。谁都不特别希望朝鲜的统一，尽管南韩的未来真正目的是吞噬民主朝鲜，这追求得到美国支持。

最近几十年的事件符合普通的“钟摆摇摆”系统。经常的压力迫使平壤军国主义化并进行挑衅，随后会对它加强施压，而后来为了避免局势的危险激化又转向和谈，把民主朝鲜的任何折中让步看作是软弱表现，企图“加压”平壤，导致它采取新的激烈行动和再次导致局势激化。

这种系统多次重复，可是金正恩执政之后其摇摆幅度增大了，这可能是主观的因素。当民主朝鲜和美国的核问题谈判达到某种协作方式时，2012年四月民主朝鲜发射宇宙火箭又对进一步的正常化（2012年二月的所谓“高级协议”）的步骤造成了问题。这是为纪念金日成诞生100周年的计划行动。谈判者本应等待与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弹道火箭”发射有关的叫嚷结束后才签约，可是，尽管美国已得到关于发射的通报，还是签订了协议，然后宣布民主朝鲜违反决议，启动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结果是局势又激化，接触又中断。

在这次较成功的卫星发射（2012年十二月12日）之后，联合国不再像2012年四月那样仅局限于声明，采取了更严厉的方式-通过了2087项决议（22.01.2013）。平壤就此声明“再不存六方谈判，也不存在九月19日联合声明”，并为表示抗议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

（12.02.2013）。2013年三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此通过了2094项决议，对北朝鲜实行更严厉的制裁。平壤以系列极其强硬的声明回应，威胁对其敌人进行核打击，许诺“在地球表面抹除他们”。

对方举行了美韩的“关键resolve”和“雏鹰”演习，向南韩调派进攻武器。美国决定在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范围内于阿拉斯加增加部署截击火箭，在关岛空军基地周围部署“爱国者号”导弹发射架，B-52可从那里飞往朝鲜，载核武器美国军舰可以周期性地进入南韩水体，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可以在民主朝鲜附近飞行。2013年三月2日和8日美国战略轰炸机B-52和隐形飞机B-2 演练了对北朝鲜境内的核打击。2013年三月民主朝鲜宣布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和相应的与南韩的协议，取消北朝鲜和美国、平壤和首尔军方代表之间的“热线联系”。四月份平壤通过了关闭最后一个和南韩的联合计划-开城工业园的决定。

可是突然（随着美韩军演结束）军事歇斯底里消寂了，后来金正恩自己也承认“过火”。从平壤传来关于和南韩签订和约，和美国举

行高级会晤的建议。与此同时全世界都已清楚民主朝鲜的威胁未必可能实现，因为这对它本身等于自杀。北朝鲜终于不得不同意南韩关于恢复开城工业园运营的条件，同意在未得到对方让步情况下恢复联系。正因为这样，北朝鲜的和平建议受到怀疑，南韩和美国认为这是它软弱表现，孤立和施压政策毕竟收到了效果。

民主朝鲜关于和南韩改善关系的新年建议也缺乏说服力并实际被否定。不能排除，2014年二月底到四月的美韩“关键rizolv”和“雏鹰”演习并在其范围内演练“进攻和占领平壤”使局势激化。民主朝鲜已经警告，举行它们等于“宣布全面核战争”并“全面破坏两个朝鲜之间关系”。

到2014年初几乎被称为“朝鲜的戈尔巴乔夫”的北朝鲜领袖以其在国内的排挤和镇压与对外的冒险大大损害了其在西方的声名。与此同时，他严重冒犯了唯一的盟国-中国，中国对他的核火箭挑衅，磨刀擦掌、在“张崇泽案件”范围内排挤与中国密切合作者很不满意。这样，中国在和美国、南韩和日本联系时已不再为自己的“客户”求情，而民主朝鲜的敌人则相反地越来越不对它让步。已看不到首尔缓和与民主朝鲜的政策，美国放弃“战略忍耐”（实际上是遏制民主朝鲜）方针的迹象。

### 对俄罗斯的新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有何利益和可能性呢？它能帮助缓和紧张与实现多方经济合作吗？看来在今天情况下民主朝鲜领导应该是特别希望俄罗斯的中间调解。一方面，它希望脱离“中国伞”并在美国、南韩和日本的压力增大面前得到俄罗斯这个有影响的全球玩家的帮助。民主朝鲜需要俄罗斯，如果不是把它作为经济援助泉源，就是把它作为某种“平衡器”，使其对外方针得到补充支持。

另一方面，俄罗斯可以从零开始和“金正恩家族”领导建立关系，伸出友谊之手。与此同时，俄罗斯可以达到实现多方经济计划

的目的，调解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和自己边境的军事紧张局势。所有这一切符合俄罗斯对外政策理论（2013年），其中说：

“俄罗斯在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原则上致力于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与大韩民国保持友好关系，更全面利用这些联系来加速地区发展，支持两个朝鲜之间的政治对话和经济协作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最重要条件。俄罗斯一贯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地位并将在相应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括在六方谈判方式范围内全面协助和坚持不渝地推动这一进程”。

对俄罗斯政策的实际结论如何而北朝鲜的对手又应该怎样做呢？大概最适宜的是南北朝鲜的和平共处，美国及其盟国放松对民主朝鲜的施压（这样可能减少中国对自己“东部缓冲区”安全的担心）。为此必须用政治外交手段来达到保障民主朝鲜的安全。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主朝鲜缓和自己的好战情绪，开始国内经济和政治系统的现代化并最终在各大国政治保障之下放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自然，这种保障不应该成为对民主朝鲜领导为所欲为的纵容。

可是，俄罗斯和北朝鲜的问题很明显。最近一些专家，包括北朝鲜专家都认为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局势不够注意，对民主朝鲜奉行不完全真诚和一贯的政策。至于俄罗斯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反北朝鲜制裁，俄罗斯实际上没有局限于拒绝供应所谓“奢侈品”，而且拒绝带有人文性质的交易。

平壤领导的非逻辑的行为，冒险步骤显然使俄罗斯领导厌烦，北朝鲜对俄罗斯领导不理解平壤采取的“生存斗争”逻辑也表示不满。何况平壤政权掌握者的和自己的前任已不同，他们对俄罗斯只有耳闻。考虑到北朝鲜政治的主观因素（在俄罗斯政治上也同样，只是水平低些）的重要性，为了克服不理解，需要我方采取大胆步骤，包括在最高水平上（我们记得2000年正是B. B. 普京对民主朝鲜的访问成了和民主朝鲜关系正常化的分水岭）。

与此同时，北朝鲜在对我国做出善意表示，例如，在2013年庆祝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时，那里谈到了“朝俄友谊世代相传”，在主席台前的旗帜上画有朝鲜士兵、中国志愿军和斯拉夫外表的飞行员的像。这种情绪应该利用并做出象征性表示，包括利用“软力量”-举办文艺演出、电影节、赠送文学作品等等。

俄罗斯应该坚持反对孤立朝鲜的方针并通过外交途径，在它的参加之下解决半岛问题。民主朝鲜关于通过“三方或四方”来讨论问题的建议意味着把俄罗斯排除出进程。现在俄罗斯有采取更积极立场和更主动的“可能性之窗”。例如，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协助搞好民主朝鲜新领导与联合国的联系，甚至促使联合国秘书长（朝鲜族人）访问民主朝鲜并协助它和国际财政机关合作。

俄罗斯在朝鲜事务上不应该甘心让中国垄断，让朝鲜半岛成为美中不断增大的对峙的人质。

在朝鲜半岛和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对于俄罗斯首要的是遵循国际法原则和外交调解问题。多方对话和政治保障的思想正是俄罗斯的建议。“一揽子”交易（民主朝鲜的和平与安全换核武器）也正是俄罗斯在2002年提出的。显然，在我们的建议中，六方谈判进程仍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关键。时不时出现的由不要民主朝鲜代表参加的“五方”讨论问题的提议表面上虽有吸引力，但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会使平壤脱离对问题解决的寻找，转向双边的方式（首先是和美国），而在那里将没有俄罗斯的位置。

俄罗斯值得研究东北亚多方安全系统的问题-何况我们在六方进程机构中领导着相应的工作组。例如，可以提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新系统理论。它可基于六方进程所有参加者之间签订的交叉条约，这些条约在法律上固定它们的权利和对其他参加者，包括涉及朝鲜半岛局势的参加者的义务，使有可能监督其他参加者对义务的履行。

这种系统可以纳入已有的条约（美国-南韩、美国-日本、俄罗斯-民主朝鲜、俄罗斯-南韩、中国-民主朝鲜等等），包括涉及朝鲜半岛局势，将来甚至达到它们的替代。在它的范围内可以解决民主朝鲜无核化问题。这个进程自然是多阶段的和一贯性的。关于六方谈判导向理论的制订将可以把它引向合理轨道-讨论朝鲜半岛安全问题，而不仅是民主朝鲜核武器问题。

与此同时不能不考虑到民主朝鲜在可展望的未来不放弃“核遏制力量”的可悲前景，而进一步的施压和孤立会使它加强这方面。十分重要的还是，随着核和火箭计划的技术任务复杂化，同样地在“自力更生”发展核动力情况下，可能产生核设施运作和实现火箭计划的安全方面的严重威胁。正因为这样，俄罗斯作为接境国家，考虑到国际经验和标准，切身希望这些计划的实施受到监督甚至得到境外的支持。众所周知，“俄罗斯核动力局”在这方面是公认的领袖，在存在政治愿望和得到国家支持条件下可以起先锋作用。

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观点看来，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三方项目的前途。第一是从南韩通过民主朝鲜到西伯利亚大铁道的“铁路”货运项目。2013年俄罗斯-民主朝鲜联合企业“拉松孔特兰斯РасонКонТранс”结束了哈桑-罗津铁路的改建。这个试验项目成了对民主朝鲜最大的外国投资项目（3亿美元）。可是南韩没有兑现沿此路线进行集装箱货运的诺言，并把终点站改用于向亚洲市场运输出口的煤。必须促使南韩实业界参加此项目（首尔在2013年峰会后批准了它），吸引南韩人改建从民主朝鲜边境到南韩（可能到釜山港）的全部路段，以搞好从亚洲到太平洋的大规模货运。

还在1990年代就开始进行某种方式讨论的跨朝鲜天然气管道项目也没有从议事日程删除。在2008年俄罗斯-北朝鲜峰会后全面消除了关于北朝鲜对此项目不感谢兴趣，民主朝鲜不可靠的

猜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准备了向南韩出口天然气的详细的管道技术经济依据并得到了民主朝鲜的同意（为了每年向南韩供应20亿立方米萨哈林天然气投资额应为25亿美元）。可是南韩表示怀疑经过民主朝鲜供应的可靠性，向俄罗斯方面提出了难于履行的商业条件，两个朝鲜关系的激化又迫使“天然气工业公司”寻找供应南韩天然气，包括液化气的新途径。不管两个朝鲜相互关系如何，促使民主朝鲜和南韩对此项目达到相互谅解都很重要。

自然，问题不仅是和民主朝鲜进行双方的协调，而应该是对朝鲜调解的所有国际参加者发动广泛的“外交攻势”。俄罗斯专家们需要考虑集体制订类似的“路线图”。





# 欧亚经济共同体从一体化合作到欧亚经济联盟

塔伊尔·曼苏罗夫

欧亚经济共同体秘书长，经济和政治学博士

evrazes@evrazes.ru



## 一体化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总路线

一体化进程是现代世界国家之间协作的质量上新方式。它的基础是建立生产要素运作的共同条件和统一空间的统一管理系统，包括跨国组成部分。

一体化目的通常对所有一体化模式都相同，但在每个具体情况有不同的方式并且基于不同态度。多样的社会经济、地理、地缘政治、历史文化条件导致多种一体化方式，而且每一种方式都独立无二。今天我们知道的国际一体化进程是约在XX世纪中期开始的，世界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际经验。

经济一体化是各国民族经济协作和相互适应，导致逐渐联合为统一的经济空间。在国际水平上一体化通过建立地区各国的经济联盟和协调国内外政策实现。它表现在扩大和深入生产-技术联系，共同利用资源、联合资本、相互建立经济活动的良好条件、取消相互的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障碍。真正一体化的关键目的在于建立有牢固经济和社会文化联系的统一市场。

当代世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有如下形式（按相互一体化协作紧密程度）<sup>1</sup>：自由贸易区-其中对参加国取消贸易限制和关税；海关联盟-在统一的海关领土上除取消外贸限制外确立统一的海关税率并对第三国奉行统一的外贸政策；共同市场-它的建立意味着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力在统一的经济空间自由流通；经

济联盟-在达成自由贸易区、海关联盟和共同市场条约后增加关于奉行共同经济、税务、预算和财政政策的协议，建立超国家管理机构。

地区合作是保障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在世界经济系统中巩固一体化联盟地位，保障世界政治稳定的手段，因为各民族经济的融洽消除它们之间政治冲突的可能性。

### 欧亚理论的要点

欧亚理论是当代社会思想中较受欢迎和前途远大的方向之一。欧亚社会思想意识基础是XX世纪上半期欧洲俄侨中“欧亚派”学者奠立的。欧亚派学者们认为欧亚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统一大陆，另一方面是具有独特地缘政治、大自然、人口和社会文化性质的文明。

欧亚理论的奠基人（П. Н. 萨维茨基、Г. В. 弗洛罗斯基、Н. С. 特鲁别茨基、Г. В. 韦尔纳德斯基、С. М. 索洛维耶夫、Л.-Н. 古米列夫）认为：大自然本身确定了欧亚空间的共同性。它的发展基于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密切相互作用。欧亚理论学者们确信欧亚空间人民不是竞争者，而是盟友。因此，出现基于自愿和互利原则的欧亚国家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欧亚学者认为，欧亚人民已四次联合。最早联合的欧亚人民是匈奴。后来在突厥汗国范围内联合。XIII世纪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人也联合了欧亚领土。第四次的联合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建立。

1990年初哈萨克斯坦总统Н. А. 纳扎尔巴耶夫在他的“实际欧亚”理论中和在欧亚国家联盟建立计划的实现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欧亚理论家们的思想。<sup>2</sup>

### 哈萨克斯坦总统Н. А. 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计划

苏联后空间的现代欧亚一体化源于1994年三月28日哈萨克斯坦总统Н. А. 纳扎尔巴耶夫在莫斯科国立М. В. 罗蒙诺索夫大学首次提

出的建立欧亚国家联盟计划。1994年七月8日计划登载在“商人报”<sup>3</sup>上，后来在政府机关会议和媒体多次对它进行了讨论。

此计划是在我们国家蒙受苏联解体后果、分裂和系统经济危机时期提出的。当时新的独立国家需要确立全新的经贸合作战略和符合改变了的地缘政治现实的新的协作机制。欧亚国家联盟计划成了苏联后各国旨在保持和发展相当长历史时期欧亚国家之间存在的经济、政治、交通和社会联系的行动指导原则。

为了创造哈萨克斯坦总统的欧亚国家联盟计划的实际基础，研究了欧洲国家一体化进程和欧盟建立经验，确定了在苏联后空间建立国际一体化新模式的立场，建立了形成欧亚国家一体化的结构基础，确立了给予一体化进程稳定性的法律基础。

按照欧亚国家联盟计划，联合欧亚国家的基础应该是经济的相互联系。欧亚国家联盟的建立应该为确立对市场改革、欧亚国家民族安全保障、它们共同进入全球经济系统的行动的协调立场服务。这个任务应该通过地区各国建立统一经济、海关和人文空间来完成。

欧亚国家联盟应该在不损害主权，不干涉内政，尊重每个国家确定其国家制度情况下进行。欧亚国家联盟模式建立的优先重要原则是对一体化的务实态度、经济适宜性和联合的自愿性。计划基础是“不同速度和不同水平的一体化”理论。它规定每一个相互合作形式、速度和水平的选择取决于每个参加国的意愿和兴趣程度。

计划中还强调经济一体化问题的解决要求建立超国家机关-类似欧盟的机关。这个机关应承负调解各国在经济、法律、海关、生态、文化和教育方面的相互关系。

可是，在1995-2000年欧亚国家联盟计划虽然有不少拥护者，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没能得到实现。在一体化的这个阶段欧亚国家用试错方法寻找了可行的合作道路。只是在2000年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后才开辟了加强欧亚一体化并把它提到新的高度的途径。

2014年四月28日，即在计划公布二十年后，哈萨克总统在莫斯科国立M. B. 罗蒙诺索夫大学发表了题为“从欧亚联盟思想到欧亚一体化新前景”的演讲。他在其中指出：“欧亚国家联盟计划成了

今天称为欧亚一体化的新历史进程的起点。当年独联体大部分政治家没有给予应有评价的欧亚思想，今天在实业界和在社会人文水平上得到广泛传播。出现和顺利工作着许多贯穿欧亚一体化思想的共同平台。

地区一体化是向全球威胁斗争的方法，欧亚联盟可以成为全球水平其他联盟的竞争者。欧亚一体化在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全球工业革命面前能保障其参加国的战略优势。我深信，XXI世纪将是欧亚繁荣的世纪。我们国家将成为这些事件的中心。

这样，H. A. 纳扎尔巴耶夫不仅确立了新的欧亚思想，而且制订了具体的计划，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俄罗斯总统B. B. 普京，苏联后其它国家领袖的支持，经过了一定的进化过程之后，形成了今天的欧亚一体化。

###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苏联后空间经济一体化的核心

2000年五月23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总统在明斯克通过了建立具有国际地位，拥有解决一体化协作问题广泛全权的新经济组织的决议，组织有明确的结构和高效工作的机构与机制。

2000年十月10日这五个国家首脑在阿斯塔纳签订了关于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条约。它在2001年五月30日生效。共同体的成员是这五个国家，三个国家（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成了观察员。<sup>4</sup>

条约规定共同体目的是实现实际的一体化进程，这有助于推动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建立海关联盟。为形成能保障商品、服务和劳力在统一经济领域自由流通的欧亚经济空间开辟道路。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协调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和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系统一体化的立场。共同体的战略活动方针是在保障各成员国高效利用所有潜力情况下的经济活跃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各国首脑在签订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的同时通过了声明，确定了在共同体范围内必需解决的任务。它们涉及外贸、海关、经济

政策、社会人文和法律方面。这些任务成为制订欧亚经济共同体基本纲领文件-2003-2005和此后年代实现欧亚经济共同体重点发展方针的活动，2008-2010和以后年代的活动，还有2011-2013和以后年代活动的基础。

欧亚经济共同体优先发展方向是：1) 建立海关联盟；2) 奉行协调的经济政策；3) 在经济的实际部门协作；4) 建立和共同发展能源市场；5) 建立交通联盟并利用共同体交通潜力；6) 在农工综合体方面协作；7) 建立服务业共同市场；8) 建立共同财政市场并发展货币一体化；9) 在社会人文和移民政策方面合作；10) 扩大欧亚经济共同体机关的全权。

共同体机关构成完整的系统，其中每一个都是和其他单位密切联系的独立单位。共同体的法定机关有：跨国委员会（国家首脑级和政府首脑级）、跨议会大会、共同体法庭。共同体机关主席每年由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轮流担任。部门理事会和委员会是重要工作机关，它们的成员是共同体国家的部长和副部长。欧亚经济共同体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为共同体所有机关活动提供组织和信息保障。

现在共同体共有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140个条约（海关联盟条约和统一经济空间条约除外）。

欧亚经济共同体有国际地位，是联合国观察员。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关于和国际组织协作的35个备忘录。它的主要国际伙伴是联合国及其组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联合国工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有欧盟、世界海关组织、欧安组，在地区组织中有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多次指出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和联合国系统组织的密切合作。

欧亚商务局在欧亚经济共同体范围内工作，它协助互利的经贸合作，企业的分工合作，吸引实业界纳入一体化进程。

2005年建立了欧亚开发银行，它为具有一体化效能的项目融资并研究经济一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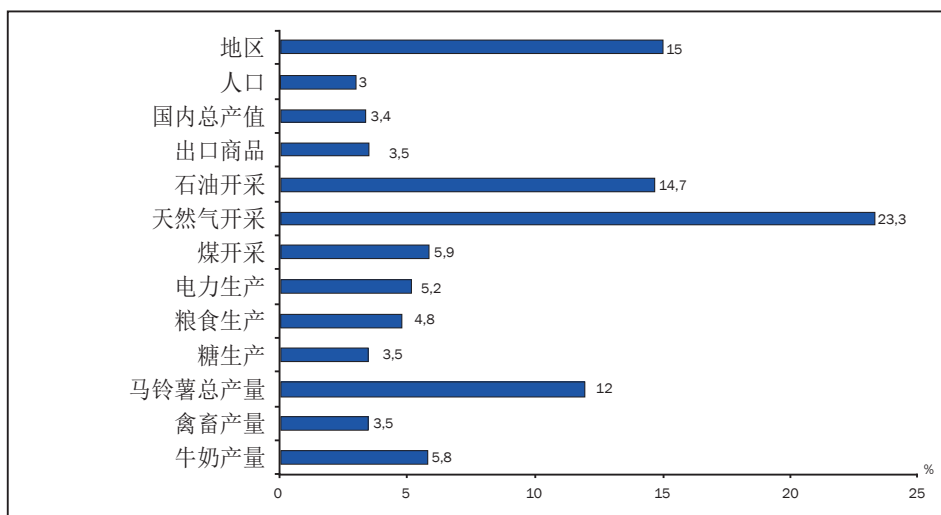
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在克服2009年财政危机后果的共同措施范围内建立了为各成员国提供财政和投资贷款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旨在联合制订和实现科学技术纲领与创新计划的高工艺中心。中心和俄罗斯“斯科尔科沃”基金积极合作。为了实现共同项目，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相应机构参与下建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创新工艺中心”风险投资公司”。2012年一月新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法庭开始为解决共同体和海关联盟内部的经济争议而工作。

现在共同体成员国在制订和实现一系列跨国计划和理论，包括在国际活动、食品安全、建立共同能源市场和统一交通空间方面。2011-2015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实现跨国的专门计划“创新生物工艺”；从2013年开始实现六年的“铀矿开采影响欧亚经济共同体领土开垦”跨国计划。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世界上有最大领土、强大矿物原料基地和巨大经济和外贸潜力的地区市场（图1）。

图№ 1

### 2013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在世界数据中占的份额 (占结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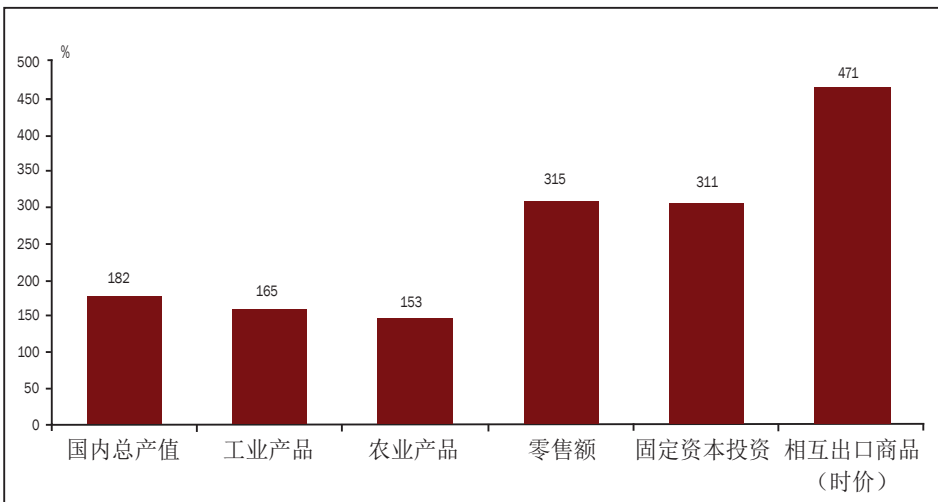
来源：独联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石油公司，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资料

欧亚经济共同体创建14年来建立了保障纵向和横向一体化进程机制的广泛系统，有助于为民族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大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减少商品、服务、劳力流通障碍达到它的多样化。欧亚经济共同体协调进行社会和劳动市场方面改革（而且社会一体化的深入要求转向更高的社会标准），对主要的国际问题制订统一立场并协调行动，以便共同努力对付全球挑战和现代威胁。我们还可以在平等、相互补充和互利条件下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盟友协作。

共同体国家的一体化既考虑到欧盟的正面经验、动力和速度，也考虑到它曾克服的困难与问题，而且对欧盟的经验总是进行重新思考，使之适应我们的条件。

由此可见，过去年代充满了社会经济方面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它们导致了经济进步和广大居民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图№ 2和表№ 1）。

图№ 2  
2013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宏观经济平均数据和2000年的比较%  
(固定价格)



来源：独联体资料

和表№ 1  
2000年和2013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居民生活水平主要数据  
(按各国货币对美元汇值)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人均国内总产值					
现价值, 千美元					
2000 年	1, 1	1, 2	0, 3	1, 8	0, 1 <sub>5</sub>
2013 年	7, 5	12, 9	1, 3	14, 5	1, 0 <sub>5</sub>
固定价格, 对2000年倍数.	2, 3	2, 3	1, 5	1, 8	2, 1
平均工资					
年平均, 美元					
2000 年	74	101	2 <sub>5</sub>	79	8, 5
2013 年	573	714	23 <sub>5</sub>	942	147
2013年平均实际数量(消费物价指数调整后)对2000年倍数	4, 8	2, 8	3, 5	3, 4	9, 5
平均养老金数额 (十二月份)					
2000 年	31	28	10	29	1, 8
2013 年	220	204	132	302	38
收入(支出)低于最低生活费(贫困线)者占人口比例					
2000 年	29	47	55	28	...
2013 年	5, 5	2, 9	38	11	47

来源: 独联体统计资料。



共同体成了苏联后空间经济一体化核心，因为它保障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实际一体化，建立了海关联盟、统一经济空间也开始形成，通过了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sup>5</sup>

###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海关联盟

依靠建立无例外和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区，2008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相互贸易额比2000年增加了3.2倍（从290亿增到1230亿美元）。这为过渡到一体化下一个阶段—建立海关联盟创造了前提。

2007年十月9日在杜尚别举行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跨国委员会会议上，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首脑通过了建立海关联盟的决议。当时还批准了建立海关联盟的行动计划。

海关联盟最初阶段由共同体经济发展最重要数据较接近的三个国家建立。最近亚美尼亚将和“三国”联合，随后将是吉尔吉斯斯坦。

国家首脑级和政府首脑级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间理事会从一开始就成为海关联盟的最高机关。还建立了第一个超国家机关—海关联盟委员会，参加它的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副总理。从2012年起这个委员会被撤销，其职权移交欧亚经济委员会。

从2010年一月1日开始实行统一的关税率和统一的关税和非关税调节规则，从2010年七月9日关于海关联盟的海关法条约生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界的海关监督从2010年下半期不再存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边界的海关监督从2011年七月1日撤销。

结果，从2011年七月1日起海关联盟按所有的国际标准全面生效：建立了统一的海关区域，海关联盟国家之间的海关手续由于它们转移到外部边界而全部取消。除边界监督之外，所有各种国家监

督机关（海关、交通、兽医、卫生和植物卫生）都转移到海关联盟的外部边界。

进口关税金额分配比例：白俄罗斯-4.70%，哈萨克斯坦-7.33%，俄罗斯-87.97%。

海关联盟的工作导致扩大分工合作和减少企业与居民的时间和资金花费。实际法律机制已启动，它使有可能不仅在自己领土上，而且在整个海关联盟境内进行高效的商业活动。按统一经济委员会的资料，2010年三国的贸易额比前一年增加了29.1%，而2011年-33.9%，2012年-7.5%，2013年同比降低了4.9%，2014年一月到七月同比下降了10.7%。

现在主要不是依靠外面需求，而是内部需求保障三国工业、农业、服务业方面的企业负荷。在“三国”贸易范围内增加了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比重。海关联盟生效以来，相互贸易的原料资源部分比重从40%减少到了33%，即改善了贸易结构，工艺产品，高增值商品取代原料商品。

海关联盟给了我们国家公民好处的最明显和最雄辩的例证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7,5千公里边界上不再有两国的数千名海关人员工作。仅邻近各州（俄罗斯方面的人口为2千5百万的12个地区，哈萨克斯坦方面的人口将近为5百万的7个地区）就有数百万人能自由通过边界，无需办理海关手续。

俄罗斯科学家们认为十年来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建立的总的效益是每个参加国国内总产值增加17-20%，而总数将近达到7000亿美元。

## 统一经济空间

海关联盟的顺利工作为进一步深入一体化创造成了条件，使有可能开始转向欧亚一体化的下一个阶段-建立统一经济空间。2009年十二月19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总统在阿斯塔纳举行的非正式峰会上批准了2010-2011年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行动计划。

欧亚经济共同体参加国国家首脑的政治意志、政府和机关的积极工作使欧亚经济共同体间理事会有可能用一年，而不是计划的二年时间制订和通过了关于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国际文件。2010年十一月-十二月欧亚经济共同体间理事会（海关联盟最高机关）通过了由17个国际基本协议组成的一揽子文件，奠定了统一经济空间的法律基础。这些协议都已得到批准，2011年十二月19日三国首脑在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上通过了从2012年一月1日使它们生效，即统一经济空间开始工作的决议。

统一经济空间是统一市场，实业家们不仅可以自由销售商品，而且可以提供服务，还能够进入动力网、交通和通讯部门。统一经济空间有同一类型的经济调节机制，实行协调的税务、货币贷款、金融财政、贸易和海关政策。

统一经济空间的主要优点：

- 为民族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更大的市场；
- 通过减少商品、服务、资金、劳力流通障碍达到经济增长及其多样化；
- 统一经济空间除了传统的扩大相互贸易外，特别重视发展财政和投资合作、科学生产分工、深入发展人的潜力；
- 提高大、中、小实业的商务积极性，建立跨国生产和贸易联合体、合资企业；
- 提高每个成员国和整个统一经济空间的经济安全水平；
- 建立和共同发展能源市场，建立交通服务共同市场、统一的交通系统和利用统一经济空间国家的转运潜力；
- 统一市场对相互的和外国的投资与创新有更大的吸引力，实业家们可以得到补充的资源，保障经济加速发展和创造新工作位置；
- 搞好组织劳动移民方面秩序；
- 大大方便了公民们交通联系，他们可以在共同的劳动市场建议自己的力量和劳动技能，而且劳动移民能得到法律保护，他们及其家属能得到法定的医疗和教育服务；

- 在和其它国家关系上和国际组织水平上共同坚持自己利益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三国”并没有和其他市场隔离，相反地，它既希望和个别国家，也希望和一体化联盟，包括欧盟发展多方合作。欧洲和欧亚的一体化能很好地相互补充。

###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

2011年十一月18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总统签署了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和关于欧亚经济委员会条约以及它的工作规则。

宣言中声明，进一步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将是全面利用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潜力，完善和继续发展其法律基础、机构与实际协作。下一个阶段是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即在统一的市場，在高效利用共同潜力情况下发展政治和经济团结的社会。在欧亚经济联盟将不仅联合市場，而且联合共同体国家的战略计划与发展前景。

欧亚经济委员会成为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常设超国家调节机关。委员会在2012年开始工作，统一经济空间也同时启动。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在2014年五月29日由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国家首脑签订。条约应在2014年年底之前批准，欧亚经济联盟将从2015年一月1日开始形成。摆在面前的是实际贯彻条约主要条款的多年复杂工作。<sup>5</sup>

按照条约，在联盟范围内保障：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力自由流通；经济方面奉行协调的（即在共同立场基础上合作）、议定的（和谐的法律调节）或统一（采用的统一的法律调节）的政策。

欧亚经济联盟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组织，是国际法律主体。欧亚经济联盟按照联合国宪章、其他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包括世贸组织准则建立。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尊重各成员国的政治制度。欧亚经济联盟所有水平的决议都按一致赞成的原则通过。

欧亚经济联盟目的是：1) 为旨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成员国经济稳定发展创造条件；2) 建立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力统一市场；3) 在全球经济条件下实行民族经济的全面现代化。

欧亚经济联盟必需加强成员国的经济，保障其和谐发展和接近、实业积极性的持续增长、平衡的贸易和诚实的竞争。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共同行动以保障经济进步，努力解决面临的关于经济稳定发展、全面现代化和加强各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范围内竞争能力的问题。在需要对付外来威胁的今天，联盟国家经济的接近问题特别迫切。

欧亚经济联盟机关：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国家首脑级）、欧亚跨政府委员会（政府首脑级）、欧亚经济委员会、法庭。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可以决定建立相应方面的辅助机关（成员国国家机关领导人委员会、工作组、专门委员会）。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基于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条约法律基础，它们经过修正、完善，符合世界海关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规则。这就决定了条约结构：第一部分确定欧亚经济联盟机关及其基本原则、目的、能力、权利和预算；第二部分规定海关联盟活动；第三部分规定统一经济空间工作；第四部分内容中有关于海关联盟最高机关和欧亚经济委员会以前通过的决议的取消或继续的法律条款。

为了使联盟正常工作必须完成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条约法律基础的编纂，消除来自普通贸易和投资制度的其他豁免，保障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力资源的自由流通，协调反垄断、货币财政和税务预算方面法律。

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中对一些要点规定了必须完成的具体期限，以保障欧亚经济空间建立的总的速度。例如，药品共同市场和

医疗器材共同市场应该在2015年一月1日之前建成。在联盟范围内关于提供工业补贴统一规则的国际条约应在2017年一月1日生效。电力共同市场应在2019年7月1日建立。到2020年一月1日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应该就电话服务定价确立统一的立场。石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共同市场应在2015年一月1日之前开始全面工作。到2015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还应该协调自己在财政方面的法律并在阿拉木图市设立调节金融市场的超国家机关。

应该指出，欧亚国家达到的发展水平和继续一体化的前途为每一个参加国和整个联盟的社会经济稳定增长创造可靠前提。与此同时，它们还需要解决经济、相互贸易、社会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加速一体化进程。因为我们各国已达到的经济和财政系统发展水平不同，国家对经济参与的份量也各异，它们并非同样地纳入了世界经济进程和全球商品、服务、贷款和投资洪流。

有利于强化联盟内部的外贸联系地理的改变能大大提高各成员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中期前景就可能达到减少对世界价格波动和其他外部“休克”的依赖（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必须奉行保障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特别是直接投资）数额的增加，使之减少对外国（往往是投机性的）投资依赖的政策。

预料苏联后的其他国家也将参加欧亚经济共同体，从而得到飞跃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正在这方面积极努力，已通过了关于它们加入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路线图”，进行着使这些国家法律适应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法律基础的工作。今年十月在明斯克举行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会议（国家首脑级），计划审议接纳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问题，可能签订相应的协议。\*

\* 不久前问世的如下著作：曼苏罗夫 塔伊尔。实施的努尔苏丹 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计划。欧亚计划20周年。1994-2014, М.: Реал-пресс, 2014. 362 с;  
曼苏罗夫 塔伊尔。欧亚经济一体化：经验和前途。М.: Русский раритет, 2014. 360 с.

## 欧亚经济共同体：总结成果和向新的一体化方式-欧亚经济联盟过渡

14年来欧亚经济共同体在自己的活动中顺利地完成了摆在其面前的任务：建立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法律规则基础，结果导致三国海关联盟从2010年一月启动并在2011年七月1日开始全面工作；统一经济空间从2012年一月1日开始运作；共同体成员国根本解决了教育、卫生、文化和生态方面的许多社会人文问题；共同实现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纲领和计划；跨议会大会、法庭、欧亚开发银行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商务理事会在积极工作；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会和高工艺中心也顺利工作着。

共同体已在联合国登记并和它的结构，和欧盟、国际原子能机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等其它许多国际组织高效合作，促进了欧亚一体化的加速。

共同体作为权威的国际组织形成，按俄罗斯总统B. B. 普京的话说，它成了“独联体空间最顺利的一体化联盟”。我们的公民们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这些年代所有成员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得到了明显提高。<sup>7</sup>

欧亚经济共同体确定了苏联后空间多年的一体化发展方向，它在趋向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签订和批准之后，共同体的主要任务正式宣告完成，今后海关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进一步发展问题将由欧亚经济联盟处理，而社会人文方面问题的解决将在欧亚经济共同体范围内通过的国际文件基础上进行。

这样，欧亚经济共同体在完成自己历史使命后将于2015年把它传递给新的一体化联合体-欧亚经济联盟。联盟的建立及其积极的工作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以后会加入它的其它国家的未来都有历史意义。欧亚经济联盟将可以和现代多极世界的其他各个极平等竞争和合作，把我们国家提升到新的一体化水平并引向完全不同的XXI世纪地缘经济现实。

- 1 Balassa B.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1961.
- 2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Мансуров Т.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проект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воплощенный в жизнь. К 20-летию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екта. 1994-2014. М.: Реал-Пресс, 2014.
- 3 Назарбаев Н.А. Проект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государст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06 (782). 8.06.1994.
- 4 Евраз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Сборник баз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2010.
- 5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Мансуров Т.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опыт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 Русский раритет, 2014.
- 6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163855/](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163855/)
- 7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Межгоссовета ЕврАзЭС,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В.Путин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госсовета ЕврАзЭС 19 декабря 2012 г.





## 谈俄罗斯任上合组织主席期间的某些政治任务

### 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

2004-2009年-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

高等经济学校教授

vzakharov@rambler.ru



今年九月中旬在杜尚别举行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峰会，它成了俄罗斯就任此组织2014-2015年主席的开端。

今天，考虑计划事件时间表和当今阿富汗与和乌克兰一触即发局势的进化，观察上合组织负责区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可以断言，这段时期俄罗斯的主动和协调作用将经常用于诸如不断激化的地区和整个世界政治、军事和社会不稳定、恐怖和麻醉品威胁、外来势力继续企图巩固，甚至扩大自己在中亚存在的挑战的影响之下。

### 上合组织在解决阿富汗问题和对抗国际恐怖主义与贩毒集团方面的作用

俄罗斯就任主席正好是国际协助安全部队主力撤离阿富汗时期。众所周知，至今还未议定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与西方大国关于外国武装力量在该国存在的协议的主要条款。今天只能指望民族武装力量能顺利对付塔利班并保障国内秩序。不能完全相信不久之前赞助者许下的帮助、投资和贷款的诺言能得到兑现。怎能兑现呢？如果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内战或分裂为几个部分的深渊。

上合组织怎么办呢？今天组织对来自该国的危险性有共同的感受。这从它建立原因和国家首脑与外长的会晤正式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还有明确阐明的不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的立场，其中完全排

除诸如派出军队或有限部队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所有苏联后国家都熟知阿富汗综合症，都理解应怎样和阿富汗打交道，2013年比什凯克峰会通过接纳阿富汗为观察员国家就是对此的明证。当时上合组织对现阿富汗宪法政权只是表达了一般的政治支持：X. 卡尔扎伊是上合组织所有峰会的常客，他对各成员国进行了许多访问。他的代表们按时参加了在那里就阿富汗问题举行的所有活动。

不难看到，各成员国还未确定如何及时对付事态发展的所有可能情节，但都理解到，如果恐怖主义超越边界，应给以协调和强有力的打击。为此已十多年在建立总部设在塔什干的上合组织反恐怖地区结构。毫无疑问，护法机关将得到每年举行反恐怖演习的各成员国军事力量的支持。

此外，上合组织内部，尽管有反对意见，正在审议俄罗斯关于在地区反恐怖结构基础上建立负责协调反恐怖主义、非法贩毒，贩卖武器、有组织犯罪的斗争和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的万能中心的建议。一句话，要建立能利用最新方法和工艺，对所有新的威胁和挑战给予有力回击的大型多功能机制。看来，所有成员国的经验都将得到利用，这可能成为成员国、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国家之间重要的信息环节。

今天上合组织国家对阿富汗问题看法分歧首先根源于它们每一个和现政权与塔利班为代表的武装反对派的关系，第二是对未来阿富汗国家-它仍然统一还是会按民族或其他标志肢解的理解各不相同。

不过，各成员国有消除阿富汗恐怖和麻醉品危险区的共同愿望，每个国家在双方基础上为此提供物质、技术和人文帮助，首先是俄罗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支持是重要的补充因素，不过，这是单独基础上的行动，是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不同的国际建议。首先是俄罗斯及其伙伴们关于建立反麻醉品带和保障国际协助安全部队及其武器撤离路线，进一步推动伊斯坦布尔进程的建议。2013和2014年相应地在它的范围内于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举行了外长会议。

总之，在俄罗斯任主席期间，为了努力协调对阿富汗调解所有问题的统一立场，将在上合组织广泛讨论阿富汗问题。正如 C. B. 拉夫罗夫在上合组织外长委员会杜尚别会议上所说的那样：“那里的局势混乱，可能对中亚地区安全造成更不良的影响。就此我们认识到进一步完善我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合组织的合作和协调行动机制的重要性”。俄罗斯外长在那里发表的另一个声明也指出俄罗斯在上合组织范围内积极促进这种对话的决心：“上合组织是讨论政治调解阿富汗周围局势问题的适宜平台，因为阿富汗及其所有邻邦都参加上合组织工作。再不存在别的类似结构。不考虑阿富汗及其所有邻邦的意见很难指望达到对其问题的某种长期、稳定，而主要是实际的解决”。

### 经济矢量：是开始进攻的时候了

俄罗斯应协助完成的第二个，但并不次要的双重政治任务在于：第一，保障整个组织的经济合作进展，第二，使伙伴们理解怎样达到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有上合组织成员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与上合组织对话伙伴白俄罗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机制（暂时它只代表中国）的协作。这里要解释的是，中国推出的这个思想暂时只有轮廓，此理论的细节未明。它概括巨大的地理范围，包括陆路、海路方案，旨在扩大中国和中、南、西亚与高加索国家的经贸合作，并为其项目融资。它大致像美国参加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伙伴合作计划，不过，谁都没有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参加它们。

先谈第一点。按上合组织章程，它是多功能合作组织。可是它的经济成分大大落后于政治和人文方面。给人的印象是，六国各部门为实现已公布的纲领和其它建立良好环境计划而努力的结果还未能吸引实业界。暂时也未能创建作为开发银行特别账号的活的资金来源。中国在上合组织范围内为实现具体计划慷慨提供的贷款也没能成为组织常设机关核算和监督的对象。（也许，我们在这里采用银行秘密原则或者“金钱需要寂静”的概念？）

与上合组织相关，形式上依赖政府的商业委员会结构和跨银行协会却过着孤立、不透明和不向组织汇报的生活。它们经常组织辩论平台，每年在峰会之前举行，但它们的报告通常涉及的是由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主体融资和实现的双方计划（即上合组织权限之外的计划）。这不完全是，或者说完全不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部门制订的文件中所写的计划—其中规定它们至少是“三方的”或依靠组织的财政结构资金的计划。这里，担任主席的俄罗斯应该实行组织已为之努力了十年的工作—活跃经济协作，提议加速建立银行结构，找到上合组织商业委员会和银行协会高效工作制度。我们要指出的是：中亚伙伴们耐心地期待着我们，理解稳定和安全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济 and 外贸合作的活跃发展。

现在谈第二点。显然，如果今天上合组织两个成员国已经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明天，后天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的加入势必导致两个联盟利益的扭合。这里引起不满的是俄罗斯承认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联盟地位，而不承认上合组织的这种地位。这意味着暂时对第一和第二种经济协作深度的考虑不同，相应地两个联盟成员国之间关税保护程度也不同。这里，正如俗话说“暂时还连接不上”，问题需要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理解。

另一方面，俄罗斯和所有中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一样肯定评价“丝绸之路经济开发区”。看来将进行结合构建中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中国计划的内容充实的对话。2014年五月总统B. B. 普京在北京访问时通过的联合声明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认为中国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重要并高度评价中方愿意在它的制订和实现方面考虑俄罗斯利益”。

正如中国同行们所说的那样，很快地将会把计划细节理解提交上合组织专家们审议，并强调必须有作为经济合作基础的政治协作。这意味着组织将在它的尝试、推行与实现方面起一定作用。我们要重复谈到的是：暂时计划的规模大大超过上合组织范围。还值得分析它的资源潜力和为各成员国利益而利用它的可能性。

此外，俄罗斯需要全面和综合考虑在上合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区“三角”中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它今天与西方对峙的广泛背景下。我们要指出奇怪的，但却是真实的情况：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区已经实际存在。怪不得中国专家们说，它的“机制”不规定采用一致通过的原则。这就是说，进程的方式将由权利和能力较多者确定，只需要对它的理论、法律和组织的构建。而且从今天的实例出发：中国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的贸易额稳居领先地位；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数量与提供的贷款也同样。中国顺利地把中亚和西亚的石油、天然气流引向本国；中国人积极建设和协助创建新公路、铁路和港口结构与保障其进入中亚和太平洋的物流设施，中国在不断地向亚洲、欧洲和非洲市场推进。

### 谈上合组织的中期发展战略

主席任期的第三个政治任务是协商和通过截至2015年的上合组织发展战略。俄罗斯制订的计划从考虑所有各成员国意见开始。文件计划在下次于乌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通过。看来，积累的经验能使工作的风格和战术方针得到一定的更改，而且能导致所有成员国中期利益的统一。

值得指出的是：中期战略制订正好是在地区和全世界生活动荡的时期，这可能影响到文件内容，因为制订者可能对最近局势的发展和上合组织高效控制政治与经济进程的能力产生怀疑。在即将进行的辩论过程中应该确立上合组织现在进程与组织的章程文件（2002年宪章、2007年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2年上合组织战略发展基本方向）中确定的目标的符合程度，以最严肃和诚实的态度阐述实际的成就和失算，以确定未来的总方向及其对各成员国中期利益与需求的吻合。

情况表明，文件的起草有助于确定各成员国今天对组织的态度和对它的未来的希望。不能排除为了统一基本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原则而空虚其内容的企图。这将表明协商各方利益矢量的差异，保持自己广泛回旋余地的愿望。

战略目标定位要求确定上合组织进一步组织建设任务，今天它在克服自己的“论坛”性质，还未成为旨在多方面合作的一体化趋势的高效工作组织。给人的印象是各方十分珍惜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损害现有的章程文件中还没有提到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

对如此重要问题没有统一怎能继续前进呢？很明显，今天上合组织还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愿意提出在上合组织基础上建立联盟的思想。因此，需要确定组织在五年后将会怎样—是联盟还是共同体，在给予这些概念的每一个明确的准则之后，其战略趋向是否会改变？是否需要平衡政治和经济组成部分意义，在这个中期计划中确定政治、经济和人文构建阶段（像东盟那样）？这里很明显，需要对安全、政治和经济局势演变的全面预测和对人文与信息合作前景的评价。所有这一切只是在对协作的每个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进行冷静评估后才可能出现。

从战略高度出发，重要的是细致考虑组织在建立将近十五年来自己的战术与上合组织宪章确定的目的与任务有多少符合。正是在那时候决定，只有建立的联盟的多功能性性质能保障“支持和巩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协助建立新的民主、正义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组织的类似的多轨道运动并非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地方得到平衡。我们说它是不同规模、不同速度和不平衡的运动。大概，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变化的国际情况，各成员国对它的不同态度与上合组织内部、地区和全世界势力均衡的更变。

今天，对现宪章提出的简化上合组织扩大标准被许多协约复杂化，它们实际上阻碍组织公开性原则的实行。我们想补充的是，吸引观察员国家与对话伙伴国家参加政治经济合作有助于上合组织的扩大，但这还没有出现，与之相关的原因如下：上述国家被迫只是“观察而不是参加积极的政治对话，也没有可能得到上合组织实际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它们最多只能得到个别成员国，而不是整个组织的帮助。因此，这里区分概念和监督其运用很重要：上合组织和成员国，前者和后者并非随时都一样。

总之，新战略制订者需要解决相当重要的，上合组织现有法规文件中未反映的问题：上合组织是否沿一体化道路前进。要知道利用一体化系统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其它地区经济联盟向来都“支持和扩大旨在逐渐实现商品、资本、服务与工艺自由流通的不同形式经济合作，协助建立贸易和投资良好条件；高效利用交通和通讯方面结构，完善各成员国转运潜力，发展动力系统”。上合组织不能走全面关税保护主义的道路。需要善于协商。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日子不远了。上合组织的关税保护主义战略应考虑这一点。

上合组织宪章中有关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时协调立场”的条款。在缺乏对组织内部一体化立场情况下怎能协调它们呢？上合组织宪章中写明了合作方向-“保障合理的自然资源利用，包括地区的水资源。实现共同的自然保护纲领与计划”。然而上合组织没有考虑到中亚各国之间的尖锐分歧和其他国家缺乏坚持要求解决地区极其重要问题的意志，甚至没有把对此的谈判和论坛提上议事日程。要知道最近几年地区人口将增加到1千万-1千2百万，咸海问题和沙漠化问题在激化，保障饮用水问题日益尖锐。

考虑到中亚地区的特点，也许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的一些专家说得对。他们建议把水当作商品，像石油和天然气那样。因为把水运到山脚下（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需要为水利和蓄水结构建设付出很大努力。也许需要考虑苏联时期的经验。当时为了所有参加者利益，水电由统一中心调节，但今天已经是需要在对所有人能接受的市场条件下进行调节。也许在制订所谓“战略”之前，值得由上合组织的一个峰会尝试就协调大自然和能源利用的那么切身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因为在领土和边界冲突未调解的背景下，上述问题的尖锐局势必然使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复杂化，一旦发生冲突时，有一些国家将不是在上合组织，而是向地区外势力寻找帮助。

但我们认为，来自中亚国家关于综合解决这些问题的倡议能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相应理解和支持。忽视问题，把它们排除出战略计划之外无助于活跃上合组织进程。

但未必可以肯定评价“协作防止国际冲突及其和平调解”的局势。在这种意义上值得提到组织对2005年安集延事件，2008年格鲁吉亚挑起的反对南奥塞梯的军事冲突，2013-2014年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领土冲突的激化，还有对今天围绕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局势的旁观态度。还可以列举许多错过了表现团结机会的其他例子。

显然，一些事件直接涉及到上合组织个别国家的利益。值得提到的是，个别国家会及时表明立场，而另一些国家却没有向严格按照共识原则通过决议的组织提出。这意味着和后者没能达成一致，原因是个别国家政治方针的多向性或者受到外来势力的压力（考虑到美国和欧盟与日本经常表示其在地区的利益）。

总的来说，尽管有如上所述，C. B. 拉夫罗夫预言式的指出：“上合组织永远不会是军事政治集团”（参加国中谁都不提出此目的）。上合组织也不是经典意义的一体化联合体。上合组织将在平等、相互协调保障安全、发展互利经济合作问题进程中发展协作。换句话说，上合组织的主要原则是自愿和共识”。

### 教育，青年，艺术

俄罗斯带着全上合组织教育空间创建的已有成就-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青年委员会方面一系前瞻计划的成果进入就任主席的一年。这里重要的是保持我们的，良好意义的领先地位，而且要在物质和组织上巩固它。今天需要国家对学校领导的更明确支持，扩大培养的专业的名单。俄罗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教育部为此拨出的不多的资金实际上是依靠发展国际联系条款的开支，而不是专门的经费。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政治重要性，应该推动它们的解决。

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所有常设机构、论坛、商业委员会和跨银行协会都应该更注意上合组织青年委员会的具有民族和创作特性的课题和活动前景。

在组织的多学科活动中明显缺乏有趣的艺术计划。独特的展览节“儿童画故事”和“我们画西湖”都是独自举行，并没有



得到上合组织的支持。正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那是从成员国、观察员与对话伙伴国家的年轻的和成熟的美术家那里搜集的画。将近十年来，在这些平台经常举行大型展览活动、艺术交流，出版了目录，进行了创作对话。但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没有组织的参与。然而依靠这些计划，上合组织在我们各国的艺术界很出名。

### 扩大上合组织的信息可能性

上合组织活动课题在媒体的知名度大大落后于联合国、北约、欧安组、东盟和其他国际组织讨论的相应问题。上合组织论坛创建者之一说，“组织的主要问题在于世界上很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毕竟这个苦涩的讽刺有一定的客观成分。

形成的情况是，在地区，上合组织在中国（使许多人惊奇的是，它的总部不是设在上海，而是在北京）、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双边合作比和俄罗斯的合作较多）的活动往往被当地居民看作是上合组织的活动。对上合组织常设机关和商业委员会的网址内容分析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举行相应的活动，例如，举行国家、政府和外长委员会会议时爆发对上合组织的兴趣。总之，今天上合组织大部分媒体资源都只涉及成员国、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国家之间合作的问题，没有全面介绍组织的活动。

与此同时，不能贬低我国和外国媒体的作用：俄罗斯的信息资源 Infoshos.ru，还有今天集中在上合组织秘书处和新闻俱乐部“伞下”的驻北京的各成员国、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国家的媒体并没有“白食”自己不很丰盛的面包。至于上合组织话题在国家、政府和外长们的纲领讲话中没有所希望的那样经常谈到，不是成员国、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官方网络上的核心，不是主要专家和政治学家们的材料核心，没有登载关于组织已经举行或计划举行的活动的有益信息，那是另一回事。总之，官方网址提供的都是记录性和礼仪性的，对它们的描述多于实际内容。

考虑到国际生活极其波动，地区可能有重大变化（上面对此已谈到过），适宜经常更新上合组织政治和立场文件，使之灵活实际。各成员国外交部相应部门领导的很少的，甚至每季度仅一次的会晤不可能高效，因为在其过程中只各自陈述立场，不解决统一上合组织立场的问题（众所周知，这需要相应的全权）。返回章程条款，值得提到：“寻找有共同兴趣的外交问题的共同观点，包括在国际组织和论坛上”也是俄罗斯任上合组织主席期间优先重要的政治任务。



## 俄-乌关系：同舟共济还是分道扬镳

**尤里·布拉托夫**

俄联邦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外交关系学院（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教授



本文访谈者是《国际生活》杂志责任编辑、历史学博士叶甫根尼娅·皮亚德舍娃

**“国际生活”：**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已有多年职业性地从事研究包括民族政治方面的俄罗斯历史的工作。是否能说居住在现代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公民是一个同一的民族？

**尤里·布拉托夫：**估计，要说乌克兰民族，不如说乌克兰人民更为正确。为什么？因为乌克兰人民由多民族组成——乌克兰人、俄罗斯人、鲁森人、波兰人、鞑靼人、犹太人等。因此，今天如果将乌克兰公民作为同一的乌克兰民族来谈论，那是不正确的。

**“国际生活”：**今天那些人能称得上是乌克兰人？

**尤里·布拉托夫：**民族首先是根据一系列特征相区别。自然，乌克兰人是指了解和热爱自己的母语，了解和珍视民族文化及其发展的人。不过这里也涉及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与信仰——三个决定任何民族归属的传统特征。

历史证实，乌克兰过去曾被瓜分为俄罗斯的组成部分，受奥匈帝国以及波兰-立陶宛联邦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这种或那种宗教影响扩大的领域的所有进程也就涉及了所有居民。其中也牵涉到莫斯科宗主教会的东正教徒，希腊天主教会信徒和罗马天主教会神

父。多种信仰也是乌克兰居民的特点之一，也就是说，其不仅是多民族，但也是一个多种信仰的国家。

乌克兰民族在乌克兰境内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其有人民——乌克兰多民族人民。例如，拿我国来说——俄联邦宪法（第3条）说，俄罗斯联邦的多民族人民是俄罗斯联邦主权的拥有者和权力的唯一源泉。是的，俄罗斯也是一个多民族和多种信仰的国家。乌克兰境内也同样如此。但我们从不说俄罗斯联邦——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国家，而是先顾及到居住在俄罗斯境内民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因此，对在乌克兰境内的人民也得同样考虑到这一点。

**“国际生活”：**是否能谈谈现代乌克兰在其目前的边界是如何形成的？

**尤里·布拉托夫：**首先得指出，1654年1月8日，根据佩列亚斯拉夫拉达的决定，乌克兰左岸与莫斯科公国统一。为此回归花去了几个世纪。还在15世纪，莫斯科大公改称自己为全俄沙皇也并非偶然，其开始推行旨在联合所有曾为古罗斯国家组成部分的东正教徒的对外政策学说。1654年的回归，就其疆域而言，只占现今乌克兰全境的六分之一。随后，从18世纪至20世纪末，乌克兰变为主权国家时，其多亏俄罗斯才拥有扩大了数倍的领土。最初是根据波兰被三次瓜分结果扩大的。何况，一寸波兰本土都没被划分，划归的只是曾为古罗斯国组成部分的领土。当年，作为俄罗斯组成部分，左岸乌克兰与右岸乌克兰统一，后又与西部统一。在20世纪此进程同样得到发展——新罗西亚与乌克兰合并。以下我想指出，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北布科维纳成了乌克兰的组成部分，战后——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又为乌克兰的组成部分。克里米亚是1954年进行的最后一次领土划分。为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克里米亚被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654年只占现有领土六分之一的乌克兰，由于俄罗斯，随后又是苏联，另有六分之五的领土在数百年内成了乌克兰的组成部分。今天，如果俄罗斯被视为是欧亚国家，那么，乌克兰就其领土面积来说，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国家。所有这一切也都亏俄罗斯。

**“国际生活”：**乌克兰自俄罗斯帝国开始作为俄罗斯的组成部分，随后又是苏联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截止1991年在苏联解体之际，乌克兰未曾有过自己的国家？

**尤里·布拉托夫：**就像已提到的，乌克兰自1654年为俄罗斯国家的组成部分。今天，乌克兰政治家将乌克兰与俄罗斯在17世纪中叶合并的事实提出质疑。独立的历史学家说，佩列亚斯拉夫协定只是标志了外交联盟，在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去世后也就失去了其法律效力。按他们的看法，当年最多也不过只是谈及同盟的事，以此完全否认了该领土纳入俄罗斯多民族国家版图的事实。20世纪初建立乌克兰国家的企图也遭到失败。这里所指的是第四号乌尼维尔萨尔草案（1918年1月），当时，乌克兰宣布自己为享有主权和独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但持续时间不长。

**“国际生活”：**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民族政治史上有哪些共同点？有关问题谈论的很多并有不少的歪曲。

**尤里·布拉托夫：**首先我想指出，乌克兰作家为了远离俄罗斯的历史，为示范历史发展中的独立方针竭尽所能。有时确实到成笑话的地步。例如，一次，我看到一本由P. 利亚赫与H. 捷米罗夫用乌克兰语合著的《乌克兰历史》书本。在这本书的第5页上我读到乌克兰民族的历史达14万年。如果加以想象，那么就会浮现地球上曾有过一段时间只有恐龙和乌克兰人存在的一幅图景。但我们应当以乌克兰在中世纪早期是以基辅为政治中心的古罗斯国家的组成部分为出发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必须记得大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人发展的发端——因为首先是古罗斯国家的原因。

鉴于此，出现许多被歪曲的事实。我只举出某些显示俄罗斯民族与乌克兰民族过去和今天相关的术语词源的例子。今天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下定义流行的有那些民族名称呢？乌克兰人常被称为霍霍尔。其来自哪里？话得从13世纪蒙古-鞑靼人入侵俄罗斯谈起。自东北到南方的所有古罗斯公国在统一的蓝与黄（象征蓝天和太阳）的两色旗下挺身而起来捍卫自己的独立。蒙古军队将罗斯公国的所有居民

一律称为“霍霍尔”。为什么？因为蒙语中至今“天蓝色”叫做“霍赫”，而“乌勒”、“犹勒”为“黄色”。因此“霍霍尔”这一民族名称既用于未来的俄罗斯人，也用于未来的乌克兰人。在与蒙古-鞑靼人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消亡的最后一个公国是加利奇-沃伦公国。这就是为什么“霍霍尔”这一民族名称就固定用于乌克兰人。

再举个例子——15世纪又出现一个今天经常被用于俄罗斯人的术语——“卡嚓普”。这一名称又来自哪里呢？如果我们翻开中世纪的地图就能看到，位于波兰以东的所有领土被名为塔塔利亚。居住在当地的居民，根据波兰诸君主的看法，其文化素质未能达到西方的水平，因此将这些“贱民”以“卡萨布”术语定义。在阿拉伯语中，“卡萨布”意味“肉”。所有居住在波兰立陶宛联邦以东的人都归于“不修边幅范畴的人”，他们不懂得包括吃肉在内的用餐礼仪。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扩大导致乌克兰人归为其组成部分，自然，“卡萨布”一词就用于俄罗斯居民，就像“霍霍尔”一词用于加利奇-沃伦公国的居民。

往后几年中出现的“新语”也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对俄罗斯人发生了术语的替换，他们已不再被称为“卡萨布”，而是“卡嚓普”。但这已是另一个课题。这里重要的是指出，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都不是上述这些民族名称的作者。

如果谈及往后的历史，那么，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引以自豪的人将如何分离？我们所谈的不仅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一人。就拿19世纪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密相连的群星璀璨的军事将领：1812年战争英雄——M. A. 米罗拉多维奇伯爵；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1853 - 1855年）期间击退了英-法联合舰队袭击，远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保卫战领导人 B. C. 扎沃伊克海军上将；杰出将领，19世纪50年代率领自己的部队远征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B. A. 佩罗夫斯基；1904-1905年俄-日战争英雄，旅顺口要塞守备司令 P. И. 孔德拉坚科。再指出19世纪的一些文化活动家：设计了诺夫哥罗德《俄罗斯一千年》纪念碑的M. O. 米克申；《为沙皇献身》歌剧唱词作者H. B. 库科利尼克。所有这些人出生于乌克兰，今天又该怎样称呼他们呢？乌克兰人民的俄罗斯优秀子女，还是倒过来？

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许多乌克兰姓名闻名于世：三次获苏联英雄称号，击下52架敌机享有盛誉的飞行员伊万·尼基托维奇·科热杜布；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带队从普季夫利打到喀尔巴阡山的乌克兰游击纵队司令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科夫帕克。鉴于此，我想指出，在乌克兰参加1941-1945年游击队运动的有苏联50个民族的代表。

拿切尔诺贝利来说，这不仅是乌克兰的悲剧，这也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当时作为苏联组成部分的所有民族的悲剧。我钦佩当年乌克兰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在此不安的日子里表现的公民勇气。为避免惊慌现象，他不仅在1985年带头在基辅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的游行活动并与民众一起吞没辐射的尘埃，他还将自己的孙子带上检阅台。但也有一些基辅的高干，据报纸报道，带上家属争先恐后地赶往机场离开乌克兰。

一些由我只是略谈的历史事件，证实了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始终同有一个历史。我们是一辈子在一起。我们挨肩地一起生活，再说，有俄罗斯人居住在乌克兰，也有乌克兰人在俄罗斯生活。我们拥有将近2000公里的共同边境。乌克兰的危机早晚会结束，我们被注定和睦相处。

**“国际生活”：**我们当然也不能不涉及克里米亚的课题。您就克里米亚的情势对乌克兰事态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有何种预测？

**尤里·布拉托夫：**《独立报》不久前摘引了对一名著名政治活动家的采访，其中说：“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是必然的。我不认为存在某种将克里米亚永远脱离俄罗斯的方式。”这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的话。鉴于此，就克里米亚问题我想说：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必修纠正。1954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划给了乌克兰。但请理解，多民族的和多种信仰的克里米亚——不是苏共中央的“礼物基金”，这是牵涉到人的命运问题，不能未经居住在克里米亚境内居民的认同而摆布。历史上犯下的这一错误得到了纠正。今天在注视电视节目时，我也亲身对此有体会。克里米亚居民说，50年后，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俄罗斯。

乌克兰现今政治活动家一犯再犯赫鲁晓夫犯下的错误。就民族关系领域，基辅当局视自己的人民为自己政策的对象，但乌克兰人民则是乌克兰曾有的，现在和今后将进行的所有政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也就是说，乌克兰人民首先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今天应当记住这一点并以史为鉴吸取教训。事态将如何发展？这个问题应由乌克兰人民来回答。乌克兰总统之一——列奥尼德·库奇马，当年在解释“乌克兰”一词的由来时说，这是掩护居住在此土地上人的天堂。就让其是天堂。但今天在乌克兰的一些临时的和一心争权的人，首先该领悟，入天堂的这把钥匙掌握在乌克兰人民——乌克兰人、俄罗斯人、鲁森人、波兰人等所有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人手中。

**“国际生活”：**数十年来，政治术语中一直使用“乌克兰问题”一词。依您的看法，今天该术语有何新的内涵？

**尤里·布拉托夫：**最初，“乌克兰”一词仅是地理性的解说。俄罗斯民族的特性经常以地域为标志：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人，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人，俄罗斯的乌克兰人，等等。“乌克兰”、“乌克兰人”以及“乌克兰问题”这些名词在19世纪初才出现于国际政治词典中。波兰特权代表——杨·波托茨基、塔德武什·恰茨基出版了像《阿斯特拉罕和高加索草原之游》、《有关“乌克兰”之名和哥萨克的起源》等一系列书。其中首次出现似乎是自伏尔加河流域来到乌克兰土地上的一种神秘的乌克兰人并推动了乌克兰族的发展。

这里也还必须特别指出，乌克兰问题在俄罗斯的出现是由波兰人提出的。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波兰民族起义进程中，乌克兰问题在国外一贯作为波兰的衍生问题进行讨论。由此，我想强调一下，在革命前的俄罗斯，乌克兰问题曾从未是内政问题，完全只是有外部强加的外政问题。

以社会各阶层代表，后又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和革命活动家为理论依据和乌克兰问题的提法做出了贡献。例如，俄罗斯历史学家H. И. 科斯托马洛夫在19世纪下半叶确定了“大罗斯人民”的概念，宣布大罗斯和小罗斯居民，即，乌克兰为“俄罗斯的两民



族”。布尔什维克则走的更远，其在用于国内进行夺取政权的民族政策框架下宣布了所谓三大兄弟民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理论。也就是说，按布尔什维克的看法，这里涉及的已不是两个俄罗斯民族，而是三个自给自足的主权民族。布尔什维克在民族关系领域一贯具有奉承态度的特性——立即将任何人民提升至民族级别。这不只关系到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但也涉及其他民族。与此同时该指出，1917年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始终是作为俄罗斯国家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显贵民族。鉴于此，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乌克兰领土从未是俄罗斯国家的边远疆域，而是大都市的组成部分。

至于所有有关是“在乌克兰”还是“于乌克兰”用词上的各种说法，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乌克兰文法上的新规则范例。根据乌克兰语言学家的构思，乌克兰语文法上的新规则应当示范当今基辅政治家将乌克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乌克兰化的“坚定”方针。过去进行的类似企图有时以笑话告终。

我想起在19世纪为奥匈帝国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领土上出现的笑话。在将当地居民乌克兰化的例行运动范围内，奥匈政权规定外喀尔巴阡的居民应当称自己是乌克兰人。但当地居民因对此民族名称的俄语存在直译的理解，拒绝称自己是乌克兰人。他们说不将自己视为是乌克兰人，因为他们是俄罗斯人并且没偷过东西。最终，居住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居民开始被称为鲁森人，而在红色罗斯（东加利西亚），他们以文法上一个“c”字母之差变为“俄罗斯”人。奥匈帝国政权就以此方式实施国内的乌克兰化方针，视这种方式首先是对俄罗斯在本区域的影响设置的屏障。我深信，强制性的乌克兰化，包括新的文法规定，都不会为在主权乌克兰的当今政治家带来如意的结果。乌克兰的多民族人民在近期的历史未来依然不能成为统一的乌克兰族。

**“国际生活”：**现在谈谈三个兄弟民族。能否谈的具体一点？

**尤里·布拉托夫：**布尔什维克有关三大兄弟民族的理论——首先出于政治需要。国家正处于国内战争状态，当时提出以任何方式保

存在俄罗斯中心的革命政权的任务，包括通过建立边境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他们自然也只以是苏维埃共和国而被接受。两个共和国作为某种缓冲带来维护中央俄罗斯。鉴于此，布尔什维克推出了宣传三大兄弟民族牢不可破的联盟的理论。

我认为，早就该把布尔什维克的三大民族的理论存放档案室并将俄罗斯民族史非意识形态化。“一树三杈”应被视为在俄罗斯，或像西方说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框架内统一的超民族。否则的话，在民族关系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伴随我们的将永远是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

我想以以下方式来解释自己的想法。拿德国来说，在当地居住的有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普鲁斯人，他们都操着相互间难以听懂的方言，但他们不算是三个兄弟民族，这是一个民族。在波兰居住的有大波兰人、小波兰人、马祖里人。波兰被俄罗斯、普鲁斯和奥地利瓜分并没导致波兰民族分解为“三个兄弟民族”。希腊也如此，也有居住在巴尔干、小亚细亚、地中海岛上的人，但他们还是一个统一民族。再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北部省份长期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统治下，亚平宁中央半岛为罗马教皇管辖，而南部省份有西班牙人管辖。然而，意大利人是一个统一民族，并非是“同根的三兄枝杈”。世界历史的经验将布尔什维克三个兄弟民族的理论置于死地。从俄罗斯民族史的角度来说，俄罗斯的超民族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宗规法领地目前也还是统一，不过，当然，有所不同。但如何使科学与政治相结合呢？

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政权将俄罗斯固有的名为诺沃罗西的领土划给了乌克兰。基辅政治家也不顾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20-30年代进行乌克兰化的负面经验，再度企图对地方居民施行强行的乌克兰化政策。但，众所周知，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一对等大反向力，任何行为会引发对等的大反向力。乌克兰东南部居民要保留自己的同一性和维护自己说母语——俄语的权利。所以，导致顿巴斯居民主张建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原因，就是因乌克兰中央政府施加的压力。今天，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发生的事件证实，人民

与乌克兰现今中央政权对阵并主张乌克兰联邦化，另有些人甚至不排除乌克兰东南部将与俄罗斯合并。

**“国际生活”：**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顾及到乌克兰自己缺乏国家机构经验，您认为那种国家形式对乌克兰更适宜？

**尤里·布拉托夫：**首先应当予以乌克兰人民自决权。如果今天乌克兰东南和东部提出举行公投和赋予乌克兰国家联邦地位的问题，那么，看来应当听取这些意见。理由极为简单，因为乌克兰西部的州与乌克兰南部和东南部，从语言文化，从这些领地在历史上的形成以及宗教的角度来说，是互不相容的。所有这一切都该被考虑到，此外，当然应当让人民进行表态，随后再做决定。是的，20年时间不算长，但就这个时间证实了俄联邦民族政策的正确性。我们建立联邦体制的经验，尽管遇到一些困难，但还是具有肯定性。希望能考虑我们的经验并应用这个经验。

**“国际生活”：**有一种看法，在当今条件下只有强硬的专政才能阻止乌克兰完全解体。如果选择了这种发展途径。其结果会如何？

**尤里·布拉托夫：**强硬专政将导致1957-1987年事件的重演——乌克兰内战。强硬政权、强硬专政为乌克兰带来何种结果？乌克兰被分裂为左岸和右岸。有时还指控我们，似乎是“讨厌的莫斯科人”在1957年将乌克兰分裂为左岸与右岸。是的，曾有过安德鲁索夫休战和约。根据此协议，乌克兰左岸归我们，右岸归波兰立陶宛王国。但乌克兰的历史学家就是“忘了”还有一份斯罗博季先斯克协约，根据这份协约，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儿子尤里成了乌克兰右岸的首长。就此证实了乌克兰的分裂首先是因为乌克兰左右两岸同时出现两个酋长，他们的出现并非在1957年，而在1950年，也就是早7年。乌克兰统治者就此分裂承担的罪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教导我们，只有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今天，基辅电视台播放在乌克兰首都中央广场为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竖立的纪念碑的镜头。这里可能应提示一下，赫梅利尼茨基真名叫季诺维，人

民为其起名博格丹，意思是上帝赋予的。赫梅利尼茨基靠人民的支持，在俄罗斯的支持与援助下，结束了波兰贵族进行的民族、社会与宗教的统治。

**“国际生活”：**是否存在巴尔干化进程，一个欧洲最大的国家将变为几个撕裂的地区危险？

**尤里·布拉托夫：**“巴尔干化”——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的术语。今天的巴尔干化进程，在形式上造成了小国诞生的结果，实质上，这是将巴尔干人民被卷入西方文明的进程。在俄罗斯史上，我们已走过这条路。回忆一下14—15世纪的事，当时存在强盛的立陶宛大公国。其大部分分布于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前古罗斯国的境内。因此，立陶宛大公国在当时比莫斯科拥有统一所有俄罗斯领地更大的可能性。当时似乎一切都有利于立陶宛大公国。

但此事并没发生。因为立陶宛发生国家被卷入西方文明的过程。立陶宛大公亚盖洛迎娶法国国王女儿，在位的波兰女王雅德维加（1385年克雷沃联合）促使了此过程的进展。立陶宛能加入西方文明，因为1387年宣布天主教为立陶宛大公国的正式宗教，此外，还与波兰缔结了反十字军（1410年格伦瓦尔德战役）的军政联盟。但最终，立陶宛为自己被卷入西方文明的进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立陶宛大公国按民族和宗教特征分裂。立陶宛公国的领地就像驴皮一样缩小，在数百年后竟变为在欧洲版图上的一个点。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将乌克兰卷入西方文明的企图。看来，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教训对乌克兰政治家不起作用。将乌克兰卷入西方文明的方式，除时间上不同，但与立陶宛的命运一模一样。乌克兰特权今天精心安排的不是王室婚姻，而是所谓的与西方代表出自爱情的婚姻。前总统尤先科取美国公民为妻，前总理季莫申科之女与英国摇滚歌手结缘。

但乌克兰的现状不利于再继续类似的婚姻。乌克兰境内居优先地位的是天主教的爬行式扩张。在乌克兰当局的认同下，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教会中心从利沃夫移往基辅。他们已稳稳当当地在基辅坐

下。但不仅只是希腊礼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也在不断地向乌克兰东南部，也就是向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区推进。向乌克兰东南部推进充当先锋是希腊礼天主教会。据报纸报道，2014年4月，梵蒂冈同意为顿涅茨克与哈尔科夫选举希腊礼天主教会主教，但当地的希腊礼天主教会的神父，无论其影响力还是跟随者都极少。

必须指出，当今的基辅政治家一直为北约在乌克兰境内举行各种联合演习开“绿灯”。所有这一切最终说明，乌克兰在21世纪很有可能重复当年立陶宛大公国的命运。必须明确，将乌克兰卷入西方文明会使乌克兰丧失自己的民族同一性，促使乌克兰离心取向的发展，并有可能进一步分裂乌克兰社会及其领土。乌克兰实在太太，要挤入欧洲之家就不得不受损失。希望其他人能以立陶宛的教训为鉴。

**“国际生活”：**当然，乌克兰政权将会致力加入西方文明，这是其政治目标之一——加入欧盟，感到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

**尤里·布拉托夫：**我想就加入欧盟的问题说说以下的事情：必须考虑到，一方面，基辅当局宣布自己独立，另一方面，就像其他加入欧盟与北约的国家，甘心情愿地放弃自己的大部分主权。因此，大部分作为乌克兰总统的候选人发表必须加强国家主权的声明，只是用于为加入欧盟和北约铺路的烟幕。

**“国际生活”：**对欧盟与美国来说，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将不是连片的缓冲带，而是许多四分五裂的小国有什么好处，管理这些小国要比管理如此大的，无组织的和不够发达的国家要复杂的多呢？

**尤里·布拉托夫：**“分而治之”的政策必然导致大国分裂为小卫星国。但如果拿乌克兰来说，我认为，对西方更为重要的并非是乌克兰在现有境界，或更小范围境界内的存留问题，美国及其伙伴的主要目的——保持乌克兰问题的高温状态并尽可能地拖长乌克兰的危机。所有这一切，就像美国及其同盟所想象的，将允许他们直接在俄罗斯边境扎根。

**“国际生活”：**乌克兰的这种现状对俄罗斯有利吗？

**尤里·布拉托夫：**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应当是一个繁荣昌盛，富裕和自给自足的国家。任何一名俄罗斯人能在此祝愿下签名。这里，睦邻相处也是必不可少的。我看，今天，乌克兰联邦化是保存乌克兰国家机构的唯一机制。

**“国际生活”：**您认为俄—乌关系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尤里·布拉托夫：**我认为，连接了边境两地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历史根源、历史关系，将是相互关系的基础。前不久，我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进行了交谈，他们两互不相识。乌克兰的危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断感到不安的渊源。尽管如此，我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交谈者都抱有乐观的心态，并与我分享了实质上是同一个笑话。他们说：俄—乌边境上坐着两只布谷鸟。俄罗斯的布谷鸟在咕咕叫，乌克兰的布谷鸟一声不响。俄罗斯的布谷鸟问乌克兰的布谷鸟为什么它不叫，不出声？乌克兰的布谷鸟高傲的回答，它可不是布谷鸟，它是一只独立的佐祖利亚（乌克兰语——布谷鸟），但就是发不出“佐祖”的音声。通常说，每个笑话都蕴含真理，正是其中的真理决定当前被历史命运紧紧相连的两个民族发展的共同前景。

**“国际生活”：**乌克兰今天能是激情的国土吗？

**尤里·布拉托夫：**乌克兰境内确实有这种激情的现象。但其有正的一面，也有负的一面。按Л. Н. 古米廖夫的定义，激情——人的内存能量高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今天的条件下，乌克兰街垒两边的激情是显而易见的。很清楚，乌克兰日常生活中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也作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乌克兰今天的这种激情极度超标。任务在于合理利用这种能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国际关系新范例

###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orlov\_a@mgimo.ru



政治——不是算数。其中能遇到要求不断得到提示的公理和多次的重复。发生这种事，并非因为某人对某事认识不够。只不过是存在不愿去认识某些作为与其观点相矛盾公理的政治家。

A. A. 葛罗米柯（“难忘的”）

当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我们正面对重大的，或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始于苏联改革最后几年的俄罗斯与西方四分之一世纪的伙伴关系（包括所有众所周知的困难和曲折）阶段趋于结束。取代这种关系的，看来，将是建立在更务实，排出了毫无道理的幻想和过剩赋以寄托之上的新国际合作机构。被提及的后者，犹如说是关系到西方，不如说更关系到俄罗斯。如果有谁认为乌克兰局势稳定后，而其早晚必将会稳定，世界（或至少是从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延伸至西方的温哥华部分的世界）将会返回乌克兰危机前的状态，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存在回头路。旧桥已烧尽，新桥的构建实质上未曾开始。未来长期伙伴关系的世界发展范例基础被完全摧毁，而其曾在长时间内被视为是绝对别无选择的一种。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莫斯科与西方首都就此重要的原则问题予以迥然不同的回答。西方以其惯用的简单至极的逻辑公式——我们总是对，就是不对，也是我们对，将任何事都归罪于俄罗斯。俄罗斯——

有其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真理。我们的力量寓于真理中，因为，我们的真理以公正、历史、法制、良心、道德及常识为基石。今天，为争取真理的胜利，我们为变世界更干净、更安全、更稳定进行斗争。这不是华丽辞藻，这是现实。今天，生活在北美和欧洲的许多人，被由西方的国家机构和宣传鼓动机器（首先是电子传媒）合力蒙上的反俄僵尸信息的浓密面纱情况下，这种现实的显示可能不够明显。但过段时间，大雾消散后，呈现在茫然的观察家眼前，将并非长期烦人地施加于其的图景。这一定会这样，因为这也是现实。

业已形成的乌克兰局势语境下事件的离奇性，在于世界政治园地上没有一个大玩家希望事态的这种发展。当然，如果是思维健全的人的逻辑为主导的话。

如果某一位政治学家在去年秋天描述了在乌克兰实施的，以我们大家为见证人的剧本，大家会视此人的想象力出于过热的头脑。

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以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扩充北约和欧盟军政与经济影响有损于俄罗斯安全利益的西方超级玩家的政策，他们自己为欧洲任何潜在冲突“风险度”的加强创建了条件。这种政策最终体现于乌克兰雪崩式和失控冲突的升级。再说，其特点在于形成系统的世界政治大玩家，在颇大程度上扮演了乌克兰一定阶层势力和人物的意志与行为的牺牲品角色。这些势力和人物下的地方上的一局棋，与其启动的全球进程一盘棋，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里很想援引欧洲100年前的相似情况，当时一环扣一环的连续步骤——就其中每单一的一环并非是致命性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以首自居的世界列强由尾巴进行操纵，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如果拿欧洲来说，那么，近20年来始终扮演尾巴-操纵者角色的则是一系列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边境缓冲国。地理上北约/欧盟与俄罗斯交界位置上的这些国家，本应似乎启发他们致力成为地缘政治庞然大物之间的桥梁。但他们更适于为溃疡成的“浓泡”，不断引发不快的事和在任何借口下（甚至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向出现的这种或那种矛盾火上加油。这种矛盾本应出自共同利益予以合理的解决与缓和，但绝不能使其尖锐化



与上述国家相比的邻国——芬兰，示范了完全另一种正面典范的态度。在两国关系史上，芬兰与苏联的关系上曾有过悲剧性的篇章。尽管如此，多亏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芬兰领导人，首先是吉科宁总统——奠定了卓有成效的睦邻友好合作的牢固基础，这种合作半个世纪来得到成功发展。这种典范应为欧洲所有部分之间扫清通往无敌视和野心的全面与多面合作的道路。

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犹如俄罗斯三勇士神话故事中的主人公站在独特的交叉路口上：选择哪条将不会造成更大损害，能摆脱他们自己和其它整个世界陷入的问题重重，甚至是危险局面的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上无疑有点过分卖力。试问：难道华盛顿与其它西方国家首就真的相信以此能迫使俄罗斯执行合其心意的方针吗？这种幼稚看法的怪诞性不值得加以评论。估计西方也认识到这一点，只不过是暂时摆出一切都“按既定计划”进行的姿态。

除了作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制裁涉及了一系列俄罗斯国家前五位人士，因此，制裁还具有“针对个人”的馅心。从对事物或某人的作用角度来说，这些措施毫无意义，对我国，对我国人民都具有侮辱性。除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种行为不能，也不会带来其它效果。再说，令人作呕的政治产品的味道，不会很快和无影无踪地消失。就是在对俄罗斯展开制裁战的西方当今一代政治家换代，新一代人在不得不为矫正前辈错误寻找途径的情况下，这种臭味，无疑还会存在。

心甘情愿地放弃作为俄罗斯伙伴地位，西方以此显著地缩减了与莫斯科在与乌克兰无牵连的事务上，但又并非次要的广泛事务上构建建设性关系的可能性。可以回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去年还是一位协调努力解决当今最尖锐问题的所有国际会晤形式的积极和不可少的参与者，和平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决定几乎被视为是国际合作的标准。

自那时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从小事开始——蔑视索契冬奥会，俄罗斯为此冬奥会不仅投入巨额资金，但也投入了心灵。西方开始有步骤地摧毁二十年来在联合努力下创建的一切。我们只重点突出以下的形式：作为世界主要玩家争取协调

立场的工具“八大国”；俄罗斯与北约的合作机制；俄罗斯-欧盟形式相互关系的体系。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实践，自然被尊为圣物。根据国际法精神与条文，其只能被定性为公开的不友好，敌视行为。鉴于此，假如俄罗斯不仅口头上，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推翻民选的合法总统，看看西方做出何反应倒挺有意思。某种感觉提示我，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行为和采取的措施与他今天应用于反俄罗斯的做法不会有啥区别。只是使用的华丽词藻会有所改变而已。

遗憾的是，以下也不得不指出，对美国及其盟国来说，在世界各地发表支持民主和人权的激情声明——无非是为干预寻找借口。再说，当今的一个特征——军事干预。就是发表必须保存国家领土完整的声明，也只不过是在夸夸其谈。具有说服力的科索沃先例显示，犹如以往难忘的“炮舰外交”时代，对美国，但也对西方整体来说，其主要标准是利益，而宣称的原则，则是服务于其利益的附件。在一种情况下，对这些原则进行一种解说，在另一种情况下，则进行截然相反的解说。

今天，拉夫罗夫外长走访西方国家的活动显著减少。再说，由俄罗斯及其原有的西方伙伴参与的活动也减少。美国国务卿克里则像上了旋的玩具在全球走南闯北，但起的作用也不大。现在我们眼见美国在逐步陷入中东的新大战，其敌手是那些前不久还是一起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盟友。如果当时事态按美国的剧本发展，这些势力今天已在大马士革掌权和带来从中延伸的所有后果。就在撰写这篇文章时，美国武装力量正在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据点进行空袭，就空袭而言，这是粗暴违反国际法，其未得到叙利亚政府的同意，更甚的是，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如何对待华盛顿及其附庸国就似乎俄罗斯部队参与乌克兰东南部冲突对莫斯科进行有半年之久的指控（并且是毫无证据的指控），并成为西方单方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依据？按逻辑，类似的制裁——已成针对美国本身及其一系列盟国——能由那些不接受以单方面行动取代国际法和全面无视相关国际机构这种实践的国家实施。为什么？这是另一个问题。

强加于国际社会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摇摇欲坠。只有瞎了眼的人，或完全摒弃现实的人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说实话，还存在一种似乎美国人有意识地执行受控混乱的政策，致力更迭不合心意制度的一种看法。但其这种所作所为，都说是为居住在被制造混乱国家境内的人民谋福利。也就是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下，无须紧张。

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不存在任何监控。所有这一切——空中阁楼。这里只能说是美国战略上的错误，是他们在军政和对外政策问题上的重大失算。美国人曾在当年亲手催生了一个怪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本来的使命是与在阿富汗的苏联作战。最初，似乎一切都很有成功！苏军撤出了阿富汗，随后地缘政治的主要对手又自己解体。用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到来！但生活要比预测更复杂，尤其是那种坦率的预测。但魔鬼已从瓶里被放出。时隔一代的今天，美国被迫与自己在阿富汗与中东的产物作战。何况，战事也不顺。我不准备为事态今后的发展想入非非。但今后事态发展的剧情，存在许多不利于美国的事件。

在乌克兰也正在形成类似的局面。美国和欧盟在公开的反俄狂态中，将赌注下在倾心于代表世界法西斯主义乌克兰分支的斯捷潘·班达拉及其战友戒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上。又一个随心所欲，不准备听从自己西方驯兽师要其返回瓶内的难以驾驭的魔鬼。希特勒之流当年也曾企图控管，其结果人人皆知。总体上，摆在我们眼前的是阿富汗剧本的再版：为解决一时的任务——被施加压力的对象又是俄罗斯——创建不可比拟的更大规模的长期威胁的条件。这些威胁将首先会涉及到开始遗忘历史的教训，遗忘被法西斯主义残害的人和遭到的毁坏，以及是谁帮其从此恶积祸盈下解放出来的“老”欧洲。

如果美国今后想采用类似的行动模式来反对中国，也在那里构成将能演变为全球规模的威胁，又会怎样？是否这种来自一地，惯于视自己事事有理，从无一误的一个国家的威胁有些过多？

华盛顿和美国附庸国首都祈祷的不容置辩的民主特征与条件，是“遏制和抗衡”制度，其使命是不允许有一个中心力量能主宰其

它中心力量格局的出现。实际上也就是压制它们。看来，这种制度本应不仅在一个民主国家范围内存在，但也存在于国际水平上，当然，如果这个水平同样为民主的。这种制度还在不很久前，是能遏制竞争签约方野心的两极模式的世界秩序。在当今世界，这种制度本能为多极的。但如果不发生这种事，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将返回两极模式，但以新一轮两半球集团间的对抗格局出现。这或将对美国本身也有利，因为这能预防民主共和国最终脱变为帝国，类似星球大战影片中发生的事件。

至于近来遭受美国和其它受其影响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史无前例的，侮辱性的压力，那么，看来最合理的是返回采取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的外交手段：以平静，持尊重和建设性态度，但又坚硬和有目标地维护自己的利益。A. A. 葛罗米柯被西方起名为“不行”先生。但他实际上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要说的“行”与其服务于的国家利益相矛盾，他就从来不会说“行”。这完全与普京总统的务实言语相呼应，他表示，我们在以制裁回应制裁的做法上永远不会去做有损己的事。

俄罗斯在复杂的和被系成死结的乌克兰冲突中，在不顾对其采取的所有挑衅、神秘化、诽谤和骗局行为，无疑以道义上的胜利者自居。这场胜利今后或将能为地缘政治上的胜利。

我们经受住了美国和整个西方集团对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冲击。他们企图叫俄罗斯屈膝、夭折，迫使俄罗斯让步，进行辩解和忏悔。看来，西方某些人不愿意或不能理解时代变了，落在西方与绝不放过机会侮辱我国的边境缓冲国马车后的这样一个俄罗斯，一去不再复返。崛起的是另一个——自豪的，自信自己力量的俄罗斯！

围绕乌克兰的危机，对我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通常，这种考验也有其肯定的一面。其体现了谁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们的朋友，谁不是。这是非常可贵的。



## 谈乌克兰问题的某些法律立场

阿列克谢·莫伊谢耶夫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系主任，法学博士

alexei.moiseev@dipacademy.ru



### 俄罗斯联邦的立场

2014年三月18日签订了俄罗斯联邦和克里米亚共和国关于接纳克里米亚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并成为俄罗斯联邦新主体的国际条约。按照从签字日行使并在2014年三月21日批准后生效的条约，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联邦作为新的主体-克里米亚共和国和联邦直辖的塞瓦斯托波尔市；这一天在联邦新主体境内居住者确认为俄罗斯公民，但有权在一月内声明保留下其原来国籍。克里米亚境内开始行使俄罗斯法律。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陆上边界为俄罗斯边界。黑海和亚速海的海上空间应按国际法准则划分。

通过条约的决定基于2014年三月16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自由和自愿公投结果，克里米亚人民在它的过程中通过了“重新作为主体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并且反对“恢复把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一部分的1992年克里米亚宪法的效力”。

实际上俄罗斯给予了主权同意的2014年三月21日签订的法律文件，涉及到了另一个独立国家-克里米亚共和国关于签订接纳它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的建议。此前，2014年三月17日俄罗斯总统根据任何国家都应有的自主权，考虑到2014年三月16日克里米亚人民在全民公投中表达的意愿，下令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国际法主体。

这种条约符合俄罗斯宪法条款，其中规定“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它的新主体按照联邦宪法规定秩序进行”（第65.2条），按照第4.2条，“外国或它的部分”加入应依照俄罗斯和有关国家相互

的同意和国际法进行，而且外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申请应该出自这个国家。。。”。

换句话说，俄罗斯联邦按照国际法利用了其承认国家和签订国际条约的不可分割的权利，按相互同意的结果出现了联邦的两个新主体-“克里米亚共和国和联邦直辖的塞瓦斯托波尔市”。

依照国际法含义，任何国家都有权签订国际条约，因为这对它有利。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共和国签订国际条约除了有历史依据，还出于关心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同胞们的安全。例如，俄罗斯总统对联邦议会、俄罗斯各地区领导人和公民社会代表的呼吁书中阐明了这一点。

### 谈克里米亚全民公投的合法性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独立宣言是在2014年三月11日由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委员会通过的。宣言中指出了“人民自决权”和“2010年六月22日联合国国际法庭就科索沃事实做出的关于国家某部分宣布独立不违反国际法任何准则的确定”。联合国国际法庭的决议中指出“任何对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普遍禁止都不是出自安理会的做法。普通国际法没有任何可用于禁止宣布独立的内容”。俄罗斯总统在2014年三月18日的呼吁书中提到了这一点。

值得强调的是，克里米亚居民利用了自决权，按照乌克兰宪法第10条，人民有自治的法律地位。

2014年三月16日克里米亚的全民公投是在遵循民主和法律要求情况下举行的。当时基辅在右倾极端分子猖獗情况下发生了政变，建立了非法、罪恶的政权。这个所谓“新政权”用极端手段夺取了国家全权，粗暴违反了乌克兰宪法准则。因此，指责克里米亚全民公投违反乌克兰宪法，至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可以说，在非法“政权”条件下宪法准则不可能运用，因为不存在必要的“假设”，即没有需要使用准则和成为法律事实的情况。相反地，在乌克兰形成的情况下克里米亚政权的行动有合法和民主的性质。公投的令人信服的结果是克里米亚宣布为独立的共和国，而塞瓦斯托波尔市得到了特别地位。

如果撇开西方某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它们不承认克里米亚公投结果，说它不合法和具有反宪法性质的立场是令人费解的。甚至按乌克兰宪法第138.2条，“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管辖包括...地方公投的组织和举办”，而且宪法中没有限制公投的对象。所有人都应该明白，公投的合法性不应该取决于美国或欧盟意见，它只取决于人民自由自愿的意愿表达。

### 乌克兰方面的反对意见

2014年三月11日乌克兰外交部表示抗议，指出克里米亚共和国通过的独立宣言不合法，是“反宪法的非法的，法律上无效的决定”，“它既违反乌克兰宪法，也违反包括俄罗斯支持的国际文件条款”。2014年乌克兰最高拉达任命的所谓代总统A.图尔奇诺夫签署了关于停止宣言效力的命令，称它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和法律。

还在2014年三月1日乌克兰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范围内指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硬说俄罗斯“粗暴违反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要求所有国家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

2014年三月3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B.邱尔金出示了乌克兰总统B.亚努科维奇请求俄罗斯总统B.普京军事援助的信：“作为合法当选的总统我声明：迈丹事件、在基辅的非法夺权导致乌克兰面临内战边缘。国家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人们的生命、安全和权利受到威胁，特别是在东南部与克里米亚。在西方国家协助之下公开进行恐怖和暴力活动，人们因为语言和政治特点而受到迫害。就此我请求俄罗斯总统B. B. 利用俄罗斯武装力量来恢复乌克兰的法治、和平与稳定，保护居民。B. Ф. 亚努科维奇。2014年三月1日”。

2014年三月18日俄罗斯总统在呼吁书中重申了俄罗斯立场，他指出：“俄罗斯不派兵进入克里米亚，只加强自己的集团军，而且不超过国际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目的是在极端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们无法无天和进行威胁的条件下保护“俄罗斯公民。我们的同胞们和按照国际条约在乌克兰境内留驻的武装力量人员”。

俄罗斯总统没有直接在外国动用俄罗斯军队，尽管按国家议会决议和俄罗斯宪法他有这种权利。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公投前后，公投期间直接使用武装力量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证实，这是毫无根据地指控俄罗斯侵略或吞并的企图，是在打如意算盘。

## 谈乌克兰的基本问题

乌克兰政治危机始于2013年十一月，当时政府宣布暂停国家的欧洲一体化。2014年二月22日发生了武力政变。乌克兰议会违反了总统B.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达成的协议，非法修改了宪法，非法解除了乌克兰总统职务，更改了乌克兰最高拉达、内务部、国防部、安全机关的领导并在2014年二月27日批准了所谓“人民信任政府”。

按照乌克兰宪法第111条，规定了解除国家首脑全权的四种方法：声明辞职；按健康状况；死亡；弹劾。这四种方法显然对受到“迈丹”极端民族主义者肉体消灭威胁而不得不外逃的乌克兰总统B.亚努科维奇都不适合。

没有必要侈谈B.亚努科维奇就任总统期间活动的不良结果，但显然乌克兰平民参加“迈丹”不是因为生活过得好。顺便提提，乌克兰的无权和贫困状态不是突然出现的。顺便提提，极端分子们利用了这种情况。

“迈丹”本身从未得到过国内全面的支持和承认。最近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悲剧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迈丹”可以看作是向乌克兰政权提出自己要求的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民众抗议方式（签订关于乌克兰和欧洲联系协议，要求政府和总统辞职等等）。“迈丹”及其口号不能为承认所谓“新政权”的合法地位，也不能为其决议和行动创造法律基础。甚至“迈丹”参加者和政府强力机关的武装冲突也不能在法律上改变局势。

即便按“迈丹”的论调，也难于理解其激烈反苏和反俄罗斯的历史原因。因为众所周知，苏联战后时期的领导显然较亲近乌克兰，而不是亲近俄罗斯。



法律上 B. 亚努科维奇在被改选或自己辞职之前仍保留其作为总统的合法性，而自称为乌克兰国家政权“新代表”者并没有这种合法性。因此，2014年二月22日最高拉达解除 B. 亚努科维奇职权的反宪法决议是非法的。顺便提提，据欧委会代表 O. 巴因说，决议得到了欧盟的承认。欧盟和反对派代表们的非一贯行为令人不解。在乌克兰议会通过解雇合法总统决议的前一天还签订过同年二月21日的协议，其中确认 B. 亚努科维奇在改选之前仍是总统。

由于乌克兰国家没有合法有效的代表导致国家缺乏司法能力，使俄罗斯没有法律可能性按照1997年签订的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友好伙伴合作条约第七条与自命为乌克兰“新政权”者进行官方接触和协商。而且，西方国家承认了非法政权，走上了支持罪恶政变，粗暴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道路。

伴随着极端分子们武力夺取政权的反宪法政变，导致乌克兰危机的中心问题是政权本身的合法性问题。那些武力夺取政权者犯下了刑事罪行，他们的行动对俄罗斯不具法律效力。

现在夺取了乌克兰政权者不仅粗暴破坏了民主基础，而且从违反宪法开始破坏了本国和国际的法律，大规模地严重损害了乌克兰公民的权利，包括对他们使用武力，按民族和语言标志采取歧视行动，支持民族主义者，在极端集团中无控制地散播武器，现在甚至在经过国境时按国籍、年龄、性别的标志实行歧视等等。

毫无疑问，乌克兰作为国际法主体的的源于其人民的主权并没有消失，但出现了关于国家司法能力的基本问题-谁合法代表基辅的政权？

### 谈同胞们的处境

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立即采取的措施的另一个极其重要问题是保护讲俄语居民、我们同胞们权利的问题，按国际法，至少应该保护他们的少数民族所应有的权利。1992年“关于乌克兰少数民族法”规定少数民族为“有民族自觉感情和相互共同点的非乌克兰族的乌克兰公民”（第3条）。“少数民族有权。。用母语教学。。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利用民族标志。举行民族节日，保持自己的宗教。。文

学、艺术、媒体,建立民族文化和教学机关等任何不违反现行法律的活动”(第5条)。这些都受到了粗暴违反,同胞们受到恐怖迫害,处于在难于生存的条件下。

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们和西方国家在形成的情况下加紧散布反俄论调,直接污辱俄罗斯联邦及其人民。歪曲或否定明显的事实,包括违反宪法地更换乌克兰政权、表现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凶杀、违反人权,欧委会议会大会的多数“背叛法治原则”,俄罗斯在议会大会的声明中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法治原则旨在保障各国在遵循利益均衡情况下的和平合作,保障整个世界社会的稳定。

### 谈俄罗斯联邦可能的行动

俄罗斯国家系统地证实自己忠实于国际法,对它的遵循符合其民族利益,声明自己的追求和作为“保护国际法的首领,使各国人民的民族主权、独立和特点得到尊重”的责任。

2013年二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理论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旨在巩固国际法律。理论中的特别要点是重申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法律至上原则,恪守国际法义务。国际法是这样形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使用它的所有基本原则。正是应该这样来看待今天在乌克兰形成的局势。

俄罗斯国家对自己侨胞,包括在乌克兰的侨胞的命运不能无动于衷。可是,尽管有来自各方面的呼吁和指责,俄罗斯领导不打算非法向邻邦派遣和使用武装力量。还应该指出的是,2014年三月28日国际条约的条款:“属于部队的人士在驻地之外可以按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现行规则穿规定服装”已停止生效。

众所周知,只有联合国安理会代表的国际社会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防止和排除对和平的威胁、制止侵略或其它破坏和平行动”(联合国宪章第1.1条),还有对人权的粗暴或大规模损害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可以说,乌克兰局势带有上述的两种威胁,可是暂时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们对乌克兰形成有局势及其前景尚无统一的看法。

## 谈乌克兰东南部的起义

今天乌克兰主要冲突的发展与所谓“乌克兰新政权”和要求地区得到联邦方式的更大独立性的东部与南部地区的深刻矛盾相关。毫无疑问，联邦会导致管理、财政等资财的重新分配，但有可能保护国家本身。否则，按许多分析家的评价，乌克兰面临内战威胁和国家肢解的可能性。

重要的是不能忘记，乌克兰东南部居民反对所谓“新政权”的起义是作为对基辅武力政变的抗议和政变的后果产生的。在极端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与合法政权激烈对峙条件下，打着“迈丹”口号的政变导致了数百人伤亡。

所谓“新政权”因果倒置，不顾自己不符合宪法的地位，把恶化危机的责任推卸给了东南部地区居民，指责他们为恐怖主义，威胁国家领土完整等等，忽视他们的要求，甚至罪恶地，在“反恐怖行动”借口的掩饰下对抗议平民动用正规武装力量。

对峙的持续，很可能导致国际社会提出承认乌克兰东南部和平抗议参加者为“起义一方”的问题。按照国际法，“起义一方”理解为控制着本国部分领土的抵抗部队，起义者，内战或者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他们进行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反对独裁的、违反宪法的，反民主的政权或者为了争取自己人民的自决权和得到国际法其它主体的国际法律承认 *ad hoc*。重要的是，尽管和国家地位相比国际法主体的权利有限，起义者的国际法律地位有合法权利作为一方参加谈判，和承认它的国家进行直接联系以得到外国帮助和支持，如果失败可以得到政治避难并转移到其它国家境内。

我想，国家内部冲突的任何一方，它们的西方赞助者，更不用说俄罗斯联邦都不希望有上述的事态发展。2014年四月17日乌克兰、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四方在日内瓦的谈判结果证明了这种结论。俄罗斯代表团同意无先决条件参加谈判，然而，参加谈判本身并非表明俄罗斯承认所谓“乌克兰新政权”合法并就此直接发表了声明。

## 谈日内瓦四方谈判文件

值得提到的是，日内瓦谈判各方达成了共同文件，其中呼吁冲突所有各方，包括或者首先是对所谓“新政权”的非法武装力量、极

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极端分子呼吁。正如俄罗斯外长С. В. 拉夫罗夫强调指出的那样，“国家所有地区的非法武装部队都应该解除武装，房产应归还原主，应解除对乌克兰各城市的广场、其它地点的占领，大赦抗议者，仅严重犯罪者除外。欧安组使团应起主导作用，为乌克兰人们、基辅政权、地区的地方社会提供协助，采取缓和局势措施。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已经参加这个进程，我们将协助支持各方对话使命的工作”。

外长指出了“立即开始宪法进程范围内的包容、透明和负责的广泛民族对话”的必要性，还需要“参加者确认不可改变的事实：危机应由乌克兰人自己调解”。与此同时，日内瓦文件中没有提到“新政权”用于辩解其对东南部地区公民采取武装行动的所谓恐怖主义的出现。

### 谈可能的前景

俄罗斯不能对邻邦的悲剧事件、对其在乌克兰境内的同胞们的今天和未来无动于衷，它在采取可能的外交和政治措施。可是，很明显，按照国际法，直接用自己力量去影响局势需要联合国授予相应的全权。如果谈到国际法范围之外的可能性，按抚息冲突各方的历史经验，可以联想到志愿部队。

乌克兰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不安。看来，在非宪法秩序条件下，危机的调解只能在乌克兰内部范围内由代表地区的对峙集团通过寻找可接受的关于国家和领土结构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民族和解的全民公投进行。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武力镇压将导致事态的恶化，导致对人权的大规模和粗暴的侵犯，导致伤亡。在这种条件下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将得到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制止国内流血冲突措施的充分理由。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乌克兰计划”的破产

斯列奇科·朱基奇博士

塞尔维亚政论家，退役大使

现在斯拉夫人民在经历着又一个尖锐的冲突。但历史在强劲地前进。毫无疑问，在这个冲突中“乌克兰计划”——还在苏联解体时就已出现的把乌克兰作为西方跳板（众所周知为了谁）的幻想在经历惨败。乌克兰戏剧接近自己的高峰，这表现在五月25日的颇成问题的总统选举上，——在它之后，或者需要划分边界，或者出现和人民对话的最后希望，目的是保持某种邦联的非对称的乌克兰，即建立某种“另外的乌克兰”。



在前者和后者都不能忽视，不能忽视2014年五月11日东乌克兰、顿涅茨基和卢甘斯克州全民公决的结果和此后宣布作为新俄罗斯核心的独立共和国。新的乌克兰总统必须有足够的技能和宽大的政治思维，利用乌克兰内外全部因素来防止彻底的分裂，接近对立各方的谈判并使之纳入建设性和符合宪法的轨道。

今年冬天和春天在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国内新政治危机是著名的乌克兰政治讹诈挑起的。这是它从得到“独立”到今天的所有政权——“亲俄”和亲西方的所有政权的特点，按俄罗斯俗语说：“既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乌克兰政权在最近二十年来正是这样行动：靠近俄罗斯一步，又靠近欧盟、北约和美国一步。不成熟的乌克兰政治和不成熟的乌克兰政治家们同时给西方和俄罗斯“挤奶”的企图以今天典型的国家政变告终。其结果是全面破产。

我们，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经受了人民和国家所能经受的一切的塞尔维亚人，对苏联和平解体和南斯拉夫自相残杀的军事流血与毁灭后的乌克兰事件至今难于理解。我们对乌克兰曾有完全不同的期望。本来，乌克兰作为在欧洲领土最大的东正教国家，可以成为欧

洲的加拿大或墨西哥。可是乌克兰走上了另外的道路。应该说，我早已指出了乌克兰政治和整个“乌克兰模式”的不稳定性。

我对经过乌克兰向欧洲运输俄罗斯天然气，为什么基辅的所有政权都对俄罗斯和欧洲实行政治讹诈，不奉行成为俄欧大桥，成为“俄罗斯之窗”和“欧洲之窗”的政策的问题写过不少文章。如果是后者，那就既不需要北方的，也不需要南方的天然气走廊。

根据自己的外交经验我应该说，我一直不能理解一些乌克兰同行-大使们向西方“弯腰”从而试图达到高于俄罗斯的行为。这既可悲又可笑-对西方奴颜婢膝，对俄罗斯的一切却自命清高。我甚至在前斯拉夫的，曾经有过血仇的各个共和国的外交官和大使们身上都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塞尔维亚的广泛社会界从头一天就不安地注视着乌克兰事件。不难理解，西方的手深入了迈丹事件。但也明显，2014年已不是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塞尔维亚并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脱离它的1999年。世界已经根本改变。西方再不能利用武力和其它革命手段把自己的利益强加于人。

所有人都清楚：西方在乌克兰惨败：猎狼者猎到了狐狸，正式结束冷战时刻播下的种子，今天得到了收成。塞尔维亚不止一次警告过乌克兰可能巴尔干化，它可能肢解为几个部分，不存在美国外交对科索沃所说的什么国际关系特殊情况。遗憾的是，西方不希望乌克兰是个有无边无际的黑土带的巨大产粮国、巨大的产煤国和拥有巨大的航空和其它工业部门的国家，只希望乌克兰成为它和俄罗斯竞争，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安全方面竞争的场所。乌克兰政权一直卷入这种游戏。

在基辅，经过长期示威活动和今年二月的流血战斗之后建立了来自迈丹的临时政权，一切颠倒过来了。政权把主权国家变成了西方的属国。乌克兰的来自迈丹革命的政权得到了“合法性”和西方给予的政治与道义上的支持，但缺乏所期望的财政支持。和通常情况那样，一切取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经过多次“考验”的自由化改革，包括在乌克兰的改革。

因此，基辅的反俄政府，尽管拖欠着几十亿天然气债，不得不求助于莫斯科：按乌克兰风格免费窃取天然气，以免破产和停止任何经济活动。迈丹之后临时政权落到了“祖国”党人手里。它的领袖尤里娅·季莫申科-“天然气公主”、寡头、前总理早已失去了自己

的声望。这位2004年迈丹的“橙色革命公主”参选总统，指望得到像她在二月底出狱后于迈丹受到欢迎那样的全民支持。可是由于她的总统选举得到的选票少，她对自己人民许诺要掀起“第三迈丹”。

民族主义政党“自由”和联合了激进者、极端主义者和新法西斯分子的“右区”支持该国的现政权。然而，认为他们在总统选举后会放下武器并退出是幼稚的。不，他们许诺在该国东南部开始游击战争。在这种政治环境中，被推翻的维克托尔·雅努科维奇的政党—政变后曾休克的“地区党”在试图恢复和稳定。

那些取得政权者认为，迈丹的胜利使他们得到按自己的尺度建立乌克兰的全权委托，因为他们是它的唯一居民。执政几个月内他们一次也没有注意乌克兰东部的迫切问题、那里的居民所碰到的问题、国内居民的俄语问题。他们忽视所有这一切。这在失去克里米亚之后，特别令人奇怪。因为十分明显，乌克兰东南部不接受迈丹并在努力通过脱离基辅来解决自己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和美国经常向俄罗斯挑战，但普京认识到此情况，巩固了国家地位。

不过值得指出，造成“克里米亚回家”条件和乌克兰局势并非俄罗斯的功劳。亨利·基辛格说得对，他认为，普京并无挑起乌克兰危机的计划，这里只是他对危急局势的回答。此外，基辛格对西方说：“对普京的恶魔化不是政策”。

毫无疑问，早已不是新闻的对俄罗斯一切的不尊重态度成了导致乌克兰东南部起义的沸点。为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举行了全民公决。当然，这些公投，正如任何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公投一样，并非法律调节和得到公认的行动。它们的意义并非为了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它们是已成的和曾经不可预测的政治事实。人们的高投票率和对公投的支持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不是一些人强加的政策，他们背后没有任何人，公投反映了人民的实际情绪。

和基辅的冲突和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派遣武装力量的行动，还有在敖德萨的可怕的法西斯罪行促使居民更积极参加公投，决定他们希望在哪里和在怎样的国家生活。基辅的军事力量没能令人信服，这不仅因为基辅政权是临时性的，更因为普通人们和军队都反对战争（许多军人离开战场，看不到自己的敌人，不理解反对自己人民的战斗命令的意义）。

革命狂热、朝向西方的观点、对所有俄罗斯的憎恨给了迈丹政权力量。然而，政权拒绝正面考虑国家东南部居民需求的时间越长，亲俄罗斯地区的反应也越强烈。政变之后正是国家的这一部分在迈丹政权中没有代表，因而没有对话的对象。然而，今天甚至美国国务卿都听取东南部的意见，只有基辅对此充耳不闻。起义者、联邦主义者、自卫者和志愿者迫使所有人注意到国家和人民的这个部分，并迫使在未来考虑他们。

怎样举行了乌克兰总统选举并不重要。因为西方预先承认了它的合法性和民主性，只要能够举行。可是，乌克兰仍将长期是“跛脚鸭”，选举没能结束乌克兰的危机，只是使之进入了冲刺阶段。

预测成真了：人民疲乏了，它投了票，目的是为了感到某种稳定。总统选举的胜利在第一轮就已对在俄罗斯市场工作的“巧克力”寡头，以前的库奇马、尤申科、雅努科维奇政府的部长彼得·波罗申科微笑。

不管谁在选举中获胜，都重复老口号。我们这里惯说：“变了跳蚤！”今天，选举后的乌克兰没有任何变化。由于新人的到来，出现了机动的空间-如果他们能够利用。至少是乌克兰选举再次证明了在乌克兰“独立”头几天制订的“乌克兰计划”的荒谬性。其实质仍然是崇拜西方的政策，然而，整个乌克兰人民和国家仍依靠俄罗斯母亲生活。

如果新政府希望挽救乌克兰，它就应该建立新的乌克兰国家（“新乌克兰计划”），使之和以前的大不相同。应该吸引所有人参加举行“圆桌会议”和全民公决，包括已经举行过公投的所有人，而不仅是顺从迈丹和总统者。

此外，在起草宪法-“新乌克兰计划”进程中，亲俄罗斯少数应该预先得到“金股”和使用它的可能性。乌克兰在国际关系上应该按别的，始于所有国家国内外同样安全原则的标准行动。

尽管在今天条件下给人的印象是，在乌克兰已开始的破碎进程已经难于阻止。

贝尔格莱德，2014年五月27日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俄罗斯和协助国际发展

康斯坦丁·科萨乔夫

俄罗斯合作局领导人

rossotr@rs.gov.ru



协助国际发展、官方发展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这些几乎相同的每一个概念在俄罗斯都不陌生，专家社会在讨论它们，但我国公民并非全都理解。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对这些程序在现代世界原则上如何进展，俄罗斯作为有全球利益和本身利益，对国际关系有自己的议事日程的世界大国能在其中找到什么的问题进行广泛社会辩论是重要的。

先从远处谈起。二月前，今年四月15-16日在墨西哥举行了全球促进发展合作的第一次高级会议。众所周知，2000年联合国大会在纽约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其中除了千年发展的七个目标之外还确定了第八个目标-为发展目的建立全球伙伴合作。

全球促进发展合作是在2012年，在2011年于釜山（南韩）举行第四次提高外援效率高级论坛之后建立的。它是作为政治对话、汇报和交换为了发展目的的高效合作经验的平台创建的。看来，吸引了实业界、公民社会和捐助国与受援国政府代表参加的全球伙伴合作，和各种多方机关那样，大约每18个月举行部长级会晤。它的领导是有15个成员的委员会，主席为墨西哥、荷兰和尼日利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给予秘书支持。

按照釜山议定的原则，在领导委员会讨论过程中确立理论，在它的范围内协助进行较高效的、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国际合作，支持消灭全球贫困，达到千年所有目标，帮助实现2015年后发展方面的议事日程。就此确定了有限的重点选择，其中包括研究旨在发展合作和内部资源动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通过提高税率

和限制非法流动，吸引私营部门并考虑其对发展的作用与贡献，有助于包容发展的交通合作，弄清对作为发展的合作方式之一的经验交流的态度。

正是寻找协助国际发展较高效机制的愿望在墨西哥吸引了很多观众。参加会晤的有130多个国家的将近1500代表，还有不同的国际组织。以俄罗斯副外长C. A. 里亚布科夫为首的俄罗斯跨部门代表团参加了工作。墨西哥阶段对俄罗斯合作局也很重要：2013年五月8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增加合作局在协助双方基础的国际发展全权的№ 475命令以来，它首次出现在在国际舞台上。如果不是有一个“但是”，这个象征性活动可以认为是每天在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之一。墨西哥会晤实际上成为协助国际发展方面的模式转变。如果过去主要准则是帮助的效率，现在，正如会晤的最后文件所写的那样，最主要的是为了发展的合作效率。

把重点从帮助向国际水平的合作转移实际上正好是国际发展方面模式和俄罗斯对它的态度改变时期。直到不久之前，生效的还是2007年通过的俄罗斯参加国际合作理论。按照它，俄罗斯实行的协助国际发展主要是为多方提供援助的方式，即向国际财政和经济组织，首先是联合国计划、基金、专门机关、地区经济委员会和其它实现的发展计划的自愿捐献，参加对全球基金融资，还通过在“八大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组织系统范围内实行的专门倡议进行。直到不久之前，俄罗斯在协助国际发展方面提供的70%资金（最近几年每年将近为五百万美元）都通过上述渠道支付。

过去俄罗斯参加协助国际发展理论的内容体现了我国处境的特点，它到2005年一直属于国际帮助发展方面的受惠国（尽管我国自己为独联体国家提供了许多亿的帮助，但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统计登记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我国只是在2005年首次声明自己是全球范围内的捐助者。

由于最初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集中注意到了俄罗斯参加国际协助发展的多方形式，很显然，逐渐地它需要巩固自己的新地位。多方

帮助往往具有慈善和对象不具体的性质。受援者和中间组织打交道，而捐助者得不到任何回报。正因为这样，捐助大国的双边帮助和多边帮助之间的比例和我国的成反比。例如，美国的80%以上的资金是在双方合作范围内提供的。只有这样捐助国才可能考虑外交利益，使自己的商业能够推向新的市场，在宣传方面广泛利用援助事实本身。

发展问题直接关联到对外政策问题和保障民族安全与推进民族利益问题。这就是我国领导对今天一眼看来不是最迫切，但直接联系到俄罗斯周边产生的一切的问题关注的原因。今天我国向别的国家提供占国内总产值很大份量的援助，受援国家的公民们对此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包括在他们需要对地缘政治做出选择的时候，在这些国家出现提供象征性数目援助却几乎当作是决定命运和生存问题的恩赐的别的捐助者的时候。与此同时，得到俄罗斯数以亿计援助的人们，往往把我们的行动看作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现象。为了避免冲突，重要的是使这些国家的人们清楚看到我们对其民族经济的支持。只有这样，协助国际发展才不只是一般的对伙伴和较贫穷国家的支持，而是外交和影响的高效工具。

在相应的决定范围内，俄罗斯合作局和俄罗斯外交部、财政部与经济发展部密切合作起草并向俄罗斯总统提交了文件草案，其中总结了俄罗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作为协助国际发展参加国的活动。国家感觉到需要，主要的是愿意确立自己在协助国际发展方面的全面的民族政策的阶段到来了。

久等了的事件出现在今年-今年四月20日俄罗斯总统签署了批准俄罗斯联邦在协助国际发展方面新的国家政策理论的№ 259命令。按照理论的第4和第5条，俄罗斯应在协助国际方面积极和明确政策的范围内“支持国际社会对所有国家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追求，因为这是国际稳定和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俄罗斯国家在这方面政策的目的是协助这种发展”。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有助于伙伴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稳定，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消除已有的和潜在的紧张与冲突，防止它们的发生。

新理论提出了加强提供援助的具体的双方计划和有根据地确定受援国家的任务。今天对这些国家的确定准则如下：

- 为了改善在受援国家进行贸易投资活动的条件，包括通过简化商品和服务跨境流通的手续；

- 在受援国家建立工业和投资潜力。

十分明显：不仅应该改变双方和多方帮助之间的比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改变其地理方向（着重独联体国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和计划内容。协助国际发展成为独联体空间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值得指出，在墨西哥会晤过程中可以全面感觉到现代世界的多极性，世界个别地区，包括独联体盟友的问题的共同性。显示了传统的捐助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新兴的南-南集团之间的立场差异和矛盾。一方面，由于本身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俄罗斯不能忽视第一集团的活动，另一方面，和较独立的南-南集团国家制订进一步联合步骤符合我们政治和经济利益。需要和这个集团中相互民族利益吻合的国家进行细致的政治讨论，制订我们在协助国际发展方面的明确清晰的方针。为此必需保障尽快确立基于俄罗斯国家政策理论的协助国际发展方面的民族机制。原则重要的是在最短时间内起草好俄罗斯联邦在协助国际发展方面的委员会的规则、制订具体活动规定和对相应计划的财政保障的国家纲领。

协助国际发展早已成为美国民族安全政策方面战略和经济的任务，成为大部分捐助国得到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为了得到这些利益，在捐助国的建议和支持下建立和工作着许多组织、结构、公司、论坛和网络。大的捐助国，首先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那些自以为捐助量大大超过俄罗斯的国家，还不把我国看作是能够响亮声明自己在这方面利益的俱乐部全权成员。遗憾的是，我们确定协助国际发展方面潮流，即确定规则、活动方向、相互协作原则、创造对自己立场有利的社会舆论，在国际场所推动自己的民族利益的可能性还有限。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在国际网络方式上，推动组织专家社会，富有实行协助国际发展计划经验的专家的社会思想，

协助国际发展的实践主要是通过实现计划进行。计划的执行者是咨询公司、大学、国家机关、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吸引国际专家、国际援助各个方面：社会基础结构和服务、经济基础结构、生产和多部门项目的职业人士参加实现计划。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专家是独立的顾问，但他们有社会影响，能坚持自己观点，对他们的正确组织能取得效益。

因此，俄罗斯在举行全球促进发展合作的第一次高级会议上支持组织虚拟专家社会的思想，他们应该是协助国际发展某个方面的专家，善于使用捐助资金，富有实行帮助计划的国际经验，了解受援国情况。

在墨西哥会议过程中向组委非正式递交了建议的工作草案“为了高效发展的国际专家合作网络”。其目的是通过建立国际专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交流知识和经验、发现协助高效发展工作的优缺点、起草帮助发展的共同建议、为未来计划建立专家资料库、实现其它方式的合作来协助高效的发展。建立这个国际网络将对高效发展合作活动起协同效应。俄罗斯可以通过专家网络协调国际对协助国际发展问题态度的确立进程。参加国际网络方式将是开放的，志愿的，它为能够证明自己参加发展计划经验的专家们免费建立。

毫无疑问，只是在协助发展方面有实际的活动时才值得建立这种网络。俄罗斯合作局在这一意义上处于复杂的建立阶段。我们旨在尽快搞好国家跨部门机制的工作，以便为国家本身利益更高效地利用国家资源。这里无可厚非。我们实际上开始实践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做法，协助国际发展工具早已牢固地进入了它们推动自己利益的外交政策系统中。

协助比较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使有可能排除这些国家发生冲突和危机的前提。提高这些国家发展水平使有可能为所有各方利益而利用各种成果。是的，我们希望那些指望我们支持其发展的伙伴们清楚理解俄罗斯在这方面的计划和打算。它们只是在双方实际感兴趣时才能顺利实现。就此我们认为原则重要而且必须声明的是—理解俄罗斯认为它需要参加的协助国际发展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性质：

—协助国际发展的相应计划应该成为国家发展的因素并得到该国政府的批准，即受援国应该把它看作是自己民族战略发展的组成部分；

- 俄罗斯的贡献应该对受援国重要，有助于实际解决问题；
- 问题的解决应引起受援国社会舆论的共鸣；
- 相应问题的解决对俄罗斯也应该有意义（换句话说，受援国局势的调解应该防止出现问题或者尽量减少它对我国的后果）；
- 计划的实质和必要性应该得到俄罗斯居民的理解；
- 在可能情况下必须保障推进民族经济利益、我国生产者利益，组织国家-私营伙伴关系的相应工作；

众所周知，俄罗斯向来都帮助小国的发展。苏联时期按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逻辑-支持“兄弟”国家逻辑的外交积极性相当高。然而这里不只是推广意识形态思想，而是为全球不同国家的国民经济实现了大型的基础结构计划，培养了人才。今天世界上苏联和俄罗斯高校毕业生学生多达一百万。

今天，在苏联意识形态因素退出世界舞台之后，那些给人们的实际帮助仍然起着自己的作用。阿富汗人、越南人、安哥拉人记得苏专家们帮助他们搞好了经济，建立了工业，建筑了道路和机场。有些地方已经可以把苏联无私帮助和其它大国的掠夺行为相比较。苏联时期建设的一些设施至今几乎仍是民族经济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支柱。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有目的的帮助十分必要，能为加强俄罗斯在其他国家的地位做出不小的贡献，包括在社会舆论中，在普通人的情感中。

苏联解体使原来国内各共和国的联系变成了国际联系。在新的条件下，协助国际发展渠道适用于支持俄罗斯和经济潜力较小伙伴的合作，解决它们的迫切问题。俄罗斯确立自己在地区的权威捐助国地位是俄罗斯复兴和加强的代表性标志，它的伙伴们可以指望得到它的支持。正因为这样，协助世界发展机制旨在成为我们和近邻的战略一体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俄罗斯能源：时代的挑战

### 尤里·沙弗兰尼科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家联盟理事会主席、“世界政治与资源”基金会主席

referent@cng.msk.ru



**阿尔曼·奥加涅祥：**《国际生活》杂志主编：尤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俄罗斯能源状况如何？

**尤里·沙弗兰尼科：**我想强调以下几点。苏联在1990年前曾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实力。随后，1990年初对其进行了专业调整，建立了新公司。调节能源行业的法律就在当时问世。2000年，多亏先前做的工作，我们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上获得巨大利润。

燃料-动力综合体在近十年恢复了自己的地位——这是取得的极大成就。近十年来，与苏联时期相比，石油出口增长一倍。这些年来的油价增长约4倍。年开采量从3.4亿吨增至5.2亿吨。这是极可观的数字，很不错的成绩。落实了许多使得石油出口翻倍的基础设施项目。

波罗的海管道、里海管道财团、终端、天然气基础设施、“北溪”、“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都是极重要的项目，是未来的基础。开始落实新项目，还有部分荒废的气田。

恢复期已结束。很清楚，今后会再有这种恢复期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已达到最大极限。这意味需要进行新的地质勘探，钻探上需要有新的进尺。现在我们的年钻探进尺为2000万米，但最少需要4000万米。钻探、开发地的基础整理费用占油气开采费用的70%。

**A. 奥加涅祥：**能源是否能具有高新技术性，成为某种带动其它行业的火车头？

**Ю. 沙弗兰尼科：**其不仅应当是，而且实际上已是这种火车头。目前的钻探是一种复杂的过程，向月球发射月球车都比这一过程容易。在萨哈林14公里带偏差的井口，水平钻井或页岩油开采——都属于复杂储集层，为进行这种开采需要一套全新的技术。问题就在于这将由我们自己来发展新技术工艺，还是向西方购买。

假如说，今天的钻探进度为8昼夜，但应当是4昼夜。我们靠陈旧的苏联机床进行钻探。近20年来，我们只得到380台新机床，其中有一半又非俄罗斯制造。可在1987年至1992年，我们得到苏联制造的机床有1100台。从中可见其差异大小。现在已到不仅得更换旧机床，还必须在两、三年内增加机床的时间。每台钻探装置起码要2000-2500万美元。仅为进行一般的，非创新型的行业改装，就需要一笔巨额资金。

以下还有一点是，过去，“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机床年产量为300台，今天为25台。这意味，必须提出增产250台的任务。当然，这就取决于公司的意志。必须得有严格的，不得随便让资金外流的国家政策。需要在外国购买一些备件，请便，但必须在国内组装和生产。

最后，就是伴随钻探，岩层开发，进行液压分裂高新技术的发展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都在部长级以及与开采和服务公司层次上进行讨论。作为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我们竭尽所能。但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在国家政策和公司政策相结合为基础。

**A. 奥加涅祥：**在此，是否谈谈与伊朗有关的问题。其能在多长时间内恢复自己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地位？

**Ю. 沙弗兰尼科：**伊朗作为一个国家并没消失。禁运管禁运，石油还是出口。伊朗改向对中国出口，下调了开采量。

但作为天然气的伊朗——在近期的未来将会对我们提出挑战。我们现在正讨论天然气开采上的页岩气革命的课题。页岩气应被加上引号，意味这是在市场上出现的一种额外的气体。伊朗拥有，无论



我们怎么叫法，都未曾使用过的页岩气、天然气。伊朗是气体的储藏室，其可以在7年内启动这些气田运作。

**A. 奥加涅祥：**曾有过一种看法，伊拉克和伊朗抛向世界市场的能源能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和地缘能源政策。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Ю. 沙弗兰尼科：**政治原因。现在叙利亚课题将伊拉克推向后台。遗憾的是，我该说，在伊拉克每天都有人死亡。2013年的死亡人数比叙利亚的要多得多。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下，要发展和开采能源很困难。但据我所理解，就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还是继续开发。比如，《卢克》石油公司在几年时间内开始实际地采油。因此，往后会有话可说。这些挑战只不过是时间上被延长，但其本身还是存在。

**A. 奥加涅祥：**是否叙利亚被视为是替代管道的走廊？

**Ю. 沙弗兰尼科：**在有石油的情况下，不怕找不到替代。不是通过叙利亚，就是通过土耳其。

很少有人提及去年发生的重大石油事件——库尔德斯坦启动经由土耳其的管道。这是地缘政治大变动的先兆。由于库尔德斯坦一贯只与伊拉克挂钩，因此他们之间存在自己的困难。但一旦库尔德斯坦获得独立于伊拉克的出口可能性，情景就可能会大有改变。在有石油的情况下，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会有其它渠道被启用。

但为了使该地区油气开采得到发展，其必须处于安稳状态。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目前被紧缠在一起。如过首先排除人的损失，其次是叙利亚，随后又是伊拉克的话，伊朗状态的稳定无疑更重要。

**A. 奥加涅祥：**围绕跨里海管道进行的辩论实质何在？

**Ю. 沙弗兰尼科：**我任职部长时，我们就里海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在当时和现在都坚信，由于里海的独特性，国际社会（俄罗斯也

必须在其中起到自己的作用) 必须禁止在里海铺设管道。因为, 在此封闭的生态水域——海里生存着80%所有的鲟鱼——发生的任何事故将带来不可挽救的损失。墨西哥海湾发生的事故与里海如果发生的事故难以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禁止当地任何项目的原因。最好还是绕道里海铺设管道。

**A. 奥加涅祥:** 您主张向东方和东南亚国家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现在美国和中东能源供应商也涌向这些地区。我们的公司能经住与他们的竞争吗?

**Ю. 沙弗兰尼科:** 近5-10年来, 竞争不断加剧。是的, 其它国家有可能开采更为便宜的页岩气——这都是挑战。但我们在该地区居有良好的阵地。有石油管道, 终端得到发展。产量将近一千万吨的首座液化天然气在顺利运作。

我国国内公司工作效率低, 这倒是一个问题。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公司, 但大部分工作效率低。

我想从肯定的一面指出“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在我国很少提及这家公司。其信息比较封闭, 但其开采量占全国总量的12%, 钻探量为25%。而钻探的费用, 就像我们已说的是最高的。

总体上, 我们在东部沿岸的市场指标完全能与其他对手竞争。

**A. 奥加涅祥:** 乌克兰事件, 俄罗斯与乌克兰油气领域的关系是否将在两国关系上起决定性作用?

**Ю. 沙弗兰尼科:** 我们两国间的关系非常广, 但一涉及油气领域的关系就会发生冲突。

当我任部长时(1994-1995年), 两国签署了一年内过渡到世界油气价格的政府间协议。至于石油, 问题不大。在天然气问题上我们开始采取妥协的决策——要么以帮助形式, 要么以其它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说: 我还是给你钱吧, 但经济必须得是健康的。

应当过渡到正确的世界价格比, 这样经济才能康复。当然, 如果是乌克兰同意的话, 可以向行业进行投资方式予以帮助。这是第一

其次，就是这几十年来，尽管不断进行尝试但一直未能启动的——油气领域的一体化进程。

就这20年来，两国关系中也曾有过多好多少好事：有过好协议和友谊。我们在苏尔古特举行过大型会议，库奇马总统本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也到过汉特-曼西斯克，去过亚马尔。在会议上讨论了启动联合项目的可能性：你们开采，你们就获取利润，再投资的话，就开采你自己的天然气或石油。但因政治上对独立自主性的误解，此项目未能落实，我就是今天还为此感到奇怪。

我们与荷兰、英国、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而乌克兰，我认为，真是无远见，对兄弟人民抱有的不友好态度，也真的无话可说。

我国一直非常珍视伊万-弗兰克夫钻探队员。现在，您可以想象，如果钻探要增加一倍该做什么。这里需要多少优越的钻探员，并能信得过将今天的钻探交给他们的钻探技术员。这些伊万-弗兰克夫钻探队员大概也都已走散了。进行重建再继续干，再进行钻探，再开发——可真谓人才的锻造房。曾有很多与这种人力资源、联合项目相连的情节，甚至都签有协议。这些协议未能履行，首先，令人难受的，是由不依赖于俄罗斯的独立自主政治原因造成的。所有这一切当然令人惊讶和受到刺激。在以英国旗下的投资进入乌克兰可要方便多。

以上我们谈到的是管道。就因为未能解决运输，联合利用管道等问题，我们改向供应天然气，铺设“南流”管道。谁赢了呢？欧洲。我们在北方和在南方进行建造。但万一里海走廊建成呢？谁输呢？不外是已耗资不少的俄罗斯，乌克兰则失去过境国地位，管道趋于陈旧，天然气的储存量趋于减少。

对有理智的人来说，这种奇谈怪论完全不可理解。我现在不涉及政治，仅谈能源问题。俄罗斯其别无选择，她只得成为强盛和具有吸引力的一方。在投资吸引力上，我们赶不上。来自乌克兰的人也不得不拼命赚钱和实现自己。但又在哪里赚钱和实现自己？只有在广阔的西伯利亚。他们应坚信自己豁出的能量会得到不亚于欧洲能

予以的报酬，他又上哪里找雇主？他本是一位对他有需求的高度熟练工。这可是问题中的问题。

**A. 奥加涅祥：**您表达了一种思想，就是过低的天然气、载能体价格对经济起有不良作用。但我们也有其它例子。因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是联盟国家，她在合法的政治基础上享有优惠待遇。按低价向自己的近邻提供天然气不总是会将其惯坏吧？

**Ю. 沙弗兰尼科：**您说的完全对。我们与白俄罗斯的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是的，基于两国总统、议会做出的政治决定正在组建经济基础。价格低——好在俄罗斯。

与乌克兰本来也同样能这样。世界价格就是世界价格。但在开始实施联合项目时，那我们也能向他们以另列的价格提供矿藏地，保障运输，其就能以更低的价格输送天然气，这将无疑起到推动作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我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是美国。近六年来，他们将钻探的进尺自5000万米升至一亿米。我们对钻探20口井就十分满意，他们钻探100口井。近六年来，美国显著增加了对钻探设备的订购，活跃了工业：40%的人在此服务行业就业。再说，他们为工业用户提供的天然气价减半。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原先比我国高1.5倍，现在则要低。可以想象，这对服务于美国油气综合体的工业予以了多大的推动力。他们就干脆投入大笔资金。我们不仅在与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或是与乌克兰，如果其能找到交织两国经济的公式的合作上，有义务运用此典范。这种典范也应当被我们应用于自己的经济。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并有义务去做。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金砖国家：不再仅举行峰会而已

安德烈·科里莫夫

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经济学博士

截止不久前，许多专长金砖国家课题的谈论和撰文的人，陷入一定的困境。是的，过去五年举行首先是四国（金砖四国），后为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国家首脑定期会晤，更像是一个政治俱乐部——欧亚、南美和非洲主导国家间为讨论全球问题的新平台。高层会晤上的辩论越来越深刻并逐渐扩大了讨论课题。但这种会晤本身，事实上还不曾意味正式的新联合体或联盟（媒体就经常这样称金砖国家的形式）的诞生。



更甚的是，信息灵通的专家指出，金砖国家在建立类似的联合体前（就是各方抱有一致愿望的情况下），须经历更漫长的路程。

是的，上述描述的非正式联盟的国家确实有不少共同利益和相似的特征（例如，其中没有一个作为自给自足的国家加入西方的军政和经济联盟，并有胆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坚持自己的观点）。

此外，这些国家的经济具有潜在的互补性并处于发展阶段。就是出现被承认的金砖国家联合机构（新开发银行和金融基金），也还排除不了目前存在的差异和转型为国际上成熟的国际联合体的客观困难。

金砖国家之间现有的经贸关系并不说明他们之间存在深层的和全方位的合作。但“俱乐部”成员国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关系，这是例

外。至于巴西-俄罗斯，俄罗斯-南非或巴西-印度、南非-巴西间的贸易额或相互的投资额，说得婉转一点，目前还非常微薄。

金砖国家之间也没有多边互利的大项目（但个别的双边国家之间，这些项目已存在）。不能忘记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果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几乎都属于邻国，那么另两个伙伴远在相距欧亚大陆“三驾马车”万里以外的大洋彼岸。最后，根据对一些在世界舞台上的敏感事项，我们实际上是竞争对手，或具有不相似的立场。

这种局面，一方面可以以金砖国家形式的不成熟来加以解释。做个比较：欧盟国家为达到他们今天的合作水平（但就是今天离和谐与一帆风顺还甚远）走了比金砖国家长十倍的路程。但问题不只在金砖国家显而易见的成熟性——参与国就可见未来的联合战略合作纲领，还只以最笼统的联合政治宣言形式进行了表述，才刚以其它水平上和领域的合作作为补充的横向联系进行充实。

我就以其中的两个领域为例。因为作者对其中的每一个领域有直接关系：金砖国家的议会和政党机构。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领导人现在的会晤在最不相同的国际平台上进行，不再限于一年一度的峰会）、部长级间进行的积极合作，政府经济、金融等专家进行频频接触的背景下，议员们与社会政治力量（首先是政党）代表间的关系正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但与此同时，我看，此领域的合作就是在其初始阶段就有益。

众所周知，金砖国家在2014年巴西峰会上通过了确定未来联合银行规范的文件，签署了新开发银行的章程，各方承担了相应投资的义务（在初步阶段各方将投资20亿美元）。类似的文件需要得到各参与国国家议会的批准和在国家预算框架内对指出的投资额的确认。

因此，就在此阶段上，金砖国家的方案就要求由议会高度重视和附随。此外，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全球五国”合作，能致使国家通过追加法案和参与国个别立法条款的协调。

再说，我们的议会不仅行使立法职权，但也是各国政府机构的代表。因此，如果是谈及金砖国家形式下的包容性战略伙伴关系（而现在谈的正是这种关系），那么，以我们议会间的合作来充实这种进程是必然的。欧盟国家的工作经验，我国在独联体框架内的合作经验以及亚非拉美国家的一体化进程，都说明这个问题。

以上所述的并非意味立即组建金砖国家议会的某种方针。就是欧亚经济联盟参与国之间对类似方向的工作，遇到我们受尊重的伙伴周所周知的反对，他们对这种建立类似欧洲议会的国家至上议会形式进行政治上的靠拢未有（他们认为没有）思想准备。

再说，欧亚联盟是由其参与国在独联体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形式下，经过20年艰难的联合工作诞生的，我们的人民又拥有数百年共同相处和在各领域进行积极活动的经验。不过，我想，正是后者（一系列国家特权代表对苏联幽灵的恐惧），在对发展欧亚一体化进程的议会体量道路上起了刹车作用。

对金砖国家成员国来说，其未有“苏联因素”的感受，但其中存在另一种阻力原因。上面已指出了其中一部分（金砖国家的不成熟性，缺乏联合机制和项目，除了刚以文书形式问世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储备基金方案）。此名单还能以阻力不小的财政开支加以补充。

当然，“五国”没有必要像欧洲议会拥有那么多翻译，完全可以备用四种语言（英语、汉语、俄语和葡萄牙语）。但要出席金砖国家在任何一国举行的假设的议会会议，务必耗资数百万，这相等于用于这些国家议会间所有其它活动的经费。再说，用于组建金砖国家常设议会中心的经费可不小。

最后，说实话，在近期的未来，很难想象这种常设国际机构完整的议程。换句话说，金砖国家伙伴的合作还没有达到——甚至是在可见的未来——要求有一个国家至上议会机构的水平。最后，我不

认为金砖国家在原则上做有今后同意让一个完整的国际立法机构凌驾于本国至上的思想准备。

那么，今后三、五年内在此领域应当和该做些什么？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步骤（其顺序可以根据实际外部条件改变）：

- 加强议会的双边联系。今天，这种联系无疑是有，但其水平各异（近年来，俄罗斯与中国议员之间的联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 研究在国际平台上进行金砖国家议会间磋商的实践，首先可以利用在日内瓦举行的最古老又具有权威的各国议会联盟大会的可能性（金砖国家成员国在各国议会联盟都有自己的代表团组）。

- 金砖国家议会下设的各分委会之间进行合作，首先是各国国际事务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在必要情况下能有其它分委会代表参加。作为参考——尽管欧盟建有欧洲议会，但也采用显示了良好效果的欧盟国家各国议会分委会进行定期会晤的实践。

- 定期举行金砖国家议会领导人间的会晤。

- 基于相关国家议会代表，组建一种（类似独联体成员国议会间大会、各国议会联盟或欧洲理事会国会议员大会）的金砖国家议会大会。

当然，以上罗列的不是建立类似的议会间对话仅有的形式。

金砖国家政党机构的研究就更少，但在全球化和迅猛发展的政治生活，其超越国界的急剧性和前不久的外交事件对内政及许多当代国家政治气氛（自然也包括俄罗斯）起的影响条件下，说明对这种关系形式的需求。

我说不上作者指的是某种完全新颖和非凡的事物。国际政党间合作的经验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积累。这里我们可以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1847年基于自己在欧洲各国的拥护者奠基的《共产党联盟》——第一国际的楷模。



在列举当代的政党组织，可以指出以下著名的政党间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建于1864年，于1951年再度恢复工作，其联合了125个国家150多个政党），或像欧洲人民党（建于1976年，其联合了39个国家的70多个右翼保守派的欧洲政党）。

但这种联盟（至少在形式上）是按意识形态原则进行构建，他们拥有相似的纲领和“价值观”。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在出现另一种怪有意思的进程——不按意识形态，而按地区原则组建稳定和具有权威的政党间平台。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就是一例。

这是一个年轻机构。其第一届大会于千年交替的2000年在米兰召开，但今天已有50多个亚洲国家的359个议会党派在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旗帜下工作。俄罗斯在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有三个政党的代表“统一俄罗斯”（撰文的作者作为统一俄罗斯党派成员是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设委员会成员并是会议的联席主席之一），其次是“公正的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顺便说一句，在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中也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

基于其经验，世界其它大陆也开始组建类似的机构——非洲（建立了非洲政党理事会 - CAPP），拉丁美洲（建立了拉美和加勒比海政党常设会议 - COPPPAL）。

至于欧洲本身，情况有所不同。欧洲没有公认的泛欧政党组织。欧洲委员会曾在当年提倡对在当今条件下政党的作用和意义进行分析。逢巧，相关论坛正值俄罗斯为欧洲委员会轮值主席之际举行，因此论坛于2006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

这里就不谈当时进行辩论的细节，但我作为编辑委员会成员能证明，我们在欧盟委员会的不少同仁认为，“欧洲的政党正处于暮落阶段”，其中大部分政党在纲领和方法方式上与自己主要的政治竞争对手已没多大区别，再说，公民社会的“非党派组织”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首先是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

在过去几年中，类似的情绪在欧盟的变化不大，有些方面甚至加强。怪有意思的是，他们大洋彼岸主要伙伴的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继续围绕传统的“两重唱”党派（共和党和民主党）团团转，顺便说一句，这些美国党派本身无心进行国际政党间对话，包括与其自己盟国的主要政党进行对话。

无论怎样，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党合作机制的转速在增快。仅一个中国，其执政党就建有上千名熟练专家进行工作的中共中央国际部，在世界各地建有分部，分部领导人为副总理一级，副领导为部一级。

南非的情况也很相似（规模小一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仅获有在议会为压倒多数的执政党和总统席的地位，还是“全非政治的主导力量”。正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对其它非洲国家建立上述提及的非洲政党理事会示范的热衷态度并非偶然。

至于印度，曾为主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国际政党联系领域进行了积极和有目标性的工作。印度国民大会党代表曾前来俄罗斯参加我国执政党（“统一俄罗斯”）举行的大会，与“统一俄罗斯”党就扩大政党间对话的形式和方法进行磋商。

替换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举行取得辉煌胜利的议会选举前不久，向莫斯科派遣了高层代表团，旨在向俄罗斯伙伴表示他们有意继续进行政党间对话。此意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2014年5月30日）举行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设委员会会议上，随后在科伦坡举行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大会会下进行的工作性磋商上得到确认。

巴西的情况也相似。至少作者与目前执政的联合政府政党国际分部的成员进行的个人接触，显示了他们希望加强与俄罗斯在政党水平上的接触，“尽管我们相距在不同的两半球”。

现在也正该指出，我们国际政党对话的所有的伙伴明确表示有意组建金砖国家的政党体量。同时，在顾及到我们政治体制的特殊

性，可以按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原则奠定基础——所有在国家议会中占有应有议席（例如不少于5%）的政党能为对话伙伴。

我们也还讨论了今后多边政党形式能进行辩论的课题。当然，其在某些方面也确实重复了金砖国家峰会议程和在金砖国家旗下今后议会辩论的可能议程，但今天就存在一系列只有以政党形式能更有效处理的问题。

所有初步工作会晤的参与者一致同意，必须对所谓的“有色革命”，对外部企图强加于我们社会具有争议的价值观和思想教条等实践拟定共同的态度。

对联合项目（如新开发银行）或对世界发展的一些迫切和重要问题持有的共同立场予以信息、宣传上支持进行合作与协调努力，将会带来不少好处。

在各种国际平台（党政、议会、社会平台）和对第三国家的关系上联合我们的努力，将会是非常有益。

作者当然远不是从十全十美的角度来看待研究的趋向和可能性。无论在最初阶段还是进一步的联合工作中，都会出现棘手的问题。俄联邦内部对类似的形式也有一定的疑虑。

我有时在与我们的一些执行政权的代表交往后产生一种感觉，这些同行将政党以及金砖国家议会形式（而且不仅仅是金砖国家的）视为是，说得婉转一点，多此一举的麻烦事。这种态度无助于我们有效巩固俄罗斯在外交上已取得的成就和为解决有助于俄罗斯（包括金砖国家内部）这种或那种问题扩大潜在盟国的基地。

在俄罗斯轮值为金砖国家主席前夕，我在结束新国际形式框架内有关补充合作领域的概述不能不指出，新的，具有前景的伙伴关系的政党和议会机构能极好地融入“五国”组建的其它机构。如果不提那些已在我们国家执行政权间形成的众多平台，那么至少还值得指出两个结构：金砖国家业务理事会和研究金砖国家的国家委员会。

再说，今天在执行政权机构内部就可以开始拟订扩大我们与金砖国家积极合作的专项计划。例如，在独联体国家有不错工作经验的《俄罗斯合作》联邦署，我想，其在具有相应的资助情况下，能承担许多与“全球五国”进行人文合作方面的工作

在任何情况下，金砖国家已显见的关系发展（已令我们传统的对手警觉，但鼓舞了我们的朋友），应当不仅在国家元首，部级和部门一级上被固定和加强，也应在有效利用情况下为共同事业提供自己“附加产品”的其它形式中固定和加强。



## 北约：转向过去

德米特里·达尼洛夫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安全研究所系主任，经济学副博士

dm.danilov@mail.ru

乌克兰危机不仅迫使北约改变自己计划，而且改变其导向的目标。相应的决议本应在相当短时间内商定，以便在2014年九月4-5日于威尔士举行的“确定北约未来”峰会上讨论通过。拉斯穆森说，北约国家“应该就俄罗斯对我们安全的侵略的长期战略影响而做出坚强的决定”。北约副秘书长亚历山大·弗什博重申：“现在我们当然需要评价乌克兰周围事件的后果，可能重新审议自己的整个战略”。

可是已经很明显，北约未来的演变已完全确定。如果“在乌克兰之前”北约承认2014年底从阿富汗的退出而“结束行动时代并开始集中时期”，即对它开辟新的时期-在欧洲境内及时集结遏制力量，“以便全面准备快速应对威胁北约成员国或地区或使用武力者，包括对我们（北约）警告时间很短的情况”。

### 从阿富汗到威尔士经过基辅

2014年三月26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欢迎了对美国采取的报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荒谬和非法军事行动的步骤表示欢迎”。就此拉斯穆森和奥巴马强调了集体防御的必要性。这样，北约返回遏制俄罗斯的逻辑，将相应地进行军事计划和准备。许多所谓“新欧洲”国家，首先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经常并且一贯地要求北约加强集体防御功能。2010年十一月份在里斯本通过北约新战略理论时，它们达到了规定盟友们对波罗的海上空进行经常巡逻的目的。2013年十一月北约在波罗的海和波兰举行了大规模的“坚定爵士”演习，按华盛顿条约第五条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参加国演练了恢复领土完整的行动。

在里斯本峰会上毕竟现实评估占了上风：“常规武装力量对北约领土袭击的威胁小”，尽管不能完全忽视。现在北约声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入侵”，返回了相互遏制的时代，相应地重新审议军事政治重点和军事计划。弗什博强调说：“集体防御向来是北约的主要任务。它可能变得比冷战结束后北约从事的某些使命更为优先重要”。俄罗斯清楚看到，“那些希望返回冷战时代，要求达到围绕华盛顿条约第五条的北约新团结的人们在北约占了上风”。

很明显，在威尔士峰会将批准加强欧洲集体安全计划，首先将是依靠军事训练积极化，并将加强相互遏制逻辑和结构。俄罗斯实际上得到了不久前还在和北约讨论的，关于北约从阿富汗撤出后其行动积极性指向何方的问题的回答。以前关于加强军事技术合作，增大联合演习规模等的建议已不再适时。实际上，北约得到了其习惯的使命-团结起来对付地缘政治敌人。在格鲁吉亚之后和乌克兰之前北约曾企图在尊重相互利益基础上通过所谓“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宣言。而俄罗斯和过去一样，认识到“这里指的是军事方面主要大国与最大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

乌克兰危机使各就其位。冷战毕竟没有结束，俄罗斯指责西方：无钱的赌博确定了“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赌徒的立场，北约作为西方遏制俄罗斯的军事政治支柱从阿富汗返回欧洲。对于北约最重要的任务，包括在威尔士议事日程上提出的任务仍然是加强跨大西洋的联系：一方面北约应保障美国向亚太方向漂移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增加欧洲的“伙伴能力”-欧洲人应为集体安全和防御作出贡献。

利比亚战争清楚表明，欧洲没有美国的参加不仅不可能单独对付类似冲突，而且它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欧洲人不能履行在北约议定的关于最低军事开支2%（2013年仅英国和希腊能遵守这个界限）和拨出最低的20%的军费用于购买主要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决议（2013年只有英国、法国、西班牙、挪威、土耳其能够履行）。

“北约防御支出不相符在增大。从2007年（作为危机前的基础）到2013年美国支出的份额从58%增加到了73%。2013年欧洲国家

在总的防御开支方面占的份额总体继续减少”。结果北约一直没能保障“权利、风险和义务的合理分配”。

现在，在欧洲安全系统危机背景下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美国得到新的可能性，用于加强其地位，限制欧洲盟友的，即便是微弱的独立行动企图，特别是在对俄罗斯关系上，促使它们积极纳入支持欧洲使命和美国保障的轨道。欧洲则希望利用局势，在它不可能增加对自己的跨大西洋行动的物质保障条件下增大美国存在。此外，已破产的欧盟东方政策使它难于制订某种共同的反危机政策和阻止欧盟的政治腐蚀，需要寻找欧洲统一的外支撑点-承责任的（俄罗斯）和强大的伙伴（美国）。很明显，北约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提供不可或缺工具的不可或缺机构。

2014年三月19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题为“为什么北约对美国重要”的讲话中谈到了北大西洋联系的必要性。秘书长强调：“乌克兰事件严厉提醒，不能把欧洲安全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欧洲和美国都不可能单独解决此问题”。美国在欧洲军事政治的存在加强集体安全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支柱是欧洲反导弹防御系统。现在它的建设将不是在俄罗斯担心的气氛中和“不针对保障”的寻找中，相反地，是在保障欧洲和大西洋安全轨道上。这里，俄罗斯又成为潜在的威胁。

北约是否会加强在欧洲的支柱呢？欧洲人是否愿意“适应”美国和欧洲安全新威胁呢？政治上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在非北约方式上和诸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回答”不是容易的事，可能降低一些欧洲国家对北约内部严格方针的支持。在原则上大概不会有任何实际变化：在财政经济情况极其艰难和激烈的竞争中，团结队伍和加强安全的呼吁并不足以使欧洲国家为集体安全提供补充资金。而且，需要为乌克兰找到相当多的资金，如果欧盟打算和它签订联系协议。

大概，对于美国的大部分盟友，美国军事政治加紧卷入欧洲是这个问题已经由于乌克兰危机而得到解决的信号，即集体安全及其经费仍然可以没有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紧缩财政预算而得到保障。美国对此显然满意，即使利用“乌克兰”理由，也难于指望欧洲国家会为集体

安全投入额外资金。但现在美国得到了影响欧洲的有力杠杆，欧洲盟友的大西洋方向将得到加强，可以阻止可能的修正主义，特别是考虑到欧洲人在（北约的）董事会投票中反正没有足够的流通股。

北约一再强调十分关切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力和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东南地区的可能性。乌克兰呼吁保护。乌克兰国家安全和防御委员会主席帕鲁贝伊硬说：“俄罗斯不放弃名为“俄罗斯之春”的入侵计划，在边境集结了十万军队”。尽管俄罗斯否认，美国毫无根据地声明俄罗斯表现挑衅性质的军事积极性，北约秘书长也声称“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军事施压”。俄罗斯指出空前的“所谓“俄罗斯威胁”运动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是向社会证明北约恢复原来的集体防御，即遏制来自东方威胁的方针的正确性。当然，过去就坚持北约的保守“防御”使命的那些人是支持这个目的的。

为了对付“俄罗斯威胁”，波兰内务部长巴尔托洛梅 先克维奇声明波兰政权在为事态的任何可能发展作准备，他不排除利用乌克兰和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热战”，而且，“爬行武装冲突。。。可能爬到我们（波兰）边界”。三月初，在三月15日克里米亚全民公决之前，北约应波兰请求和依照华盛顿条约第4条立即进行了协商（讨论了引起成员国对安全方面严重不安的问题），会上重申了盟友们的团结。北约采取了加强安全措施，例如，把用于巡逻波罗的海国家领空的飞机增加一倍多，还加强了北约东部边界的监督、侦察和预警系统，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境内组织了空中预警机的巡航。拉托维亚国防部长莱蒙德 韦伊奥尼斯在三月24日声明：和美国与北约进行着关于在波罗的海地区增驻部队的对话。

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斯文 米克谢尔证实：“我们希望北约在地区有可能的，如此强大的存在。。。我，不仅我个人，认为加强遏制应由陆军来保障-它们或者在波罗的海常驻，或者像在土耳其轮流驻守”。美国在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军存在也加强了。秘书长拉斯穆森声明将全力加强陆上、海上和空中的集体防卫。

2014年二月26日北约国家的国防部长们发表了特别声明，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它表明北约准备坚决



行动，不局限于政治外交努力。后来代理外长安德烈·杰希察报导了向北约递交呼吁书的消息，“请求北约考虑利用一切可能来保护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保护乌克兰人们和在乌克兰境内的核设施”。

北约秘书长重申必须而且准备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进行积极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主要方向是“变乌克兰武装力量为现代的、高效的、能保障可靠遏制和防止军事威胁的组织”；提高乌克兰空军和北约联合行动的能力，增多乌克兰对北约演习的参加。北约向乌克兰派出了一批专家。提供“咨询援助，以保障对危急结构的保护”，显然，这里包括国家意义的和行政管理设施。俄罗斯则向欧安组及其派往乌克兰的使团上诉。

由于北约的行动打着“保护乌克兰”口号对“莫斯科报复”，不仅无助于西方呼吁的缓和冲突，相反地转入了新的对峙逻辑，可能增军事危险，滑向沿新的分界线的对峙。在实际把俄罗斯当作侵略者的时候，有乌克兰参加并且可能在它领土上举行的北约军事演习积极化势必导致地区局势和俄罗斯-北约关系的紧张。

按这种对峙逻辑已不能认为北约在乌克兰扩大其军事存在不现实。此外，北约认为对乌克兰的协助是西方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大西洋追求的总的责任的一部分。然而正是“欧洲大西洋问题”分裂了乌克兰和乌克兰社会，最终导致了欧洲迈丹。尽管基辅新政权声明不打算加入北约（代理总理亚采纽克承认这纯粹为了保持乌克兰的统一），北约也还不愿意在实际平面上考虑接纳乌克兰的可能性，今天北约和乌克兰的亲近与合作的深入显然和恢复乌克兰统一的声明相矛盾。

乌克兰和它的西方伙伴计划在乌克兰危机激化并演变为内战的威胁条件下加强军事合作。乌克兰议会已经通过了“关于2014年允许外国武装力量部队进入乌克兰国境参加演习”的法律。它规定从2014年五月开始举行八次演习，包括和美国与邻国-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的演习。

例如，乌克兰计划在本土和波兰进行“法律秩序-2014”军警部队演习，和美国进行大规模的“西布里斯-2014”演习，举行乌克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机械化部队的“南方-2014”演习。这些活动

的举行相当成问题（考虑到它们计划的地理复杂性和乌克兰军事管理与武装力量的无秩序状况）。

然而，在乌克兰内部冲突条件下完成这些计划的任何企图都会成为严重扰乱局势的因素，会大大增加地区军事危险，后果将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军事政治对峙。宣布暂时停止乌克兰境内军事积极性不是更合符逻辑么？北约要求俄罗斯撤离乌克兰边界，同时却增加自己的军事政治卷入。

不能不考虑到，把俄罗斯-北约关系转到相互遏制轨道会降低相互克制的程度。在俄罗斯和西方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时，北约的开门政策又可能演变为北约的加速东扩。俄罗斯就此提出“原则”要点：必须“可靠地保持乌克兰法律上固定的不结盟地位并由国际玩家加以保障”。否则再无退路，又会出现新的实际对峙前景。另一方面，类似的方案大概会成为抑制西方的最有力因素。何况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使它们加入北约的相当成问题。

由于乌克兰事件，摩尔多瓦内部也可能产生改变其中立地位，然后加入北约的问题。情况表明，正是在乌克兰危机时北约副秘书长A. 弗什博访问了基什尼奥夫，而摩尔多瓦首次参加了北约行动（在科索沃）。弗什博当然提到了摩尔多瓦的中立地位，但祝贺了它和欧盟的联系，强调指出“欧洲一体化与北约的更密切关系携手并进，因为两个组织基于同一个价值观”。摩尔多瓦的这种划定的欧洲大西洋前途，包括对北约的倾向很可能使它重复乌克兰的情节：放弃德涅斯特，和俄罗斯决裂，内部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换句话说，暂时北约未必能接纳这两个国家，甚至是在俄罗斯-北约关系的下一个，第三个（1999年南斯拉夫和2008年格鲁吉亚之后）危机的条件下。

## 不关门政策

北约在自己网址上登载的关于其立场的题为“俄罗斯指责的解读”的文章中，实际上阐述了基本分歧，宣布俄罗斯的关切和对北约的不赞同毫无理由，也不合法。然而，问题在于俄罗斯明白和感觉到自己的“真理”，而且不隐瞒其根源。北约现在才做这样解读，

尽管它早就知道俄罗斯并不是西方扩大的地盘，它“不是这样的”，是另外的和危险的地域，因而必须对它进行地缘政治的遏制，并以建立“共同空间”的伙伴合作的高调加以掩饰。

乌克兰危机表明从来没有过共同的空间。俄罗斯公开说过（这是西方的影响区政策），而西方用共同挑战-利益作掩饰隐瞒其扩大“自由和安全”区的实际政策。现在西方用过去俄罗斯对它的指责来指责俄罗斯，指责它违反国际法准则、武装侵略、侵犯北约成员国主权和损害领土完整，总之，是破坏已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建立欧洲新的深刻分界线。俄罗斯，而且不仅俄罗斯，认为这种指责是双重标准的鲜明证据。“这种政策势必导致损害大国尊严和利益，导致“魏玛综合征”。

俄罗斯不是欧洲大西洋的部分，它在欧洲分裂条件下能作为平等伙伴或反对者坚持自己的利益。最近俄罗斯致力于平衡这两条路线，在衰退的重启浪潮中发展伙伴关系。平等伙伴显然没能达到，俄罗斯理解需要依靠国内的团结，作为反对者改变自己战略。按照总统 B. 普京的说法，不断受到西方压力的俄罗斯弹簧反弹了。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亚历山大·格鲁什科在回答北约关于北约支持基辅“胜利者政府”的行动合法、“无可争辩”的声明时强调指出：“不能忘记科索沃、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教训”。北约承认从来不认为俄罗斯的关切合法，有道理，它不顾存在的分歧，责怪俄罗斯不愿意成为它的“优待伙伴”。

在乌克兰危机情况下，甚至里斯本峰会的“历史性成就”-把俄罗斯和北约关系纳入战略伙伴合作轨道的决议，也难于看作是西方真诚的行动。因为拉斯穆森实际上承认，现在西方的这种行动，过去就已有过：“这不是个别的事件”，是此种行动的继续：军事施压和冻结我们邻邦的冲突。德涅斯特、南奥塞梯、阿布哈斯，现在是克里米亚。和这些危机相关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大国决定立即独自重写国际规则，独断一切的行为”。

北约声明今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和俄罗斯建立关系。北约不冻结和俄罗斯关系，不关闭俄罗斯-北约委员会政治对话平台。可是完全不

清楚门安设在在何处，这实际意味着什么。因为北约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和对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改变自己立场的俄罗斯的态度，是否达成任何折中让步协议的可能性，甚至在技术方式上。对于俄罗斯，讨论缓和危机的可能性和俄罗斯与乌克兰直接对话的前景，存在别的地点和平台，和作为政治军事联盟的北约对话，大概完全不合时宜。

北约作为对俄罗斯的迅速回答采取了停止在俄罗斯-北约委员会与俄罗斯接触的的决定。决定是在即将举行重新评估和俄罗斯全面关系的四月1-2日北约外长委员会会议之前做出的。极难理解在这种条件下能如何进行实际协作，在北约委员会六月会议后俄罗斯-北约委员会2014年工作计划(2013年通过)中的哪些措施还能保留。一些措施还在四月外长委员会会议之前就已取消，包括演习和其它联合活动，阻止了俄罗斯参加对从事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美国轮船“海角七号雷”的安保活动。

北约各国也采取了缩小和俄罗斯军事合作的类似步骤。正在讨论着冻结供应俄罗斯两艘法国造“西北风”军舰的问题。这个项目本是军事技术合作的象征。暂时俄罗斯还没有采取反制裁措施，没有进行“相应的报复”。尽管北约从2008年八月份就冻结了和俄罗斯关系，双方关于阿富汗的合作并没有中止。现在俄罗斯政府决定(2014年三月25日)为俄罗斯-北约委员会专门基金会拨款达4百1十万美元用于对阿富汗直升飞机的维护。这是鲜明的信号，特别是在北约四月委员会讨论“俄罗斯问题”之前。俄罗斯原则上表明愿意继续在互利方面进行合作。显然这是在务实合作缩小情况下还可能达成协议的最大限度。因此，用于逐渐发展相互协作的大门，在缓和今天尖锐危机条件下毕竟还微开着。

然而北约委员会毕竟在2014年四月1日通过了确定取消和俄罗斯实际合作的声明，尽管没有取消在俄罗斯-北约委员会上的对话。和俄罗斯关系的重新审议推迟到六月份的下月北约委员会会议进行。北约理解到冻结与俄罗斯关系的荒谬性，因而没有全部停止与它的对话，但它难于指望能恢复俄罗斯-北约委员会工作，更难于指望俄

方提出此建议。北约议会大会通过关于在乌克兰局势没有改变之前不和俄罗斯联邦议会合作的决议，证明双方实际上是无话可谈。俄罗斯也召回驻北约军事首席代表瓦列里·叶夫涅维奇协商。

北约国家在最后文件中坚持要求立即按照2014年四月1日北约-乌克兰委员声明采取缓和冲突的步骤。如果说这是文件的主要目的，声明的内容显然与之不符。北约企图不直接地，而是依据它和基辅政权达成的协议，通过“乌克兰大门”向俄罗斯请求，然而俄罗斯没有正式承认基辅政权。与此同时，北约理解类似的最后通牒式语言不仅俄罗斯不能接受，而且根本不可能找到俄罗斯和北约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外交对话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北约认为仍在俄罗斯-北约委员会对俄罗斯开门以“议定乌克兰问题”的做法并不现实，因此在“四月提纲”中强调支持乌克兰现政权，而不是在北约-乌克兰-俄罗斯“三角”中寻找政治解决办法。

俄罗斯和西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于俄罗斯，克里米亚与之合并是西方直接或间接挑起的乌克兰危机的后果。西方则相反，认为乌克兰的(和欧洲的)危机是克里姆林宫的扩张和占领克里米亚的追求引起的。因此，把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看作“非法、不合法的吞并”的观点是实际协作恢复，那怕是部分恢复的主要障碍。北约-乌克兰委员会要求俄罗斯放弃这种“吞并”。应该强调指出：使用“吞并企图”（而不是吞并事实）这个词是为了指出俄罗斯政策与历史不符，西方就全欧合作的恢复对俄罗斯提出严厉条件。

北约在决定停止实际协作范围内提出的这些条件和对“俄罗斯行为”的其他要求可能迫使俄罗斯关闭大门。那时两边都失利，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安全议事日程中的最重要问题-阿富汗问题和美国与北约军队在2014年底从阿富汗撤出的问题。尽管北约决定停止和俄罗斯的实际合作，双方在阿富汗的协作-向贩毒斗争、从阿富汗转运货物、“直升飞机”计划方面的合作仍应继续。按福格·拉斯穆森的解释，阿富汗方面继续协作是“因为保障我们在阿富汗的使命方面有共同的利益”。现在的问题不是北约在即将重新考虑对俄罗斯关系的情况下是否对此“同意”，而是俄罗斯是否愿意。的确，如果北约

说只可能对阿富汗问题“技术上”保持和俄罗斯的非北约方式的合作，俄罗斯何必返回俄罗斯-北约委员会呢，那里甚至没有起码的关于相互协作的议事日程？

恢复原来关系不可能，这里拉斯穆森说得对。俄罗斯-北约的新关系及其今天的危机已不可能依靠南斯拉夫和后来的格鲁吉亚战争之后那种“增值的”合作积极性来摆脱。俄罗斯和北约已耗尽了此资源：以欧洲的根本性政治冲突告终的重启无再现的可能。现在对于俄罗斯和作为欧洲大西洋系统政治基础的北约的迫切的问题是能否抑制冲突和相互对峙的升级。正如俄罗斯副国防部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强调指出的那样，“以后和北约建立协作将考虑到伙伴们“遏制俄罗斯”的实际步骤”。

北约和俄罗斯在相互遏制方面的浮动对欧洲以外伙伴是严重的挑战。现在很明显，其中许多国家不愿意赞同西方立场和对俄罗斯的报复。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在阿富汗局势极其复杂，明显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况下，承认了克里米亚的公决结果。他的立场十分明确。北约以什么政治基础来和“全世界的国家和组织发展广大泛伙伴合作关系网”（按2010年战略纲领）呢，如果北约原则改变了军事-政治基础及其行动重点？要知道不管有多少伙伴支持北约立场，但趋向强化相互的遏制，包括军事准备的北约和俄罗斯关系的危机，不仅会改变这些国家和自称为“世界上28个最强大主权民主”的北约之间潜在伙伴关系内容，而且会改变其性质。



# 国际法和国际信息安全保障问题

---

## 安德烈·克鲁特斯基赫

俄罗斯外交部特别委任大使，教授、历史学博士

---

---

## 阿纳托利·斯特列尔佐夫

莫斯科国立M. B. 罗蒙诺索夫大学信息安全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历史学博士，技术科学博士，法学博士

---

信息通信技术（ICT）对人的生活、社会和国家的影 响难以估量。现代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有明显的好处，却又不可避免地为国际和民族的安全带来新的风险。世界对此已有实际的证据：为了违背联合国宪章目的、刑事和恐怖目的而使用（ICT）所造成的损害可以和使用最大破坏性的武器相比较。使用信息武器袭击的目标不仅可能是因特网信息资源，而且可能是国家工业、交通、动力部门的重要结构。而且类似的破坏规模和工艺水平在不断提高。

所有国家都确认信息空间刑事、恐怖和军事政治威胁的尖锐性。国际社会关于保障国际信息空间安全途径的辩论已不止十五年。现阶段关键问题是缺乏调节各国在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的全权国际法律基础。

2014年按联合国大会第68次会议一致通过的俄罗斯提出的决议“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方面成就”建立的联合国政府专家小组从事这些问题的研究。多年来俄罗斯一直作为文件作者出现。我们的决议得到一致的支持，参加这个文件的国家逐年增多（2014年已有40多个国家）。

联合国政府专家小组召集已是第四次<sup>1</sup>。2010年俄罗斯任主席的小组通过了成为国际信息安全讨论对象的报告。按2012-2013年任小组主席的奥地利专家M. 斯托乌克斯的评价，那个小组的报告“开辟

了讨论这方面最迫切问题的道路”，包括军事政治方面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利用<sup>2</sup>。

奥地利领导的小组的工作结果加强了和平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国家的共同兴趣。此外，小组的报告中对另一个原则问题—信息通信技术利用方面国际法的适用问题达成了一致。文件规定了平衡的公式：国际法总体适用于这方面，但必须就它怎样使用，必要时怎样使之适应的问题确立共同的理解。

显然，不是所有适用于人的传统活动的法律准则都“自动地”适用于信息空间。暂时在国际水平上还未制订好对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产生的国家之间关系调解的国际法准则和适应方法。国际社会对上述问题缺乏统一的理解阻碍防止与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空间非军事化有关的国际冲突。

2014年建立的新的政府专家小组的职责在于研究信息安全方面的潜在威胁和消除它们的可能的联合措施，包括各国负责行为准则、规则或原则，加强信任的措施，研究冲突中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问题和各国怎样在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使用国际法。按四次会议结果，小组制订了实际建议，它们应该成为国际折中让步的成果。

本文旨在详细综述与数字方面利用国际法所产生的问题。今天在不同的国际会议，首先在联合国进行着积极的辩论，反映各国寻找防止信息空间威胁的国际法“良药”的尝试。本文目的主要不是提出具体的“药方”，而是系统国际讨论进程。

### 1. 在现代国际法系统中怎样解释信息通讯技术的非法利用？

在国际法中没有确立战争或者武装斗争的公认概念，更没有信息战争的公认定义，尽管在一些国际文件中提到它。研究信息战争标志和制订公认定义的必要性还在于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达到武力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具有系列特点，难于运用法律规定。

- 没有“战前”时期，因而不可能确定军事性质的武力行动始点；
- 跨境性，即对敌人进行基于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武力侵略不必越过边界；



- 信息通信技术本身不是武器，从分类的角度难于确定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攻”为武装袭击。

信息通信技术的特点不能改变利用任何战争，包括信息战争达到占领或击败敌人目的的违反联合国宪章、主权国家平等原则的事实。

2. 能按照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3314项决议“侵略定义”来认定非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侵略么？

按照该文件第2条，确定国家侵略的行动基于使用武力、夺权原则、危险和敌对准则，不管是否宣了战。此条款适用于信息方面，但文件的个别准则需要考虑信息通信技术特点加以适应。非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传统的侵略概念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它与传统的派遣军队和利用武装力量无关，这使信息影响难于定义为侵略行动。

3. 信息通信技术适合“武器”这个专有名词吗？

由于今天没有认定计算机袭击为武装袭击的国际法，对此问题难于回答。所有涉及“动用武力”、“侵略行动”、“武装进攻”等概念的法律原则都规定存在武器及其使用，包括确定对受到袭击国家造成的物质损失水平或领土被占领。

在上合组织和独联体范围内通过的一些国际文件中使用了“信息武器”词汇，例如，在独联体国家合作协议（圣彼得堡，2013年十一月20日）附件中保障信息安全方面：“信息武器是用于进行信息战争的信息工艺、手段和方法”。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保障国际信息安全的政府协议第一条中有“信息战争”（叶卡捷琳堡，2009年六月15日）的定义，按照它，信息战争的标志是影响交通、通讯和航空、反导弹和其它防御设施的管理，使国家失去合法自卫权利，破坏信息结构设施，瘫痪国家管理和做出决定的系统，对极其重要结构的计算机袭击。

建议对旨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达到威胁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目的的关键概念的态度可供国际社会作为确定公认的信息武器定义的基础。

4. 哪些与非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法律事实可以确认为使用武装力量（按联合国宪章第39条含义）并导致自卫权（按联合国宪

章第51条含义)？怎样确定可以看作是“武装袭击”的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造成损失的边缘水平(按联合国宪章第51条含义)？

B 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物理损失水平难于评价，因为其损失往往是非物质性的(例如，维基解密网络上秘密信息的流失)。摆在国际社会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确定信息通讯技术利用造成的边缘水平，高于它即可确定为侵略。

就此北约通过的关于在信息空间采用集体防御原则(华盛顿条约第5条)的决议值得特别研究，决议和北约国家关于不宜制订信息工艺方面新国际条约和“自动”使用现有国际法准则的立场相矛盾。

5. 什么是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法律事实，包括用于损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并导致产生自卫权(按联合国宪章第51条含义)和怎样使之客观化？哪些国际机构全权对法律事实进行法律评价和客观化？

看来，今天伊朗(或者任何一个陷入它的处境的国家)还不可能向国际法庭控告一个或几个国家利用软件“Stuxnet蠕虫”组织对其铀浓缩离心机的袭击，因为在这方面活动还没有国际法规定并且没有先例条件下，不清楚需要什么资料才能提交国际法庭审理和怎样证实资料的客观性。上述问题使国际法庭难于对国际信息安全方面案件审理，因而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选择对信息袭击的非法应对方式。

6. 怎样防止国家在确定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事实时滥用职权，把这些事实作为得到自卫权的根据？自卫权利用的前提是制订合理根据和适当反应的准则。

7. 可否把民族信息基础结构看作是军事设施，一旦就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发生冲突时对它使用“传统武器”或用于破坏此种设施的信息通讯技术？

8. 从人文角度看来，哪些信息基础结构必须保护免受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袭击？

由于国际人文法律规定保障和平居民安全和保护平民安全关键设施(包括关键的信息基础结构)，国际人文法律准则需要就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进行重要的适应。与此同时，重要的是在国际人文法律的理解中，不能把信息通讯技术作为认识对象，因为信息通讯技

术是概括基于计算技术的信息加工程序的总的词汇，也是寻找、搜集、保存、加工、出示和传播信息的方法。

9. 怎样能保障进行计算机攻击时遵守适度和选择原则？国际人文法律的限制对各种信息武器是否适用（例如，限制使用导致过分的痛苦，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

10. 怎样避免各国在确定对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负责的主体时滥用职权？

确定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为恐怖或刑事袭击，使它们超越使用武力国际法律和国际人文法律效率范围之外，因而对它们可以单方面采取应对措施，而这又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11. 旨在破坏别国社会和政治稳定、社会秩序而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是非法行为并可以看作对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按联合国宪章第2（4）条含义）吗？

12. 怎样保障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主体归属？

信息通讯技术的匿名引起的识别侵略者的复杂性可能导致把使用武力事实归咎于信息系统被非法使用的国家。看来，在类似情况下利用第三国领土会使之卷入冲突，但不是把侵略责任归咎于它。

13. 怎样确定提供自己信息系统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非法使用的第三国家的责任？

必须制订国际法准则，固定国家不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其信息空间进行反对第三国的信息袭击的义务。

14. 怎样确定国家对其全权人士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行动担负的责任？

按照国际法准则，国家对自己机关，它控制的个人的活动承担责任。可是，可能难于确定这些人在信息空间是否为某个国家利益或者在它的监督下行动。

15. 怎样保障国家的中立地位，如果冲突各方利用它的信息通讯技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履行国家中立权利是迫切的法律问题，如果它们的信息系被用于进行网络袭击或其它非法行动。

16. 考虑到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匿名性质和及其可用性，在信息空间冲突时怎样区别参战者和非参战者？

17. 怎样确定信息空间军事行动场所？

18. 怎么样评价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损害国家主权之间的联系？可否认为非法进入具体国家领袖或高级活动家邮箱是对该国内政的干涉？这是否属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侵略行动、对国家主权的损害？看来，并非任何非法使用信息通讯技术行动，而只有对社会危险，带来民族或世界规模的严重后果的行动才属于这种威胁。

19. 哪些国际的或民族的机构和依据何种全权准则能够评价旨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所产生的威胁，包括从个别国家安全观点看来，对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造成的后果？由于在国际安全方面首先是国家有权利用国际法准则，产生对后果的非适当评价的威胁，而这又会导致产生对国际安全的威胁。

20. 怎样和利用哪些财政资金来保障国家配备信息通讯技术和技术手段的需要，以应对为了军事政治和恐怖目的，为了进行网络犯罪而对信息通讯技术的非法利用行为？国家需要哪些法律和技术准则作为立法基础？

21. 为了防止利用信息通讯技术达到恐怖和刑事目的，应在哪方面努力？

由于缺乏相关国际法律基础，这难于做到。2001年欧洲关于网络犯罪公约（布达佩斯公约）是创建这方面工具的尝试之一。俄罗斯和许多其它国家没有参加，原因是其中一个基本条款-在侦查时可以得到跨境资料的条款不能接受，-它和国家主权背道而驰。第32条规定在相互协助范围内可以不经另一方同意跨境得到公共资料（“a”则）或在有揭露资料的合法全权人士同意下得到保存的资料（“b”则）。而且条款内容模糊，不清楚是应该是谁的许可，怎样得到，涉及什么资源，此人有何全权。

俄罗斯不止一次表示担心这个条款实际允许潜入别国网络，即违反国家主权原则与伙伴合作精神和对国家之间建立的关系的尊重。

此外，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不是企图利用布达佩斯公约达到全球规模间谍活动的合法化？在著名的 $\Theta$ . 斯诺登揭露的背景下，这显然远非等闲的问题。

此外，数字空间的迅速开发和新工艺的使用已使布达佩斯公约过时。在它制订时期许多信息安全方面威胁，包括刑事罪行还未清楚或者没有得到应有注意。出现了信息工艺方面新类型的犯罪行为，例如，歹徒利用带有破坏性软件的所谓的僵尸网络 - 计算机网络遥控从事非法活动。作为例子可以提到布达佩斯公约中缺乏反垃圾邮件和“网络钓鱼”等的措施。

没有关于信息空间新的恐怖主义、相应的犯罪的概念本身及其组成部分的法律定义，因而难于对这种现象作斗争。布达佩斯公约中没有这种准则。此外，公约规定了复杂的修改程序，它只能在多数票批准公约后提出。使公约的修改难于实行。

越来越多国家支持俄罗斯立场，认为今天需要在联合国范围内制订反信息空间犯罪的公约，删除布达佩斯公约中比较矛盾的条款，在考虑它的正面经验的同时，保障不干涉别国主权和不干涉其内政。需要有考虑到所有国家立场和基于尊重国家主权的全球性文件。

**22.** 怎样解决国家寻找安全与自由，得到信息的权利及其在信息空间行动的责任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呢？按照2013年通过的联合国政府专家小组关于国际信息安全的报告，各国保障信息安全的努力应和保护人的权利与基本自由同时进行。信息空间的间谍活动，对国家和网民私生活的侵犯（从 $\Theta$ . 斯诺登的揭露中可以清楚看到）是对信息安全的实际威胁，因此，十分必要制订保护人权和信息空间资料的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值得特别提到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1966年）。它固定了人自由寻找、得到和散播任何信息和思想的权利和与这些权利相关的特别责任，其中包括一系列为了尊重别人权利和声名，保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居民健康或道德而规定的必要限制。

**23.** 怎样保障交换关于关键信息基础结构的信息而不把它们变为容易袭击的目标呢？

对关键基础结构的网络攻击可能导致成千上万人失去水、电、食品供应。损坏保障核电站和水设施工作的信息系统可能导致大量伤亡。为了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确定各国不袭击关键基础结构的义务。但为了履行此义务，需要识别类似基础设施，确定把它们纳入民族或国际关键基础结构的准则。可是，这又会使它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使它们成为“公开暴露的”袭击对象。

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这矛盾。但很明显，拖延时间对我们不利。网络攻击频率的增加比国际对此谈判速度快得多。看来，在讨论与关键基础结构有关的全方面问题的同时，可以采用“小步战术”-例如，作为保护银行基础结构的措施可以签订某种银行方面“互不侵犯条约”。什么样的国际法方式能使各国承担相应义务呢？它们能实际履行吗？

24. 出现政治上和法律上评价市场上出售的，可能用于进行非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行动的工艺产品的问题。2013年联合国政府专家小组关于国际信息安全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担心把隐蔽的有害功能纳入信息通信技术，其目的在于损害民族安全，降低信息通信技术使用的可靠性，损害贸易各方之间的信任。怎样证明这些有害功能不是为了达到在信息空间的优势而故意“掺入”产品中呢？希望“透明”关系的国家之间应该交流哪些关于世界信息通讯技术市场上可能有此漏洞的产品的信息呢？怎样规定互换现有条约未包括的有关漏洞信息的秩序呢？

25. 西方在国际平台上积极提出的“时髦”问题之一是所谓“扩大潜力”。防止工艺发展水平不同国家“数字爆炸”的措施迫切而必要，但怎样防止把它们用于恶意目的？怎样保障援助计划变为干涉受援国家内部事务的工具和屏障呢？怎样能实现创造数字潜力的措施而不伴随特工机关增大得到受援国国家机构和私人资料的可能性呢？这势必损害后者的民族安全。与此同时，保障援助国安全的问题也激化。怎样防止出现“数字科学怪人”，防止受援国利用先进工艺来对付自己呢？

26. 现有的因特网控制模式是否符合保障国际和民族信息安全的利益呢？考虑到对此问题的“多方利益”态度，它的哪个方面需要改革呢？

27. 考虑到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成就，在科技进步背景下怎样确定信息通讯技术概念本身的现实定义呢？

2014-2015年肯尼亚在联合国国际信息安全政府专家小组的代表K. 格涛精辟指出，信息通讯工艺是极其活跃的“活动目标”，法律准则难于及时充分反映新的信息现实。然而这不能改变国际法规定的国家之间关系。与此同时，不能否认其中的许多条款是在网络革命时代之前制订的，主要在于调节传统的国际关系，没有考虑到所谓模拟因素的影响。新的工艺现实要求对现有国际法进行修改和适应，如果它不符合时代精神和方式。

极其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国际社会公认“信息武器”、“信息战争”、“信息侵略”等概念。为了使它们符合新的现实，需要国际人文法律准则。在个别情况下需要制订调节在新的信息空间出现的国际关系的新的法律准则。还必须制订使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与准则适应数字方面特点的措施系统。

俄罗斯方面认为，以联合国宪章为依据的公认国际法原则*jus cogens*（强制法）和相应的国际法准则，例如，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使用武力和进行下力威胁，在传统的、物理的和在新的，数字的空间仍然不可动摇。

按国际媒体经常的报导，我们时代有130多个国家加入增强“网络肋肉”的进程并演练网络战争。它们采取相应的理论，建立旨在进行网络对峙的专门部队。在信息空间不可能区分直接攻或防御的潜力。因此，特别重要和迫切的任务是信息空间的非军事化和通过相应的国际法义务。北约专家们在确立使信息对峙合法化和规则化的立场（例如，“关于对网络战争使用国际法的塔林指南”）。

俄罗斯就此采取旨在防止信息空间军事政治对峙，在国际法系统中加强禁止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冲突和高效调解它的规则的政策。<sup>3</sup>

部分这些规则反映在俄罗斯联邦于2011年叶卡捷琳堡负责安全方面高级代表国际会晤时提出的保障国际信息安全公约理论上，和在联合国组织国家于2011年于联合国大会第65次<sup>55</sup>会议过程中作为正式文件散发的建议“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方面行动规则”之中。<sup>4</sup>

考虑到数字工艺方面不良趋势的迅速发展，现阶段必须使国际社会进行的一般法律辩论转入实际轨道，以取得具体成果。重要的是在信息空间的军事化走过“不归点”之前达到这个目的。

1 Ранее в 2004-2005, 2009-2010 и 2012-2013 гг.

2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 ходе заседания Перв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октябрь 2013 г.

3 Конвенция 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онцепция). Утверждена 22.09.2011. URL:<http://mid.ru/bdomp/ns-osndoc.nsf/e2f289bea62097f9c325787a0034c255/542df9e13d28e06ec3257925003542c4!OpenDocument>

4 Правила повед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исьмо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азахстана, Киргизии, Кита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пр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от 12 сентября 2011 г. на имя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A/66/359 // URL:<http://rus.rusemb.org.uk/data/doc/internationalcodorus.pdf>





# 遵守人权或保障安全：何为更重要？ 美国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的经验

---

**叶卡捷琳娜·维索茨卡娅**

俄罗斯外交部新挑战与威胁问题司参赞

---

---

**丹尼尔·莫金**

俄罗斯外交部新挑战与威胁问题司司长

---

---

**伊利亚·罗加乔夫**

俄罗斯外交部新挑战与威胁问题司司长

dnv@mid.ru

---

人权问题早就显示了外交与政治间的激烈斗争。但像抵制新的挑战 and 威胁\* 这样的安全领域，曾被视为（现在也还有专家认为）已非政治化——似乎国家间就此问题能更容易达成一致。但近年来的情况则有了变化：以人权与自由为一方，安全保障措施为另一方的关系对比问题，进入了全面对峙状态。这明显地体现于各种国际平台（联合国、欧洲委员会、欧安组织）上就打击恐怖主义语境下有关人权和遵守人权的激烈辩论中，一些国家还利用其作为政治压力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为历史性西方整体和单独的美国一线所特有的，特别是在将美国与其国内，在所指的领域的现实状况加以比较后所特有的。

在有增无减的恐怖威胁和其它犯罪性威胁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遭受未能履行国家基本功能之一——保护人身——的批评，开始增强自己包括执法在内的监控潜力——这是客观过程。就此，实际上出现了这种政策与以自由民主为解说的人权

---

\* 新的挑战 and 威胁：作为用于本文的目的，出自对（在有条件的划分下）非国家一级，也就是在更大程度上关系到刑事法领域，恐怖主义和滋养其的暴力激进主义和社会意识极端化；生产和贩毒；跨国性犯罪；在应用信息技术领域的犯罪对人身、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威胁进行分析。

间的一定冲突。华盛顿为逃避维权者的批评，看来，采取了久经考验的美国方式——将指针转拨到针对其它国家的方位上，启用了双重标准并将问题政治化。为此，就得拉开嗓门对由某人和在某地的违反现象，以及那些不遵守的人大喊叫他们遵守自由民主，以便转移对自己不遵守自由民主的视线。在自家螺丝拧得越是紧时，对别人的批评就该更具有攻击性。为了能使美国自己采用一种标准，对不发达的民主派采用另一种标准，就必须创建相应的政治背景。例如，当俄罗斯与恐怖分子的斗争处于顶峰时期，从属美国的西方则怀疑是否莫斯科在镇压争取自由的战士，并将此哲学思想作为各国际组织文件的基石。对被指控反对西方联盟而挤满了囚犯的关塔那摩和阿布格雷布则又持另一种态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打击恐怖分子，这样做是对的，至于个别过分的现象就让律师去处理。

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发达民主，实质上将剩余的世界置于做出选择的地步——你们要么遵守人权（这里谈及的，自然，首先是个人权利和自由），那就是跟我们在一起，要么——如为取得更高水平的安全拧紧螺丝的话，那就必然是违反人权，那么，也就是反对我们。

实际上，抛向我们，又使我们愤怒和厌恶地回绝的这种严格的二分法——完全是虚假的。甚至可以说其更本不存在。安全与人权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补性的条件。试问：要安全还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当然，协同俱进。高度的安全不仅无威胁，反之，其有助于遵守人权：生命权，也就是在反恐语境下，西方国家如此不乐意去回想的事。就拿他们最近推出的有关禁止为赎买人质支付赎金的倡议来说，只在俄方的外交压力下，在此倡议框架内才予以了人的生命权利命题的说法。

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有关人权与自由的对比和安全保障措施问题上，早为自己做出利于加强监控功能和国家机构侵扰性的决策。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口号，他们采取往往在违反本国立法的同时，还违反国际法的严厉措施。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艾伯特表达了西方人的实际立场——出自保障社会的安全利益可以限制人权和自由——他表示，“安全能被置于自由至上”<sup>1</sup>。但事实上，西方世界被限制的权利和自由程度，比其他无资格被称为民主和所有不致力于争取民主的国家大。

就侵犯本国和外国公民的权利上，美国在西方国家间是无可争议的领先者。美国对公民的迁移、通信、住宅、所有制、个人资料控制过度。以美国为范例，就能从中鲜明地看到为保障安全起见其采用的传统和应急措施以及创新态度，包括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上的新技术和无人机（技术配备齐全的美国国家机构没能经得住启用自己的这些应用手段五花八门武库的诱惑）。

这也多亏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机密资料才广为人知，这些资料成了揭露美国情报局非法窃听电话和搜集电子邮件，有关他们实际上无限的和隐瞒于社会的全面网络空间控制的文献证据的来源。

美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由于情报局搜集的信息量与日俱增，在联邦数据库中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已达100多万，其中2.5万人为美国公民。与此同时，对名单中的28万人也没能认定他们是否与恐怖组织有关联<sup>2</sup>。美国国安局代表坚持说，监控项目仅仅是为获取与国际恐怖组织，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相关的人的信息。但在斯诺登揭秘后得知，有数百万与犯罪丝毫无关的美国公民也落于国安局撒下的网内。

国家借情报局对本国公民进行紧紧跟踪，搜集相关信息，包括隐私信息。国安局窃听美国用户的电话和窥视短信，在对这些窃取的信息加以处理后，其也就掌握了对用户所在地，直至用户的银行卡号的广泛信息。向国安局传输的还有手机用户的流动、旅游计划、电话本和汇款的信息<sup>3</sup>。再说，甚至是从未被发现从事非法活动的人也被窃听<sup>4</sup>。

有意思的是，按美国强力部门发言人的声明，国安局收集世界各地人的电话记录，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不起实质性的作用。美国行政公布了以对数百万美国人进行的电话记录“在预防袭击事件上起着最低限度的作用”为结论的报告<sup>5</sup>。

被窃听的不仅是电话内容——美国情报部门对美国的互联网几乎实行全面监控，美国国安局拥有能拦截大量信息的软件，再说，该局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技术能力。例如，代号为“Turbine”的软件，是能自动向全世界数百万台电脑输入病毒和下载信息的恶意软件，而

“棱镜门”项目是能监控个体用户在整个互联网上传送的数据包，收集有关他们的所有信息，电子邮件内容和在社交网上的通

信。美国国安部也还能远程激活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麦克风和视频器，不用说具有通过GPS（这是几乎所有现代手机都配备的系统）进行跟踪的能力。为此目的，同样能利用办公室设备和家用电器（打印机、传真、电视机）\*。

就此产生一种感觉，美国国安部采用的方式，实质上与盗用网络用户隐私资料的网络罪犯无任何区别。比如，他们将间谍软件以邮件为载体感染电脑，能连接到服务器间的网络流量，引诱用户上虚假网页。

美国联邦调查局也不见得打呼大睡。以打击恐怖与间谍活动为借口，自2007年根据其提出的要求，法院责成通信公司每天提交所有用户支付的国内及国际长途电话费信息的义务。也有其它包括收集电子邮件和网上活动信息的类似软件。就是在没有任何可疑行为的情况下，也能随便搜求用户间的交往内容。此外，其能要求提供有关购书的记录，病历卡资料等信息。

美国情报部门所以能获取美国人及外国人的隐私信息，还因为其与大私公司（其中有“谷歌”、“微软”、“雅虎”、“网络电话”、“弗莱森”）进行紧密合作，与他们签署了提交有关用户信息心照不宣的协议。

美国对自己公民进行的跟踪不仅只限于通信领域，实际上，国内对隶属公民实施了万事通“大哥”的构想。商界也提供有关自己客户的信息，甚至包括他们买有那些食品和药，看哪些书，在那里休息的信息。但就连这些还都不够——计划在美国各城市的所有街道上增添录像监控器。这个计划又以打击恐怖主义和保障社会安全提出的必要性来做解释。因此，近期能轻捷地跟踪任何人移动的监控器数量的清单会越来越长。前纽约市长M. 布龙贝尔格在提及本市时，就对这种现象加以评论说：“五年后，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处处都会有监控器”。而且监控器将不仅安置在楼面上，还将安置在无人机上。布龙贝尔格说，“还是慢慢地习惯吧”<sup>6</sup>。

为保障社会治安为目的，在美国任何过错都受到严厉惩罚，对触犯法律的重犯采取的惩罚手段极度严厉。美国的一些州行使“三犯规定”，在第三次犯罪的情况下，无论罪行的轻重，嫌犯将被判处自

\* 相关资料登录在以下网站上：The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post.com); The Guardian (theguardian.com); The Intercept (firstlook.org/theintercept/).

25年到终身的监禁。就这样，一个犯有非暴力行为的人能被终身监禁。也有一个偷零钱，一双袜子或一块披萨饼的罪犯被判终身监禁的案例<sup>7</sup>。

这种严厉的立法导致被关押在美国监狱里犯有不同罪行的犯人人数达220万——这是世界上的空前数字，如被假释的人计算在内，在美国被判刑的人的总数达将近700万人<sup>8</sup>。美国每10万居民就有716名犯人——达世界最高指标<sup>9</sup>。15.9万人被判终身监禁，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不享有提前释放权<sup>10</sup>。被关押的半数以上的犯人犯有非暴力性质的罪行。

但就是这种从严判决也还是没能作为成功打击犯罪的保障。目前，美国10万居民中犯蓄意谋杀罪的有4.7人，在立法不太严厉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应为1.6和1.1人<sup>11</sup>。

怪有意思的是，犯人中大部分是非洲、拉美和亚洲人。据美国司法部的评估，将近三分之一非洲裔男性一生中必有一次入狱的<sup>12</sup>。

按种族、民族或宗教及国籍原则启用监控手段，是一个国家违反人权问题上的另一个方面。今年八月份，美国小城弗格森一名空手的非洲裔少年被警察打死引发群众骚乱的事件震撼了美国社会。令公众舆论愤怒的还因为占非洲裔美国人70%的小城市，在53名警察中只有6名黑肤警察<sup>13</sup>。再说，这远非是唯一的事件——回忆一下1992年洛杉矶事件。当时，殴打非洲裔美国人的四名警察因被判无罪爆发的种族暴乱，造成54人死亡和带来10亿美元的损失<sup>14</sup>。

美国情报部门和一系列其他西方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手段上，采取将公民按类划分的办法，仅因为一些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籍贯，情报部门就将目光聚焦于他们。美国以怀疑从事恐怖或间谍活动为幌子，将“线人”打入宗教或政治组织，往往还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从而也就限制言论、信仰自由以及集会权利。

另值得注意的是情报部门针对穆斯林组织采取的行动。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中央情报局和纽约警察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执行在穆斯林人中跟踪恐怖分子的行动计划，将当地的清真寺一律归为恐怖主义威胁的来源。

鉴于此，不能不提及“人权观察”<sup>15</sup>组织7月份公布的说明性报告“幻想的公平：美国在对恐怖分子的审判上违反人权”。其中揭示了情报机构广泛采用令人发指的“钓鱼执法”的反恐实践，将由大

量被安插的“线人”进行挑事，煽动和教唆美国的穆斯林制造恐怖事件，随后又去阻止这些自造的恐怖罪行。执法机构在施压的情况下鼓励穆斯林去犯罪，有时还为他们试图制造的恐怖事件支付酬金。再说，联邦调查局寻求的罪犯是其明知有病态的对象，包括患有精神病、穷困者或有犯罪前科的人。

计划袭击一系列清真寺和美国军事基地的“纽堡四人组”案，就是美国执法机构类似活动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此案，据法官说，是政府“策划了此项犯罪活动，向他们为犯下此罪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手段并排除了所有或将有的障碍”<sup>16</sup>。

雷兹万·费尔道斯案，是另一例令人切齿的案例。就费尔道斯承认其有炸毁联邦机构的打算被判17年监禁。尽管费尔道斯患有精神病，联邦调查局派探员前往费尔道斯去的清真寺，并说服他制造恐怖事件。他们两人联合制定了对五角大楼和美国国会进行恐怖袭击的计划。联邦调查局向费尔道斯提供了资金和爆炸装置的模型。此后，费尔道斯被捕，但一场恐怖袭击就这样被“阻止”。

实际上，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监控国内外社会的体系。在内政上，美国脱变为集权警察国家的征兆越来越多，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借口，异己人士遭迫害，守法公民的权利被侵犯，军方却被赋有镇压和平示威者的权利。要不然，又如何评价对美国特种机构习以为常的跟踪反政府倾向社会运动的骨干这种实践呢？美国国土安全部被授权不间断地跟踪那些积极参与抗议华盛顿执行的国内外政策行动的人。但是，对国外“有用”的反对派，美国人则坚决支持，不仅予以他们金钱援助，还提供技术援助（例如，为“橙色革命”参与者研制了带有“警号按钮”的电话。按下此按钮，其将会清除储存的所有信息并向同伙发出“失败”的信号）。大型的私有公司也参与收集和示威骨干的信息<sup>17</sup>。

国家机构对社会进行监管的抵抗在增强。据美联社拥有的资料，2013年美国行政拒绝根据公众的要求出示政府文件次数达空前的54.5万次。47个部门的总督察投诉官员为独立审计员设置各种障碍<sup>18</sup>。这一切还都发生对选民承诺将会有历史上最透明的政府的总统执政期！

对美国人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很有意思——53%的公民不赞同政府进行收集电话交谈内容和网络跟踪的做法<sup>19</sup>。据72%公民的看

法，“膨胀的国家”是未来对内政构成的主要威胁<sup>20</sup>。民意调查的这结果证明，对国家领导的信任度在继续下降。

对社会中存在的这种情绪，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值得回忆有关奥巴马还是没有对美国情报部门的活动进行显著地改变，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人权组织提出限制情报局权力的要求，奥巴马竞选上有关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承诺也没兑现。关塔那摩监狱继续无限期地关押未经审判的囚犯和对他们施行酷刑（对其中许多人，美国法院都做出释放的裁决）。

2013年监狱中留下的154名囚犯，有100人宣布绝食，要求释放<sup>21</sup>。对他们采取了被联合国一系列人权组织视为是刑罚形式的强制喂食。监狱行政不再向媒体和辩护士透露被强制喂食的囚犯总数，也不再公开“医疗疗程”的细节。

奥巴马承认关塔那摩监狱——“美国违反人权的象征”<sup>22</sup>，但他没有就如何摆平，根据情报资料是对美国构成威胁，但又因没证据无法开庭审判他们的那些人问题做出答复。

关塔那摩——远非是唯一的例子。2004年落入记者手中的有美国军方在伊拉克阿布格雷布监狱对囚犯施刑和进行污辱的照片。世界目睹了不仅对恐怖主义嫌犯进行虐待，还以受害者为背景摆姿照相的美国人野蛮行为的照片。尽管小布什断言这种野蛮行为“是一小撮军人干的，不代表整个军队”，但他的这些话很快就受到多次出现的一些新的照片和录像的反驳。曝光的这些照片示范了美军不仅对在伊拉克，同样还对阿富汗的囚犯进行嘲笑和污辱死者尸体的镜头。那么，看来，这还是美军通用的实践。

中央情报局特工在关押恐怖分子和涉嫌搞恐怖袭击囚犯的秘密监狱里应用美国境内被禁止的，包括刑罚在内的“先进”审讯方法<sup>23</sup>。据了解，许多阿拉伯、亚洲国家，甚至欧洲国家为此项目的执行予以中情局协助。这种协助形式有像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自己的机场，移交被关入本国领土上的中情局秘密监狱之前被羁押的嫌犯（例如，波兰<sup>24</sup>）。据人权组织的资料，世界54个国家被卷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项目<sup>25</sup>。

由于中情局刑罚丑事频频，民主党派准备了一份有关小布什政府下中情局对恐怖主义嫌犯使用“强硬审讯手段”项目的参议员报

告。这份报告至今未公布，奥巴马行政一拖再拖地不予以解密，从而又再次违反了1984年反酷刑公约的条款

多亏泄露落到媒体手里的资料，很清楚，情报部门代表无论就采用的审讯方式的强度还是其效果性，多次向司法部、立法院和社会舆论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妨碍议会调查，对参议院网络进行攻击，指控参议员盗窃机密<sup>26</sup>。

美中情局的特工对恐怖注意嫌犯施行令受刑者产生一种溺水感觉的“水封闭”刑罚（奥巴马总统承认这是一种酷刑），以及另一种产生类似心理效应的泡冰水的刑讯方式。还

有包括“剥夺睡眠”和“墙壁技术”的其它刑讯方式。长期地同时采取这两种刑讯，能加深受刑者的痛苦<sup>27</sup>。

与此同时，中情局过分夸张对靠逼供信获得的信息价值。根据情报局代表的说法，多亏情报机构的强硬手段，从受审人口中获得使我们能预防新的恐怖事件发生和确定危险恐怖分子的所在地（包括本拉登在内的所在地）。但参议员们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信息是在对嫌犯施酷刑前就已掌握。此外，中情局将联邦调查局人员将在不施刑的一般审讯情况下获得的信息占为己有。

此外，还暴露了缺乏许多提审兼施刑的记录——看来，这种手段的应急价值与此无关。这里要说的话，倒是中情局特工出于“为了民主”无所不为的残忍。这是存在的“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性”概念最丑恶的典范。

美国在宣布的“与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中，违反了主要的人的生命权。美国人不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禁止在对境外恐怖主义嫌犯采取“针对性的歼灭”行动中导致受害平民多于被灭恐怖分子几倍的这种未经法庭判决的死刑<sup>28</sup>。就此，存在因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无人机的袭击，在阿富汗、也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加沙地带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死亡的文档记录。

这种行动是在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这意味缺乏任何透明度，也不承担向包括美国国会在内民主监督机构汇报的义务，以及对“消灭假设的恐怖分子”的下令或执令者予以法律上的不可触犯性。再说，美国人是在其与不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国家使用无人机，因此，“伴随的受害者”的概念在民间，从法律角度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由此可见，美国在侵犯生命权利上也不存在禁忌。再说，美国公民也同样在未经指控和审判情况下被远程遥控的无人机置于死地。在此语境下所谈及的不仅是有关美国不遵循主要的人权和自由——在所谓与恐怖主义进行的全球战争中，华盛顿已走到侵犯本国宪法的地步，宪法保障美国公民享有无偏见和公正的法庭审理以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可以肯定的说，在执法领域各种额外手段的压力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美国遭严重侵犯。其对人权的标准做自我解释，美国对似乎遵循的这些标准的命题，也按需而削足适履。与此同时，在不予以尊重隐私权的保障，在破坏人权领域通用标准的同时，美国，我们再重复一遍，大力批判其他人为保障安全实施过分的监控。这成了他们在国际平台上对其他国家人权政策的关键原则。可以将这种现象婉转地称为——政府在维护国内外人权和自由问题上行动的不一惯性：既然美国担负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那么，在国内和国际上应当一致。实际上，问题更严重——在本国推广比其他国家更强硬的安全程序情况下，正是对后者，在民主化路线框架下指控这些国家侵犯人权，尽管他们采用更低侵入性的监控措施。如果考虑到美国保障本国安全的迫害机制不仅用于打击犯罪，但也作为政治侦探目的的保安，当任何异己思想的表现或抗议行为立即受到镇压，那么，这里涉及的已是“三重标准”。只需回忆去年年底，被残忍、强硬，力量悬殊的警察驱赶的“占领华尔街”和平抗议运动参加者的事件。这是对由奠基的国际条约，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国家立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民主权利做出的美国式的回应。在结识了这种“人权”实践后，留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似乎奥威尔“大哥”在美国几乎成了现实，剩余世界也能变为像受美国集权控制传播的大洋洲。

- 1 «Tony Abbott: 'Security May Come Before Freedom'», September 22, 2014 ([www.bbc.com](http://www.bbc.com)).
- 2 “Barack’s Obama Secret Terrorist Tracking System, by the Numbers” The Intercept, August 5, 2014.
- 3 Burton Gellman, Ashkan Soltan “NSA Tracking Cellphone Locations Worldwide, Snowden Documents Show”,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4, 2013.
- 4 Joe Palazzolo, “NSA Phone-Data Collection Program Set for Legal Challen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 2014.

- 5 Privacy and Civil Liberties Oversight Board „Report on the Telephone Records Program Conducted under Section 215 of the USA PATRIOT Act a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 January 23, 2014, p. 11.
- 6 ‘We are Going to Have More Visibility and Less Privacy’ – Mayor Bloomberg Admits Soon NYPD Surveillance Cameras will be on Nearly Every Corner and in the Air, March 22, 2014 ([www.nydailynews.com](http://www.nydailynews.com)).
- 7 “Living Death – Life Without Parole for Non-violent offences”,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4.
- 8 “Correctional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9 “World Prison Population List (tenth edition)”, Ray Walmsley,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 2013.
- 10 “Life goes on? The Historic Rise in Life Sentences in America”, Sentencing Project, 2013.
- 11 “Global Study on Homicide”, UNODC, 2013.
- 12 “Why is the African American Imprisonment Higher Than Whites?” January 23, 2014 ([www.huffingtonpost.com](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13 «美国弗格森市的骚乱», 18.08.2014 ([www.itar-tass.com](http://www.itar-tass.com)).
- 14 “Riot Anniversary Tour Surveys Progress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in Los Angeles” April 25, 2012 ([www.cnn.com](http://www.cnn.com)).
- 15 “Illusion of Justice. Human Rights Abuses in US Terrorism Prosecutions” Human Rights Watch, July, 21, 2014 ([www.hrw.org](http://www.hrw.org)).
- 16 “Illusion of Justice. Human Rights Abuses in US Terrorism Prosecutions” Human Rights Watch, July, 21, 2014 ([www.hrw.org](http://www.hrw.org)).
- 17 “Spy Flies. The ACLU Campaign to Expose and Stop Illegal Domestic Spying”,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www.aclu.com](http://www.aclu.com)).
- 18 “Obama Administration Hinderling Oversight: IGs” August 05, 2014. *The Washington Times* ([www.washingtontimes.com](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
- 19 “Americans Disapprove of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Programs” June 12, 2013 ([www.gallup.com](http://www.gallup.com)).
- 20 “Record High in U.S. Say Big Government Greatest Threat” December 18, 2013 ([www.gallup.com](http://www.gallup.com)).
- 21 “Guantanamo Nurse Refuses to Force-Feed Prisoners” July 16, 2014.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http://www.theguardian.com)).
- 22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ay 23, 2013, The White House ([www.whitehouse.gov](http://www.whitehouse.gov)).
- 23 “CIA Holds Terror Suspects in Secret Prisons” November 2, 2005 ([www.washingtonpost.com](http://www.washingtonpost.com)).
- 24 “European Court Says CIA Ran Secret Jail in a Polish Forest” July 24, 2014 ([www.reuters.com](http://www.reuters.com)).
- 25 “Globalizing Torture. CIA Secret Detention an Extraordinary Retention”,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2013.
- 26 “Top Senator Rejects CIA Torture Report Redactions Ahead of Public Release”, August 5, 2014,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http://www.theguardian.com)).
- 27 “Senate Torture Report and CIA Reply”,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www.aclu.com](http://www.aclu.com)).
- 28 “Between a Drone and Al ‘Qaeda. The Civilian Cost of US Targeted Killings in Yemen” Human Rights Watch, October 2013 ([www.hrw.org](http://www.hrw.org)).



## 永别了，德国？

阿尔曼·奥加涅祥

“国际生活”杂志主编

在“屈服”于美国和英国就反俄罗斯制裁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之前，德国政治家不休止地念着类似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咒语。他们针对德国企业家和潜在的，甘于承受损失和丧失一切的潜在的新失业者呼吁显示爱国主义，因为，“政治高于一切”（Politik über alles）。但许多德国人懂得，在华盛顿和伦敦压力下对俄罗斯采取制裁，事实上是放弃了自己阵地，严重打击了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政治分量。柏林近来经受的屈辱——国家元首电话“被窃听”，国防部发生的间谍事件，德国在美国的黄金储备的丑闻，现在又因制裁问题上受压而“投降”——为德国的政治权威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长期以来，德国不仅声称，但也扮演了以欧盟为一方，俄罗斯和后苏联空间国家以及欧亚为另一方的重要的中介缓冲角色。德国成功地在中国、亚洲和中东国家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野心多元化。这些国家也惯于视其为继之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经济体的独立强国来接受。

德国近来对与金砖国家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显示的兴趣，自然引起白宫疑心的增大。如果柏林能在乌克兰危机前夕，对举行俄罗斯、欧盟与乌克兰三方谈判的建议进行冷静和独立地评估，那么，乌克兰，看起来也是离经叛道的事，今天能是德国与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间建立新型合作的最佳平台。

德国在2003年就北约反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上采取的独立立场，予以对默克尔的坚定意志会不亚于施耐德的坚定精神的寄托。但事与愿违，德国今天该打的不是其因制裁必造成的数以十亿计的损失，也不是德国和欧盟因此失去的数十万岗位的算盘，其或将得为失去作为享有自己发言权的全权和独立的世界领导人的历史性机遇进行哀悼。



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口号，根据历史显示，其具有争议性，但经济成了对几乎所有伙伴和敌人，“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全球政治压力的杠杆，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今天说的是对俄罗斯宣布的制裁，这还不意味幕后“未宣告”的制裁系统不在运作，或不存在被进行意见交换的盟友和所谓的“朋友”应用的威胁。

造成向美国政策的这种突然倾斜的原因能有各种，但有一点最为明显。近年来，德国在对美国和英国的贸易上取得最大的顺差，在一些年头甚至达到20%。不能排除华盛顿和伦敦向柏林做出非模棱两可的暗示，表示他们不会为在自己市场上对德国采取“隐蔽”的经济制裁踌躇，以便达到使柏林在对俄罗斯施压问题上更好说话的目的。华盛顿拒绝交出大部分德国的黄金储备，只交出其中可怜的10%，并非是唯一的事件，但却是发出的重要信号。因为，黄金储备——不仅是德国工业的保障，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统一的欧洲财政及保障德国在其中起领先作用的稳定剂。

卡梅伦多次以坚决的口吻对德国在欧盟内部市场上的进口居统治地位表示不满，并以发动欧盟内部骚乱来终止这种现象进行威胁。再说，就此问题，伦敦会得到不少盟友的支持。比如法国，因为德国对法国的贸易顺差最大。

那么，世界贸易规则怎样呢？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这些或那些的准则又怎样了呢？这些准则在颇大程度上早就成了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就像一种说法“眼下没事，就一切都顺利”，海牙法庭审理教科文组织的一案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看来，德国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也可以这么说。但也应当考虑到，如果对“大西洋者”来说，制裁俄罗斯是他们的战略组成部分，其已不再是一种遏制而是抛弃俄罗斯，那么，对德国来说，则是一种由外部迫使采取的战术。德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与大西洋一岸的利益背道而驰。正是与俄罗斯牢固的，不断发展的关系予以了德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使其能加入世界领先大国的行列并在世界上享有重要发言权。对德国来说，“东方方位”——予以其抵抗大西洋两岸对德国这颗升起的明星妒心越来越大的竞争方和“朋友”施压的战略深度的保障。从政治战略视角看，柏林近来的行为与德国国家利益严重地相矛盾。

因此，出自这一点，其必将发人深省，但很少有能排除后果的现象。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国际法》经典之作

**鲍里斯·皮亚德舍夫**

特命全权大使、历史学博士

pyadysheva@gmail.com



外交学院建校80周年。所有这些年来，国际法系教研室作为重要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心之一成功运作。教研室曾在不同时期由我国以下一些杰出国际事务律师，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Е. А. 克罗温、М. И. 拉扎列夫、Г. П. 茹科夫、А. С. 彼拉多夫、В. И. 库兹涅佐夫教授领导。目前领导教研室工作的是法学博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常设法官

С. А. 叶戈罗夫教授。教研室积累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无不在其学术文稿、教辅和教材中得到反映。正值外交学院周年之际，“斯塔图特”出版社出版由法学博士С. А. 叶戈罗夫教授编辑的第五版（经补充和更新的）《国际法》教科书（国际法：教科书/责任编辑 Д. Ю. Н. С. А. 叶戈罗夫教授。第五版，补充和更新的. М.: 斯塔图特, 2014年. 1087页），无疑是具有意义的事件。

经评审认定的第五版《国际法》与前几版教科书，就其篇幅、内容以及参与编撰准备的作者团体有显著的区别。作者团体由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教研室工作人员，本国主流大学教师，著名的国际事务执业律师以及刚开始科研活动的青年才俊组成。与此同时，应当特别指出对优秀的В. И. 库兹涅佐夫和В. Н. 费多罗夫国际律师怀有的敬意。在国际法科学体系和外交活动实践中同样享有极高声誉的О. Н. 赫列斯托夫教授保留了他们为前几版编写的章节并进行了精致的更新。

不能不说两句有关作者团体的骨干由拥有科研和教学经验，在俄罗斯外交部中央机构，俄联邦其它机构和部门，在国外代表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和联合国刑事法庭具有担任重要职

务巨大实践经验的主流国际关系律师组成，比如，M. M. 比留科夫、Г. М. 韦利亚米诺夫、А. И. 科夫勒、М. Н. 科佩洛夫、Е. Г. 利亚霍夫、Ю. С. 罗马舍夫、В. Р. 图兹穆哈梅多夫、С. В. 切尔尼琴科。

第五版教科书中的教材增加了约三分之一（一千多页），共有26章。在保留国际法教科书的继承性和传统结构，新版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做的分析，在逻辑、顺序和风格上进行了一定的修正。这不仅予以系统性地接受对国际法进行的现代分析方法的可能性，但也更便于将其作为教材使用。

比如，国家法律体系实施国际法规章问题被编入《国际法与国内法对比关系》一章。打击犯罪国际合作一章由对教材内容经过显著修正的《国际刑事司法》一章加以充实。必须指出，教科书里纳入了两个原则上一新，非常适时的两章——独联体活动的国际法律法规方面（和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亚区组）一章，以及现代国际法语境下信息技术的调节一章。

此外，编写的教材不注重于“一般”或“特别”的问题上，而是强调现代国际公法的有机统一和反映与外交政策进程中所发生的，以及理解它们历史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联系对综合研究国际法律规范的重要性。教科书在序言中摘引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话并非偶然：“为保障法治，律师们必须懂国际法”，并强调了载入了俄罗斯宪法和编纂的其它俄罗斯法规以及政治法律文件，比如，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思中国际法行为的优先原则。

教科书的前几章阐述了国际法的基本问题，其历史性发展阶段，术语和分类附录，国际法律制度的运作特点，其法律规范基础，特殊渊源。看起来，这里似乎不可能在反复讨论的问题上再会另有引发兴趣的新信息出现。但作者在一系列情况下成功突出了国际法基本假设，概念方法的新棱线，如，国际法原则和渊源问题，并对21世纪国际法发展趋向和前景进行评估。

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对比关系的章节进行了较为显著的加工，包括对极迫切的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比率（第5章）课题的加工。对该领

域现有学理观点的概述和罗列的同时产生的具体困难的理论部分，估计会引起特别的兴趣。

教材中援引由俄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一般管辖权法院和仲裁法院应用的国际法规范，俄联邦国际条约规范实践的例子，看来也极有益和适宜。其详尽地阐明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有方法。提交的材料中包含了在俄罗斯政界和律师专家社团被广泛讨论的此问题详尽的实际基础。

需指出，鉴于对俄联邦宪法第4部分15条款有关固定《公认的原则与国际法规范及俄联邦国际条约规范是其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如果俄联邦国际条约与其本法有不同规定，所适用的是国际条约规定》的规范进行修正的合理性进行的辩论，谈及此课题就特别重要。有意思的是，此宪法规范在教科书中的所有主要章节里进行了有步骤的分析。

教科书对像在国际法、国际条约法中的国际法主体、居民和领土的国际法律制度予以了关注。此外，相应章节具有实际应用的现实意义。教科书关注的对所谓的国际或是“国际化”土地，即：斯匹次卑尔根岛、南极洲建立“特别”的法律制度调整的合理性辩论题，也非常有意思。

还需指出教材第二章有关人权的国际保护法高度科学与方法论水平。其中详尽阐明了问题的历史，罗列了组成为人权领域国际法律规范、原则与风俗相应的规范阵列的公约性及一些其它文件。引述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此领域其它机构的从多范例并加以评论。

就欧洲（斯特拉斯堡）人权法庭对俄联邦司法实践采取的活动范例，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本章节将不仅对研究国际公法教程的大



学生作为教材感兴趣，其能被视为对所有参与做出外交决策和司法领域相关人士讨论问题的详细的实例及分析材料。

不能不指出被编入第 17 章有关打击犯罪国际合作，特别是国际刑事司法信息的更新教材。在 20 世纪末的几年来，建立了一系列对大规模违反人权和其它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进行调查和追究责任的特别国际刑事法院。教科书作者团体中有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法庭）活动的人。无疑，这种现象提高了教科书中的教材价值，此外，还因编有阐述了历史和具体材料的相应篇章，总体上，从保障国际法的有效性角度来说，特别有意思。

尽管因根据某种概念性立场，由于国际法在国家间水平上不存在能有效保障其规约的机制，因此不被承认为“真正”、“现实”的法律体系，国际法庭活动的实践成了珍贵的反立论的根据。编入教科书的章节，看来会启发读者对特别国际刑事法院和法庭的法律进行评价，以及防范今后导致建立类似的国际司法机构原因的必要性进行思考。

第 18 章（《外交关系法》）的题目及其涉及外交与领事法基础的章节稍有更动。教科书中就此课题的篇幅不大（与其它章节相对而言），这看来可能由外交学院传统地更关注于外交和领事关系法，驻外正式机构地位的调整来解释，尽管如此，被编入教科书的材料予以了对外交代表处现状和实际工作足够全面和同一的印象。

从将外交与领事关系法的基本原理并入《外交关系法》一章（前几版的教科书的相应章节被名为《驻外外交代表机构外交关系法》）的合理性来看，这一章的新题目更适用。

上述提到作者团体不仅有丰富的科研、教授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参与，还有刚开始从事国际事务的律师组成，这也对教科书中某些章节的阐述方式起有影响作用。例如，在阐明个别的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问题上未能完全避免在概念、范畴、术语及其基本特征的应用上出现的简化和不一致性。

评审认定的教科书中编入了涉及独联体国家和其它在前苏联境内出现的其它政府间联合体运作的法律规章的一章。其中涉及并分析



了政府间的联合体，即：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对统一经济空间前景进行了评估。本章节里对法律文件进行了法理分析，涉及了国际联合体制度结构的特殊性并对其前景及其发展予以了评估。

不能不指出，有一章特别涉及了俄罗斯未加入的，并被创建人视为是某种替代独联体的——民主和经济发展组织（“古阿姆”原为“古乌阿姆”）的联合体。由于在俄罗斯的教科书和科学文献中很少能遇到对该组织国际法律的描述，应承认这一章节为适宜的和有益的补充。

教科书最后几章对国际安全法和武装冲突法进行的分析，依旧未失去其重要性。需指出，被纳入这些章节的材料包含了许多新的和更新的资料，其中包括涉及到俄罗斯将立法适应于符合源于武装冲突法（有关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之附加议定书》）的义务。估计相应的章节同样不仅能被视为教材，但也是为所有不管怎样被卷入解决国际安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的“实用参考资料”。

教科书添加的《国际法与信息技术》一章，在俄罗斯的法律书籍教材中是一种新颖现象。我想，没有人对国际法教科书中涉及此课题的合理性与适时性会有疑虑。

这一章阐述了在现代国际法、网络管理合作国际法律形式与国家政府间组织就此进程中的作用，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框下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一般问题，以及对今后信息技术的国际法律规制进行了分析。

在信息和通信关系领域的社会关系发展的速度超越了对其法律规制的调整，但上述领域的任何问题，归根结底将与发展和信息技术就运用问题进行国际法合作的必须性相连。在国际法教科书框架下提出的这个问题的适时性极有意思，并无疑值得予以注意。

最后该强调，考虑到运用的教学方式的互动形式，从国际法的教学方法论角度来看，需要指出教材编制的极高水平。每一章都以探讨题结束，使读者能巩固已掌握的材料并还附有推荐的文学读物的

目录。尽管不是每一章，但教科书中的大部分章节为大学生提供获得相关主题的其他网络信息资源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了其实用意义和利用信息的方便。

本版教科书符合高等职业教育“法理学”方面的联邦国家教育标准，这一点很重要。教材不仅帮助大学生研究国际公法，但也为掌握像国际合同法、国际组织法、外交与领事法、国际海洋法、国际太空法、国际生态法、人权保护法等专门学科。

总体上，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国际法》第五版教科书，无疑应被视为是2013年阶段上的重要事件。评审认定的教科书——作者团体及其责任编辑——国际法教研室负责人，法学博士С. А. 叶戈罗夫的重大工作结果。为法学院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所有相关工作人员编纂经评定的教科书，不仅将成为研究国际法的教材，但也是调整国际生活各不相同领域问题的实际知识的百科全书。



